

寫在出刊前夕

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是李遠哲院長就任後積極推動和促成的一個跨所合作主題研究方向。本計劃乃於前（八十三）年九月成立，由張光直前副院長擔任主持人，本人為副主持人兼執行秘書。

在此一總計劃之下，第一年有十七個分支研究計劃分別由本院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同仁執行，其中的十六個計劃在第二年繼續進行。到了今年（八十五）七月，除了四個計劃結束之外，仍有十二個原計劃進入第三年的研究階段，同時，還新增加了四個新的研究計劃。因此，目前本計劃項下共有十六個分支計劃刻在執行之中，所有的研究經費均由本院全力支持。

東南亞研究不但在本院是新開拓的人文社會研究領域，對整個台灣的學術界來說，東南亞也是一個才被發現的新生研究對象。由於李院長的遠見和張前副院長的推動，使得本計劃成為國內第一個從事東南亞研究的學術團隊和組織。之後，國立暨南大學的東南亞研究中心和私立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也陸續於去年和今夏成立。我們很興奮目睹到此一區域的研究和教學終於有了起步。

出版這份一年兩期的《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目的就是想藉著它一方面增加院內各所同仁對本計劃的認識，另一方面更期促進與院外相關研究機構和社會各界的溝通和交流。因此，在內容的安排上，除了披露本計劃各項研究的內容、成果和本計劃的學術活動之外，還特別將陸續介紹國內外東南亞研究的機構、人物、出版品，以及會議消息，甚至刊登相關的論述和心得。

除了出版通訊之外，本計劃亦將慎重考慮以 occasional paper 的方式推出研究論文系列，出版本計劃各研究主持人所寫的研究論文或是院外、甚至國外相關學者的著作。前者的定位是研究訊息的交流，後者則為學術成果的分享。

值此《通訊》第一期出刊之際，本人願代表本計劃十七個分支計劃主持人和近二十位的研究助理同仁，在此向李院長、張前副院長、總辦事處李處長和資訊所李所長兩年多來的支持和協助致誠摯謝意。經由《通訊》此一溝通交流的橋樑，希望院內有更多的研究同仁在未來能投入東南亞的跨學科研究，也期待院外相關學者和機構對本計劃各項研究工作和本計劃未來發展，不吝給予指教。

- | | | |
|-------------------------|-----|-------|
| 1.台灣與東南亞古代文化關係的考古學考察和研究 | 臧振華 | (史語所) |
| 2.台灣與中國南海區域關係的考古學考察和研究 | 陳仲玉 | (史語所) |

(三)、語言組

- | | | |
|------------------------|-----|-------|
| 1.東南亞地區南島語言調查研究計劃 | 李壬癸 | (史語所) |
| 2.東南亞地區藏緬語族獨龍語/日旺語研究計劃 | 羅仁地 | (史語所) |
| 3.東南亞地區南亞語系語言研究計劃 | 孫天心 | (史語所) |

(四)、政治與社會

- | | | |
|---|-----|-------|
| 1.東南亞區域安全體系的研究：理論與實際 | 林正義 | (歐美所) |
| 2.經濟再結構與東南亞的農業問題：
以GATT的衝擊為中心的探討 | 徐正光 | (民族所) |
| 3.東南亞發展過程中階級結構轉型與中產階級的興起：
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與越南的比較研究 | 蕭新煌 | (民族所) |
| 4.企業精神與社會經濟轉型：泰國與東南亞 | 金 玫 | (歐美所) |
| 5.東南亞國家社會福利政策之研究：
印尼、菲律賓、緬甸、越南 | 覃怡輝 | (社科所) |

(五)、經濟組

- | | | |
|------------------------|-----|-------|
| 1.區域經濟整合趨勢下東南亞與台灣的經貿發展 | 蔡青龍 | (經濟所) |
| 2.東南亞之人力資源、經濟整合與國際勞工移動 | 黃登興 | (經濟所) |
| 3.台灣與東南亞地區與西方區域經濟整合的關係 | 張晉芬 | (歐美所) |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在進入第二年後，經濟組中的東南亞地區與西方區域經濟整合的關係因故於第一年結束。第三年，除了四個分支計劃（歷史組中的日本南進政策下台灣與東南亞的貿易和資源分配、日治時期台商的東南亞經貿活動、1950年代東南亞華僑在美國東亞外交政策中之地位；政治與社會組的企業精神與社會經濟轉型:泰國與東南亞）已完成其計劃。另外經公開徵求和專家審查後，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於未來一年的研究中，另增加了四個分支計劃，分別是歷史組的台史所黃蘭翔先生之「越南古代城市形成之歷史與其城市特徵之研究」；政治社會組則有近史所朱浚源先生之「國家的理論與實際重觀：新加坡經驗」；近史所張存武先生之「菲華商總領袖群之研究」；以及史語所宋光宇等人之「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宗教變遷」。

三、兩年來研究成果

1. 廣泛而有系統的收集影印和建檔國內外有關東南亞研究之相關文獻、期刊和檔案。歷史組重在歷史文獻的建檔，考古組重在考古資料庫的建立；語言組

亦到其研究主題當地做語言收集，並在建立「語言電腦檔案」；社會政治組則以收集官方統計資料、當地社會科學相關研究論著和正式進行第一手的階級結構和中產階級經驗調查為重點；經濟組除了官方統計、專書、論文的收集外，更包括購置國際組織所發行的電腦磁帶、磁片和光碟資料，並參與相關研究出版品之編輯。各分支計畫研究人員亦陸續有專文分別發表。

2．與東南亞各國的學術研究機構與學者建立聯繫管道，並獲致相當正面的回應。本計劃目前已與下列機構建立正式上的合作交換關係，已簽約的有美國康乃爾大學的東南亞計劃(Southeast Asia Program, SEAP)、荷蘭萊登的國際亞洲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IIAS)及澳洲國立大學的亞太研究學院(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RSPAS)。交涉中的有法國Provence大學的東南亞研究所(Institut de Recherche Sur le Sud-Est Asiatique, IRSEA)。分支計畫主持人均已前往不同的東南亞國家與相關的研究機構或學者接觸，並獲致未來做進一步合作研究的可能性。

3．前往東南亞各國做為期長短不同的資料收集和田野調查。本計劃各主持人曾分別前往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及緬甸等七國進行第一手的田野和經驗研究工作。

4．邀請東南亞各國學者前來本院參加研討會，以建立更具體而密切的合作研究關係。本計劃中的一個分支計畫（政治社會組的東南亞階級轉型與中產階級的興起研究）曾於一九九五年六月底在本院召開以「東南亞社會轉型與中產階級的興起」為題的國際工作計劃研討會（workshop），邀請十位東南亞五國學者來院與會。

5．為推廣本地學者對東南亞區域之研究興趣，本計劃不定期地舉辦午餐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對本區域研究之專家學者蒞院演講，至目前為止已有十三次。

四、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對於未來之期望

基於東南亞區域研究為本院今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新重點之一，東南亞研究於中央研究院正在處於奠基和開創之階段，院方的積極支持與否對本計劃能否有成至為關鍵；因此，本計劃諮詢委員會已正式建議院方積極籌劃將本計劃由臨時性的任務編組地位提升成為一「研究中心」性質的正式組織，以求本院東南亞研究之紮根與持續發展。

台灣總督府在日本南進政策中的角色：

以台灣拓殖株式會社為中心

周婉窈

中央研究院台史所助研究員

本分支計畫題目為「台灣總督府在日本南進政策中的角色——以台灣拓殖株式會社為中心」。主持人為周婉窈，協同主持人為曹永和、王世慶和黃富三。

台灣拓殖株式會社是日本政府在一九三六年決定設立的「國策會社」，目的在於以台灣為基地，達成日本對中國華南和南洋的經濟開發。「國策會社」指為配合國家政策而成立的公司，具有濃厚的官方色彩。台灣拓殖株式會社（簡稱台拓）的設立，可說是日本一九三〇年代後期「南進」政策的一個具體表現。本計畫的研究目的在於了解台灣總督府（以台拓為中心）在日本南進政策中的角色，以及台灣在日本南進過程中的一般性位置。

眾所周知，台灣在日本統治時代是日本的南洋研究中心，南洋約指今天的東南亞，台灣因此保有許多珍貴的關於東南亞的資料與調查。這些資料大多保存於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原總督府圖書館）和台灣大學各院系圖書館。為了深入了解台拓設立的歷史背景，本計畫第一年度以蒐集東南亞相關的日文資料為主，第二年度除了繼續蒐集工作外，也陸續將影印裝訂好的書籍編目，輸入電腦，以利將來檢索之用。

本計畫目前已進入研讀文獻資料的階段，成果報告可望於下年度計畫結束前完成。報告總題暫定為「台灣與日本的南進」，旨在以日本的南進論和南進政策為背景，探討台灣在日本帝國向南擴張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內容包括：

- 1、日本南進論的歷史淵源
- 2、從「南洋」憧憬到領有南洋群島
- 3、日本的東南亞資源、產業調查

- 4、台灣拓殖株式會社的成立
- 5、台灣 日本南進的跳板
- 6、「大東亞共榮圈」與「南方共榮圈」
- 7、日本的「東南亞民族解放論」
- 8、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台灣的「南進位置」
- 9、台灣人的南洋經驗
- 10、反省與評估

關於日本南進論的理論與實際，日本學界已有不少研究，成績斐然，可供參考。本計畫將以前輩學者矢野暢與少壯學者如後藤乾一等人之研究為基礎，進一步探討台灣在日本南進構想中的位置。

台灣拓殖株式會社留下大量的公司檔案，目前保存於台灣省文獻會，已拍攝成光碟。本研究下年度的重要的工作即是利用台拓檔案，以了解台拓在日本佔領東南亞前後所扮演的真正角色。如有需要，亦將訪談曾為台拓到海外工作的人員。此外，本研究亦擬比較日本三大海外拓殖公司 東洋拓殖株式會社、南洋拓殖株式會社，和台灣拓殖株式會社。

在研究過程中，除了台拓的角色外，我將特別注意台灣與日本侵略戰爭之間的關係。日本的南進論原先是以經濟開發為主，在理論上並不必然導向軍事佔領，但結果是以佔領東南亞作結。台灣也因此成為日本對外征戰的跳板之一，尤其是軍事南進的中繼站。本研究將試圖探討日本帝國擴張、拓殖公司和戰爭之間的關係，以及台灣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角色。所擬探討的問題包括：日本佔領廣大的東南亞和西南太平洋之後，台灣是否失去南進跳板的地位？還是被指派了新的位置？

就台灣人而言，我們都知道，在太平洋戰爭中，有不少台灣人被殖民政府派遣到「南洋」，其中以軍人、軍屬為大宗，計有61,591名。這是台灣人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南洋經驗」，然而截至目前為止，並無研究分析此一經驗的歷史意義和可能的現代意涵。前年一時甚囂塵上的經濟「南進論」，頗受到學界一些人的批評，本人對歷史上含有侵略意涵的「南進」概念，也抱持審慎的態度，不過，台灣人的「南洋經驗」倒是很值得進一步研究，或許我們能在其中看到一些具有正面意義的面相。

另外，我將特別注意日本的產業調查、帝國對外擴張，和發動戰爭之間的糾葛與因果關係。我們都知道，日本對東南亞的資源與產業調查是奠基在紮實的學術研究上的，實際上也有不少學者參與調查工作。在這裡，學術和政治產生了糾

纏不清的關係，甚至最後間接地為戰爭服務。台灣大學的前身——台北帝國大學，就曾經扮演這樣的一個角色。本研究將對此一現象作分析。

最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日本人所留下的龐大的調查資料，仍然是今天我們了解殖民時代的東南亞的重要文獻。如果我們能善加利用此一資料庫——包括原台灣總督府圖書館所收藏的有關東南亞的西文資料，台灣應很有希望發展東南亞的歷史研究。

日治時期台商的東南亞經貿活動

林滿紅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

在探索日治時期台灣商人的島外經貿經驗的過程當中，幸喜有本院之東南亞主題計劃，使我得以將台商在華南、在東北的活動延展到東南亞來探討。

過去的兩年裡，我本人曾蒐集在美國史丹福、哈佛、康乃爾等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日本大阪、東京等大學，廈門南洋研究所的相關資料，我的助理則協助蒐集在日本外交史料館、在新加坡、在台北、在台南的相關資料。這些資料以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台灣銀行的調查、日本領事報告及僑界和台灣的報紙等為最主體。這樣一個又是地毯式，又是披沙揀金式的工作，雖然所蒐集的資料沒有預期的多，但也開啟了有關日治時期台商在東南亞活動這樣一個原來不很清楚的知識世界的若干面貌。

日治時期台商的東南亞經貿活動，在投資方面雖不比在華南之多，但較之東北為多，其所投資企業有橡膠業、糖業、礦業、海運業、銀行業等大規模企業，也有米店、酒店、腳踏車店、雜貨店等小規模企業。與在華南相同，亦有若干台商經營鴉片販售、妓女戶等行業。台商與在東南亞具雄厚勢力的華僑，有相同的閩粵文化淵源，是台商在東南亞的投資較在東北為多之重要因素。但在貿易方面，則台灣與東南亞的貿易，與台灣與華南的貿易一樣，越來越不如台灣與東北貿易數量之多。東南亞所產多為工業原料，並不是以農業為主體的台灣所迫切需要的。反之，寒冷的東北則切需台灣盛產的蔬菜水果。東北所產的豆餅又可供台灣肥田之用。再加上，在日本帝國擴張的過程中，北進一直重於南進，1932年以後東北轉為日本的勢力範圍，日本更方便加強東北與台灣貿易之相關設施。較諸台灣與華南間的貿易，台灣與東南亞間的轉口日貨貿易較少。日貨之進口至東南亞多經香港轉口。此一轉口貿易多由在日本及在東南亞均頗具勢力之廣東華僑壟斷。台灣與東南亞的貿易，和台灣與東北的貿易一樣，均以直接貿易為主。

台灣到東南亞的商人，以一次大戰歐洲國家退出東方市場時期及太平洋戰爭前夕為最多。以1930年代之接近三千，較諸在華南之約為兩萬為少，較諸在東北之約為一千為多。由於台灣與東南亞之直接貿易，早期以茶、炭為多，台灣北

部商人前往東南亞者較多，隨著高雄港的擴建，台灣之加強戰時工業建設，日本在東南亞的勢力在太平洋戰爭前夕的擴張，台灣中南部商人前往東南亞者漸多。除此之外，也有來自廈門，皈依日（台）籍，往返於台灣與東南亞間的巨商。透過閩粵的共同背景，台商、閩粵商人、南洋華僑構成一個合作關係，如台灣包種茶輸入東南亞，是台商與南洋華僑與閩粵商人共同經營的。連抗日的僑界領袖胡文虎也與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有密切的經貿關係。

到東南亞的台灣商人，其分布最多之處，亦日本在東南亞的經濟力量最大之處。二十世紀上半葉，日本在東南亞的投資有一半在荷屬印尼，台商在東南亞的分布亦以荷屬印尼為主。台商在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分布依次為新加坡、菲律賓、英屬婆羅洲、法屬印度、泰國等。

隨著日本在中國東北、華北的擴張，東南亞華僑與荷、英、法等政府越來越與日本敵對。在華僑商人抵制日貨期間，有印度商人或其他本土商人起而取代華商，固然減弱若干台商的壓力，但有時台商的日本關係，也使其面臨有身家之危的挑戰。除早期由台灣自行前往，中國屬性較強者外，後期在日本政府鼓勵下前往東南亞的台商則頗為親日。就在台灣的日商與台商比較，響應日本南進政策的台商仍較日商為多。在台灣時所受的培訓，在東南亞資金短缺時所受日本政府銀行的贊助，在拓展商貿活動過程中日本政府的協助調查與促銷，都使前往東南亞的台商在面對抗日壓力時，大多仍站在日本政府一邊。前往東南亞的台商有些是固守一地經營經貿活動，如在泰國的台商一直持續到二次大戰之後；在其他東南亞地區者，則大多隨日本帝國在東南亞的失利而撤出東南亞。有些在東南亞有經貿活動的台商所經營的是東南亞、日本、中國大陸、台灣的多邊貿易，在東南亞抗日運動風起雲湧之際，有些則轉往日本帝國的其他地方發展，如在東南亞售茶的台商之轉往滿州國售茶。在日本帝國的整體間架底下，即使是前往東南亞的台商也經常隨著日本帝國的發展而移動其空間坐標。這些台商有些是輾轉服務於三井、三菱、大阪商船、台灣銀行在東南亞、香港、中國大陸、日本的不同分行，有些在到東南亞之前即習得日語、馬來語、荷語、英語、泰語、法語之中的某些語文。他們之中，有人與東南亞的女子結婚。在日本帝國的間架底下，這些前往東南亞的台商是台灣商人由本土商人走向國際舞台的先鋒。這些商人在到東南亞之前或之後，頗多擔任台灣的民間團體或民意機構領袖，這也是台灣中產階級發展歷程中的一個根源。

日本南進政策下台灣與東南亞的貿易與 資源分配

陳慈玉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

本計劃試圖從歷史的角度，以日據時期為重點，探討台灣與東南亞的經貿關係，及日本在此經貿關係的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一年度側重資料之蒐集，包括相關資料目錄之建檔和影印，第二年度除擴大資料之蒐集範圍外，並探討 1930 年代以後日本南進政策中台灣與東南亞的資源分配問題，包括政策性質的轉變過程及實際運作，自然資源、原料與工業的互補關係。

就日本「南進論」的性質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倡言者如志賀重昂、竹越與三郎等人或多或少帶有反官僚、反中央的色彩，因為不得志而欲追尋新天地。此外，一批妓女的流入東南亞亦使相關商業（如雜貨店、日本和服店等）興盛，琉球人開始移民此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財閥乃在政府的鼓勵下「進出」東南亞，於是「南進論」的性質為之一變，自庶民的「南方關與」轉變為國策性的「南進」。日本商社所派遣的受過相對高等教育的人員成為東南亞日本居民的主體。他們在 1930 年代以前，遭遇到因中日外交關係不順暢（例如 1919 年的山東問題，1923 年的日本接收旅順大連問題，1928 年的濟南慘案）而引起的排日經濟運動，意味著東亞與東南亞命運的相關性。

日本在東南亞的經濟活動，最初是民間小商人為了開創海外新天地而「冒險」前往的，例如越後屋（以台灣為據點）、南洋商會等商業資本。三井財閥亦在本地設置分行，從事農礦產品的輸出與日本商品的輸入貿易。後來，逐漸在菲律賓、馬來半島等地投資製麻和橡膠園事業。另一方面，由於日本意欲掌握亞洲煤鐵礦資源以配合工業化的腳步，財閥乃投資開採鐵礦石，供給本國八幡製鐵所之用，其數量於 1926 年以後超過來自中國的鐵礦。即使如此，直到 1930 年代，日本人在東南亞經濟活動的國際性水準，依然比不上歷史悠久、歷練良多的當地華人。

另一方面，作為殖民地的台灣，其重要生產事業必須配合日本母國的利益，

例如茶業，日本僅生產綠茶，除供給國內消費外，還出口到美國，而台灣烏龍茶在美國可能威脅到日本茶的優越地位，於是殖民地當局乃政策性地讓台灣成為紅茶的製造地區。台灣紅茶不但回流到日本，並且經由三井財閥的努力推銷，拓展市場至歐洲和美國，與錫蘭、印度、爪哇和中國紅茶相競爭。至於包種茶，則以東南亞和中國大陸為主要出口區域，而中國大陸所進口的台茶大多再出口到東南亞，在此與中國茶相競爭。在 1932 年以前，對華南和東南亞的出口量佔台灣包種茶總輸出量的 99.9%，換言之，東南亞市場關係著台灣包種茶的生命，是它最必須掌握的市場。即使 1928 年當地抵制日貨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後，由於台灣商人的努力，出口量並未銳減；但到 1930 年以後，因為東南亞各地普遍的經濟不景氣和主要消費者華僑的經濟勢力的衰退，出口量明顯地下降，而爪哇實施關稅保護政策，台灣包種茶所受的打擊更大。

1935 年 10 月，台灣總督府官員、日本外務省官吏、陸海軍方人士和企業家，以及台灣企業家等 50 多名人士齊聚一堂，召開熱帶產業調查會，決定以台灣為南進的據點，設立台灣拓殖會社，積極開發電力，以便利用豐富低廉的電力來增產工業商品向東南亞輸出，而台陽實業公司的顏國年也建議輸入東南亞的資源（例如磷礦等重要礦產），混合島內原料，利用廉價的電力來生產，除供給台灣之需求外，並可出口到東南亞。此外，參加的日本企業大多在東南亞從事經濟活動，例如石原產業公司曾接受台灣銀行的融資，於 1920 年代即到馬來亞採掘鐵礦石，供給日本八幡製鐵所；1930 年代，著手於爪哇的銅礦開發事業。

再者，就台灣煤礦業而言，在日據時期亦成為日本煤業帝國之一環。初期對台灣煤業的期望是以能自給自足為原則，後來台煤生產過剩，必須依賴出口，於是香港和東南亞成為台煤重要的消費市場。而之所以供過於求乃是因為當時台灣工業化尚未全面展開，對燃料煤的需求不能擴大的緣故，亦即日本在台灣僅致力於農業(稻米)和農產加工業(蔗糖)的發展，甚至到 1930 年代仍然將經濟開發的重點置於米糖增產計劃，所以煤炭除了供給糖廠和鐵路、船舶外，只得開拓海外市場。而在出口權為三井、三菱等財閥所壟斷的情況下，自然而然地配合日本本國的煤業發展(例如，三井的三池、山野、北海道炭礦、三菱的高島炭礦等大型礦廠的成長)，和中國撫順煤礦以及庫頁島煤礦的生產，於是台煤除台灣和日本的「內銷」市場外，以華南和東南亞為主要的外銷市場。此煤業帝國的結構在第二次大戰期間亦未改變，例如 1940 年，日本帝國煤炭總產量 9,384 萬公噸中，本土僅產 5,731 萬公噸(佔 61.07%)，「滿洲國」則供給 2,113 萬公噸(佔 22.52%)，殖民地的南庫頁島和朝鮮各生產 644 萬公噸和 612 萬公噸，台灣卻只有 284 萬公噸(佔 3.03%)。所以由於自然環境的限制和日本「農業台灣」政策的成功，工業化程度明顯地落後於朝鮮和中國東北的台灣，並不能扮演積極提供原料和資源給母國的角色，而是日本軍事「南進」的中繼站和經濟入侵東南亞的助力。

一九五〇年代東南亞華僑在美國東亞外交政策中之地位

趙綺娜

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在本計劃近兩年的蒐集與研讀資料，目前初步的成果如下：

一九五〇年代美國對東南亞華人政策大約在一九五三年底到次年年初時成形。其基本假設是：在東南亞各國的一千多萬華人可能會被中共利用，做為其赤化東南亞的工具。華人在東南亞各國是孤立而不受歡迎的族群，他們雖然掌控當地的經濟活動，卻不願認同當地的社會、文化，使東南亞各國政府對他們極為猜忌、排斥。二次大戰之後，東南亞各國政府紛紛採取一些排華措施，以削弱華人在經濟上及政治上的影響力。由於中共控制中國大陸，對美國在亞洲的安全利益構成嚴重威脅，因此維持東南亞各國政府之安定乃是美國防止共黨勢力在亞洲繼續擴張之重要策略。美國非常擔心中共可能利用華人與當地社會之衝突，從中取利。華府認為鼓勵華人同化於其居住國是解決東南亞華人問題的根本辦法。鑒於短期內不易改變華人對祖國忠誠，美國希望能導引他們以台灣為其效忠對象。美國官員相信華人對海峽兩岸中國之態度，是取決於他們對兩岸政權在國際舞台上鬥爭輸贏形勢之判斷。美國支持國府，致力於提高其國際地位，應當有助於東南亞華人選擇認同台灣為祖國。華府同時也要鼓勵國府應在不影響到華人對其居住國華人的集結中心(rallying point)。因此，美國對東南亞華人政策不但與其對東南亞政策有關，也與其對台灣和與對中共政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當時美國政府很關心如何阻止大批東南亞華人學生回大陸就學。華府官員認為華人青年回大陸就學會增加華人與大陸的關係，也為中共在東南亞製造「潛在之第五縱隊分子」。為了減少華人青年接受中共影響的機會，美國政府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六年，撥款協助國府擴充台灣的教育設備，並補助東南亞華人學生回台升學之旅費與在台生活費，以鼓勵華人將子弟送到台灣接受中文教育。另一方面，美國在一九五五年曾一度考慮在東南亞地區籌設一中文大學，以解決當地華人就學問題。但是因為東南亞各國政府對中文教育之敵視，這個建議沒多久就

被取消。因此美國官員對一九五〇年代中期星馬華人自行籌款辦南洋大學一事，是樂觀其成。

此外，華府官員對中共對東南亞各地中文中小學之影響也相當關切。他們認為這是美國對東南亞華人政策最大的威脅之一。因為中共可透過學校教育灌輸共產思想給年青一代的華人，中文學校變成不斷製造親共分子的場所，妨礙到未來華人與當地社會融合的可能性，嚴重危害美國在東南亞反共之目標。所以除了鼓勵學生赴台升學之外，美國也補助國府僑務委員會挑選僑校教師送到台灣受短期訓練。另外美國新聞處也協助美國民間的亞洲基金會與僑委會合作，為華人中文學校編寫教科書，在香港印行出版。美新處針對東南亞各國不同情況，製作反共文宣，推廣華人與當地社會融合之主題。美國之音每星期有十八小時半，以中國方言對東南亞播音；每月定期向東南亞華人播放台灣進步情形的錄音帶。在台灣的美國新聞處至少有三分之二的預算與人力都放在向東南亞華人宣傳台灣進步之實況。美國在曼谷、吉隆坡、西貢三地的新聞處派駐有通曉中文的官員，並僱用當地華人職員輔助，來推行反共宣傳工作。

不過到一九五七年，美國官員對東南亞華人政策之重心重新調整。其主要原因是他們發現華人對當地政治之重要性，並不如前所估之重要。華人不太可能成為美國政策的主要工具。華人一向只重視聚集財富，對政治與社會活動並不熱衷參與，除了星加坡與馬來亞之外，其他地區的華人很少在其居住國的政治結構中發生影響。美國很難期望華人能在東南亞政治上扮演積極的角色。華人對國府的態度是無法影響國府的國際地位。美國所能期望於華人者，也僅止於華人不要支持中共而已。其次，華府官員也觀察到中共對東南亞華人政策是盡量不刺激各國東南亞政府，以改善與東南亞國家關係。例如中共與印尼在一九五五年四月簽訂「雙重國籍問題條約」時，對印尼華人的國籍，不再採取血統主義，而尊重印尼的出生地主義。不過中共也並未放棄其爭取對海外華人影響力。事實上，中共招待華人回國觀光，透過華商安排，參加國際商展，利用華商來促進它與東南亞各國之貿易關係；中共也從未放鬆其影響各地中文學校、工會、報紙之努力，大批中共書刊、電影等仍然在東南亞各國城市出現。

一九五七年起美國對東南亞華人政策的目標並未改變，仍然是要阻止中共對海外華人發生影響，防止中共滲透華人族群。華府官員認為華人雖然對美國在東亞的反共政策無法產生積極作用，卻可能具有負面的影響，是個製造麻煩的因素。因此美國認為應該更積極推動華人同化於居住國之政策。美國應謹慎配合各國之同化措施，使中文學校納入當地國民學校系統，鼓勵華人效忠、認同對象是居住國，而不是國府。在華人與居住國同化之時，華人應把中華民國認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保護者，而不是中共。美國也鼓勵台灣與當地各國拓展關係，但國府

應該盡力去影響海外華人，鼓勵他們完全融入其居住國之社會、文化之中。因此在一九五七年，美國開始以推動華人同化東南亞社會為其政策的主要工作重點。

在本研究中，尚有許多相關問題有待進一步澄清。例如美國的「海外華人會成為中共顛覆東南亞政府之工具」假設，到底是否是事實？在一九五〇年代，中共東南亞華人族群的影響力到何種程度？東南亞各國之共黨是否與中共合作？如果是合作的話，他們對境內華人是持何種態度？東南亞華人社會是否有其自主性？另外，台灣固然樂於得到美國援助，加強與東南亞華人之聯繫，但國府的目的是與中共爭取海外華人認同為祖國之地位，同時也為增加取得美援的籌碼，與美國推動華人認同當地社會之目標，顯然有差距。在一九五〇年代越南、菲律賓採行本土化政策，是否得到美國鼓勵？台灣是否為了外交利益，而犧牲其一向對華僑所標榜護僑之口號？這些都是饒有趣味的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

越南古代城市形成之歷史與 城市特徵之研究

黃蘭翔

中央研究院台史所助研究員

我附屬於台灣史研究所，為什麼會對越南古代城市或是建築感興趣？這是一些朋友常問我的問題。其實最先挑起我的興趣的是 1963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安志敏氏發表了一篇「『干闌』式建築的考古研究」非常重要的論文。安氏指出了干闌式建築是古代（至少西漢以前）中國南方的建築主流，而這干闌式建築擁有兩種主要特徵，「樁柱底架」（直接引用安志敏氏的稱法；亦即地板抬高形式；也就是日文稱的「高床式」）及長脊短簷屋頂。這種建築中有一聞名的實際考古出土遺物，那就是 1959 年由《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所披露的銅製的貯貝器的蓋子上的屋型銅器。

後來看了雲南省博物館所出版的《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發掘報告》原有報告書，赫然發現過去台灣常講的屋頂起翹「燕尾」形式，竟然與石寨山所發現的屋型銅器極為類似，不但如此，屋頂中間凸起兩旁伸出，形成「主屋兩山出廈」（根據安志敏氏的敘述，作者加上些微的修改而成的術語）的形式也完全一致。更進一步，於江西清江營盤里出土的陶屋也具有長脊短簷之特徵，甚至發現廣西僮族龍勝龍脊廖家寨民宅，以及西雙版納傣族的佛寺建築，這些少數原住民建築的屋頂也是不折不扣的「主屋兩山出廈」形式。換句話說就是，這些不同的時代背景及地區所分佈的建築形式之間是否有一定的關係存在？這是我對東南亞建築與都市研究的緣由。

後來，我遇見了京都大學建築系布野修司副教授，從他的研究裡我些微地窺見了越南的東山（Dong-son）文化以及東南亞各地區的原住民建築特徵。古代越南的東山文化亦即越南的金屬器時代之青銅文化遺跡。這個文化遺跡位於 Thanh Hoa 北邊 4 公里處，先有法國人 L. Pajot 做了挖掘調查，後來由 V. Goloubev 根據 Pajot 的資料加以研究而公諸於世。這個東山文化所分佈的範圍並不止於越南、

中南半島，從中國的西南地區到東南亞各群島都存在有該文化遺跡。

而這個東山青銅文化與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所出土的青銅文化卻有極為密切的關係，也可以斷言因為這個青銅文化的發現，使得自長江流域以南至東南亞的建築文化的距離突然之間拉近了不少。不僅如此，其所代表的文化特徵之一的屋頂形式，中央屋頂的兩旁山牆下連接較矮的左右屋頂面，而這種多重層高度漸減的連接屋頂形式，即使在今日的東南亞各地多可見到。

例如，第 9 世紀的婆羅佛屠（ Borobudur ）第一迴廊北邊牆的下半段上的穀倉浮雕，就具備有東山文化住宅的結構特徵。第 12 世紀吳哥窟（ Angkor Vat ）的 Bayon 上所雕繪的住宅模型，是為長方形平面的干闌式建築，上頭也覆蓋有如雲南青銅器同樣形式的屋頂形式。另外，能夠忠實地遵守東山文化屋頂型態者，有越南東海岸的占族。亦即，自 10 世紀到 13 世紀於美山與芽莊建有占城之磚造紀念性建築，就詳實地重現當時的建築型態。還有，緬甸也留有相當多的傳統建築，雖然隨著時間的演進，其建築物有所變遷，但是大約到 13 世紀為止，尚是遵循東山文化的模型來興建住宅的。後來儘管其建築結構改採用印度的技術，然而長脊外伸的屋頂形式仍被保留下來。

蘇門答臘區域的住宅，如 Toba Battak 族與 Minangkabau 族的建築型態深受東山文化的影響。其中特別是 Minangkabau 族的屋頂建築型態，完全是雲南與東山文化青銅器之典型。另外在蘇門答臘的北端的 Aceh 地區也留有東山文化建築型態的影子，亦即 Aceh 住宅的山牆面有向外起翹的現象。

東山文化的典型建築型態於 13 世紀時在爪哇地區也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過了 13 世紀之後，這種建築就逐漸減少，目前則只剩下爪哇東邊一帶的少數案例。至於 Surawesi 島上的 Toraja 族的住宅，雖然以結構而言，其似屬於別種系統的建築物，中脊木好像無法支撐山牆上的屋簷，所以於建築外側另立支撐中脊的柱子。

從高腳式建築與長脊短簷屋頂的建築型態，廣面性的分佈在東南亞地區的現象來看，我們可以推論包括台灣、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等地的長江流域以南的建築文化與東南亞各國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而「燕尾」的建築元素應該不是一般所認為的是中國華北地區官方樣式中的鴟尾的變形。而從中國有關建築專業的古文獻宋代李誠的《營造法式》，以及 1930 年代梁思成所編的《清式營造算例及則例》，或是 1992 年 12 月由北京市文物所所編的《中國古代建築辭典》中也找不到有「燕尾」來形容屋脊的解釋案例。儘管如此，台灣的一般民間仍流傳著：「燕尾屋脊的使用，原限於廟宇，若民間使用，也只有做官或中科學的人家才可使用。」這種規定也不知出自何處。今年的 6 月奈良縣櫻井市芝遺跡出土了一件土器片，其為干闌式建築，在屋脊的兩側有曲捲的裝飾圖樣。

依我的看法，這種華南建築的燕尾屋頂形式，其實與於西元紀元前後分佈在長江流域以南，廣及東南亞甚至日本的文化圈有一定程度的關係。

在研究台灣歷史建築與歷史都市時，其所著眼的範圍應不該限於台灣本土而已，必須將研究的觸角擴展到東南亞上去。在這個觀點之下，本研究主題打算將焦點置於與中國文化接觸最早，受中國文化影響最深的東南亞國家——越南。隨著研究的經過到底能夠得到什麼成果？目前不願意作太多的臆測，但是希望在三兩年內有一初步的結果。

台灣與東南亞古代文化關係的

考古學考察和研究計畫：

1996 年菲律賓考古工作簡報

臧振華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

一、研究背景和計劃目的

台灣與其鄰近地區古代文化的關係，是研究華南、東南亞與太平洋等地考古學和文化史的學者所長期關切的問題。這個問題固然關係到台灣本地史前文化和原住民族的來源；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在整個南島語族起源問題的研究上，具有極為關鍵性的意義。不過，過去數十年來的研究，大都是偏重在台灣與大陸東南沿海古代文化之間的關係，而對於其南邊和東邊鄰近地區古代文化之間的關係，則少有較深入的探究。

其實，以往的研究顯示，台灣史前文化中的若干問題，也需要從中國大陸之外的其它鄰近地區來加以理解。例如，早在 1943 年鹿野忠雄便已推測台灣的史前文化中有「原東山」、「巨石」和「菲律賓鐵器」等三個文化層可能是源於鄰近的東南亞地區。但是此後的五十多年來，對於這個假說，雖間有學者論及，但始終不夠深入，特別沒有足夠的東南亞考古資料來加以比較研究。因此，雖然經過了半個多世紀，我們還是弄不清楚台灣的鐵器時代文化到底是否源自菲律賓？東部巨石文化與東南亞大陸和海島所發現的若干巨石遺物究竟有無關聯？而出現於若干史前遺址的一些青銅遺物又是從那裡來的？其它，像台灣在東南亞和太平洋南島民族和文化的來源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更是時下學者們甚為關心，而亟待釐清的問題。

近半個世紀以來，無論是在台灣或是在其鄰近的東南亞地區，科學的田野考古資料都已大量地增加，而社會科學，特別是人類學中有關族群遷移、文化接觸和變遷，以及文化生態等問題的理論研究，也日趨深入，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去重新檢視和探究這些問題。

因此，從民國 83 年起，本人獲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的支持，開始進行〔台灣與東南亞古代文化關係的考古學考察和研究計畫〕。此計畫的主要目的在於透過考古學資料的考察和比較研究以及相關假說的驗證，去了解東南亞的古代文化及其與台灣地區古代文化的關係。預期其結果不但應有可能幫助逐步釐清前面所述的一些重要問題；而且對整個太平洋地區古代文化和南島語族源流，以及歷史文化和族群發展的了解，也可提供重要而必需的背景資料。本計畫預期是一個長期的並且是團隊接續的研究計畫，須分階段進行。第一階段以建立研究基礎為主要目的，為期三年。第一年以基本資料的蒐集、研究檔案的建立，相關研究和資料收藏機構的訪察，合作管道的尋求，和研究課題可行性的評估等為主要目標。第二年和第三年則就研究專題嘗試與當地學者合作進行初步的考古田野工作。目前此計畫已完成了第一年的工作，並進行到第二年。以下謹就目前已進行的第二年的田野工作成果預作簡報如下。

二、問題的提出與田野的選擇

在東南亞地區中，與台灣一海之隔的菲律賓，是學者們所認為與台灣在史前文化關係上最可能有關連的地區之一。如前所述，早年的鹿野忠雄即已擬定台灣的鐵器時代文化是來自菲律賓。時至今日，許多研究南島民族或南島語言起源的學者，像 Peter Bellwood, Babara Theil 和 Robert Blust 等學者，也都推論菲律賓是南島民族或文化從台灣向太平洋移動或擴散的主要路途之一，因而兩地間史前文化的關係甚為密切。其它，從個別文化特徵，推測台灣與菲律賓史前文化關係的研究，更是時有所見。

不過，所有這些推論，事實上都還有待從兩地的考古資料中作更詳細的驗證。我們需要確實了解兩地在考古資料中所呈現的文化面貌，包括年代、風格特徵、生活方式和適應形態等方面，到底可不可以找到一些具體的關連？因此，本計畫選擇了菲律賓作為東南亞考古研究的第一個目標。而以與台灣最接近的呂宋島北海岸作為田野工作的起點。

三、田野工作的收穫

本計畫為了上述研究目的，與菲律賓國家博物館簽訂協議，合作在呂宋島北海岸進行長期的考古調查和研究工作。第一次調查選定 Cagayan 河口兩岸各十六

平方公里的範圍為調查目標區。經過一個月的工作，調查了考古遺址或遺物分布地點共五十餘處，並在其中一處遺址進行了試掘。這些遺址包含「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金屬器時代」，以至「接觸時代」，所獲遺物甚為豐富。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呂宋島北海岸地區，廣泛分布打製礫石器工業的遺存，包含礫石砍器和石片器。此些遺存與長濱文化的遺存在風格上有相當程度的類似性；兩者是否有關，值得進一步分析探討。至於新石器時代以至接觸時代遺址出土的遺物，為數甚多，年代涵蓋距今五千年至四百年。目前都在分析當中，預計於本（85）年12月前完成初步報告。

四、結語

此次菲律賓的考古工作，是我國考古機構首次正式與東南亞國家合作進行的考古工作。初步的成果堪稱良好，顯示了東南亞的考古工作，應該大有可為，值得考古同工努力開發。

近兩年來中國南海地區的考古工作

陳仲玉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副研究員

一、研究的緣起

我國南海地區的廣大海域，國際間通稱"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其中的東沙、南沙、西沙、中沙四大群島，久為我國民活動的區域。除了狹義的南海區域範圍之外，海域周圍相鄰地區更是既廣大又複雜的人文地理環境。其中的國家或地區之間的古代文化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先生在兩年多以前提出研究東南亞的指導方針。並撥專款實行『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由張光直副院長主持。筆者就在此大計劃下，執行『台灣與中國南海地區關係的考古學考察與研究』，是其中的子計劃之一。在執行此計劃的同時，又承內政部委託主持的『東沙島南沙太平島考古學初步調查』專案計劃。由於與中研院的計劃密切相關，可收相輔相成的效果，所以兩計劃同時進行。

二、研究內容及其成果

在台灣地區考古學的發展，雖然已經整一百年，但在這期間大部分的研究工作都著重於台灣本地，以及其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古代文化關係。偶而涉及台灣與東南亞之關係，則多避重就輕，實因資訊不通，研究者力有不逮。因而在有關中國南海的這兩計劃的設計之初，在研究內容方面，先列出二大項目：（一）蒐集相關的研究資料，以便建立資料庫。（二）積極從事田野調查和發掘工作，以便掌握第一手資料。同時也可歷練研究工作者的經驗。

建立資料庫的工作，在執行計劃之初，即將所要蒐集的資料範圍訂下寬廣的原則，凡相關的文獻均不厭其項目之繁雜。因而可預期的，以後編輯的書目會出現數千條之多。所以，首要之務就是要自行設計一套書目檢索系統，以應用電腦為建檔工具。這套系統承同事陳維鈞先生協助，已經完成。主要的功能，除了可用作者名和論文書籍的篇名之外，也可以用學科及其分類，並配合地區和文獻相關的時代，四大項目的代碼，均可檢索相關書目。這項工作至目前已經編輯成中

文書目二千七百餘筆、英文書目四千六百，共計七千一百餘筆。影印的書籍或文章二百種以上。

田野調查和發掘是內政部委託案的主要工作項目。目前南海諸島中，僅東沙島和南沙太平島二處為我國軍駐守；此二島在第一年度的工作中，即已完成初步的田野調查。並且在東沙島發現一處歷史時期的遺址。經過正式發掘，出土明清時期的器物多種（陳仲玉，1995a:20-36）。

三、與東南亞考古學術機構的交流

兩年來，一方面為了蒐集環中國南海各地區或鄰國的文獻資料；另一方面想實地考察各地的考古遺址和遺物，並且做為以後研究時的學術連繫交流關係。筆者曾經前往中國大陸東南沿海三省和東南亞多國的相關學術機構訪問，因而也建立了不同程度的連繫和初步合作的關係。在訪問的同時，蒐集到不少各地的出版刊物和書籍。其中不乏難得的資料，如非親歷其境，取得不易。

再者，一處考古遺址經過發掘之後，所採得各種資料，如出土物、現象記錄、圖片、照像等等，其數量會很多；經過整理再行發表於報告或論文者，往往僅是其中的小部分，這一點是考古工作者共同瞭解的。所以，要親自參觀考察遺址和出土的遺物，是很重要的需求和經驗。這也是此兩年來個人執行計劃案的一種收穫。

執行此計劃，原希望是一個比較長期的研究領域。為了以後長久的工作連繫和合作關係，曾邀請四位境外的考古學者來台訪問。其中有兩位是大陸研究南海和海南，有兩位是泰國的考古學家。今後可能會有更多的來訪者。

四、初步工作的成果

二個專案研究計劃，在執行的第一年中，即已完成了東沙島和南沙太平島的初步田野調查。調查報告於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發表，編為內政部地政叢書第二十九輯（陳仲玉，1995a）。由於在研究期間蒐集中文書目資料費用，多使用內政部的委託案，因而先將中文書目編輯為此報告的附錄。書目與資料蒐集工作，本來就是要長久持續進行的項目。所建立的資料庫會不斷在增加，在第二年度結束之時，可將中英文二部分書目約七千筆，合訂成《中國南海地區考古學研究相關書目》一書出版。此書目內容也曾經做過初步分析撰成《中國南海區域考古學研究相關資料的四個範疇》，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的『海南暨南海學術研討會』會議中發表，並已編入該會議的論文集內（陳仲玉，1995b）。

此外，中國國際法學會於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六、十七日主辦『兩岸及海外華人南海學術研討會』。筆者曾以《臺灣與南海區域考古學相關研究的展望》一文在該次會議中發表。文中主要是敘述本研究的主旨。並且已編印在該會議的論文集集中（陳仲玉，1994）。南沙太平島的田野調查工作，是在一九九五年四月間，隨海軍艦隊前往的。該次的調查日記，曾以《南沙太平島的力與美》一文，於該年四月二十四日發表在聯合報的『探索版』。經過這將近兩年的時間，筆者最近將所有蒐集的資料，以及訪問考察大陸東南沿海和東南亞多所考古學術研究機構和遺址的經驗，做了檢討，並已經撰成《中國南海地區考古學研究的展望》一文。期望在發表之後，尚請諸先進同工們的指教。

五、結 語

中國南海水域中的島群，在本世紀中葉因發現蘊藏著豐富的石油礦，相鄰諸因而爭相佔據若干島嶼，造成風雲密集的緊張情勢，爭端時起。國際間呼籲各國克制，最好是互相合作，共用資源以求互利。這類事務當然要由各國政治領導者的睿智去思考解決之道。

以筆者兩年來從事該地區考古學工作的觀察，就考古學來說，也要做"相互合作"的呼籲。蓋因南海諸島面積很小，其中無超過二平方公里者，實在不應做武力的爭戰。其理由有三：

（一）島嶼的生態環境原就脆弱，小島更甚。稍微過度開發利用，生態環境即會受損到無法復原。更何況某些軍事設施與爭戰的破壞力更大。

（二）南海諸島中的古代文化遺蹟與遺物留存者極為稀少。根本經不起人為的破壞。目前諸國均在擴張勢力，增加軍事駐守人員和裝備，古代的文化遺蹟與遺物均難幸免受損害。

（三）學術研究本是要國際化，而難有國界分割的。古代的文化相分布也不會與現今諸界限相吻合。

基於這三點理由，筆者呼籲考古學界的同工們，積極進行南中國海的考古學研究。並將資訊與經驗廣為互相交流合作，以重建南中國海的文化史。

引用書目

陳仲玉

- 1994 台灣與南海區域考古學相關研究的展望，〈《兩岸及海外華人南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9-54，中國國際法學會主辦，台北。
- 1995a 《東沙島南沙太平島考古學初步調查》，地政叢書第二十九輯，頁20-36，內政部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台北。
- 1995b 中國南海區域考古學研究相關資料的四個範疇，〈《海南暨南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531-548，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主辦，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編印，台北。

附註：本文曾於八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的『台灣考古百年紀念研討會』中宣讀。

菲律賓小黑人(Negrito)的語言調查

李壬癸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

東南亞很多地區都有小黑人(Negrito)，包括泰國西南部和馬來半島的 Semang Negrito(約三千人)，菲律賓的 Aeta(約二萬五千人)，安達曼群島的 Negrito(約二千人)，還有在南太平洋許多島嶼上據說原來也都有小黑人的遺跡。例如，屬於印尼的 Flores 島上曾發現小黑人的人骨化石，估計在三萬到四萬年前。此外，在新畿內亞和在澳洲東南方的塔斯馬尼亞島上也都有過小黑人的蹤跡。今日在蘇門答臘東部和婆羅洲的叢林人，也都明顯地含有小黑人的成份(Brandt 1965)。

在太平洋地區的小黑人今日都使用南島語言。一般學者都相信：南島民族擴散到太平洋島嶼區以前，小黑人早已在這些地方定居了。小黑人顯然都是後來受到南島民族的同化而改用南島語言。夏威夷大學 Lawrence A. Reid(1987, 1989, 1994)發表了一系列論文，主旨在說明這種早期同化的現象，最近(1994)並提出 218 個詞彙上的證據，小黑人可能保存了若干非南島語言的底層成份(non-Austronesian substratum)。Reid 教授所研究的小黑人都在菲律賓群島(據了解菲律賓幾個大島上都有小黑人)。我們可以推斷，其他地區的小黑人語言也會有類似的情況。

各地區的小黑人都屬於少數民族，他們的語言文化都在快速消失中，急需及時調查搶救。受到 Reid 教授的鼓勵，我從 1994 年 12 月起到菲律賓呂宋島西南部去調查一種小黑人語言，叫做 Magbeken，前後調查了四次。他們身材矮小，皮膚黝黑，頭髮鬢曲，明顯地跟南島民族不同。我的發音人來自 Morong，二十多年前他們族人遷移到 Bataan 省 Abucay 郡的 Bangkal 區。我所蒐集的語料，包括一千多個單詞，數百個例句以及六篇文本。對所蒐集的語言資料，我也做了初步的整理和分析，發現一些有趣味的現象，值得再進一步深入探討。這種語言還沒有人好好做過研究，只有菲律賓大學 Professor Ernesto Constantino 做過很簡短的調查，他也只蒐集過很初步的語言資料，但還沒有正式發表什麼研究報告。今(1996)年四月初，我到他辦公室拜訪他時，他告訴我菲律賓全國幾乎只有他一個人在搶救調查少數語言(minority languages)，包括到處去蒐集小黑人語言的田野資料。他

最近也到 Palawan 島去調查小黑人的語言。

小黑人的生活環境和條件比一般的菲律賓人還要差。他們並沒什麼重要農作物或生產，日常靠砍竹子、採蜂蜜為生，偶爾到小溪中去捕小魚和捉螃蟹佐餐，三餐大都只吃米飯，很少有下飯的蔬菜或魚罐頭。他們的房舍小而簡陋，用竹子和木柴搭建而成，屋頂蓋茅草。他們因為身材矮小，竹床也較小，我只能打斜角而睡。Constantino 就說，他去調查時，也都住在他們家裡，他們有什麼吃的，他就跟著吃什麼。我在部落裡拍照片時，大人、小孩都蜂湧而來，希望入照。生活雖然清苦，但他們都很開朗、友善。

Magbeken 的成年人大都還會說自己的母語，可是小孩都只會說菲律賓的國語 Tagalog。因此，這種小黑人語言的消失只是時間問題。美國的「暑期語言學會」(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簡稱 SIL) 是一種教會組織，派遣人員到各地去學習當地的語言，再將聖經譯成當地的語言文字，藉以傳福音。即使人口不多，SIL 的人也願意做。但是 Magbeken 年輕一代的已不說自己的母語了，因此連 SIL 對他們也放棄了。

Magbeken 部落在很偏僻的山區，交通不便，只能搭小吉普車(jeepney)進去。沒有電，入夜後部落漆黑一片，我只能仰頭觀賞滿天的星斗；一般住戶點煤油燈照明。用水不太方便，每天供應的時間有限。有一次(1995年6月)我去調查時，水源完全斷絕，每天只好走半小時小徑到山谷溪中去洗澡，走回來又是一身汗！住家都沒有廁所，也沒有公廁。天氣熱、缺水、蒼蠅又多，環境衛生不容易維持，對外地人來說很難適應，要一直保持健康並繼續做調查工作，非常不容易。

菲律賓人對外地人都很友善。我自己一個人提著旅行袋，在路上打聽行程時，常常得到一些熱心人的協助，使我順利到達目的地。這一年半來我到菲律賓去做了四次的田野調查，每次都在馬尼拉都會區的 SIL 歇腳，並尋找相關的研究資料，他們都給我很多方便，我非常感激。遺憾的是當初接受我的 SIL 主任 Dr. Richard Roe, 不幸於去年七月因癌症去世。我頭兩次去調查時，每次都去拜訪他，向他請教菲律賓語言的問題，他給了我許多很寶貴的建議。據在 SIL 工作的人員說，Dr. Roe 一生大都奉獻給菲律賓的語言研究和傳教工作，令人感念。

菲律賓地區值得調查研究的語言還很多，但如何去適應當地各種生活上的問題，對外地人而言，是一大考驗。

參考書目

Brandt, John H.

1965 The Southeast Asian Negrito: Further notes on the Negrito of South Thailand.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58:27-43.

Reid, Lawrence A.

1987 The early switch hypothesis: Linguistic evidence for contact between
Negritos and Austronesians. Man and Culture in Oceania 3(Special
Issue):41-59.

1989 Unravelling the linguistic prehistories of Philippine Negrito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Contact Induced Changes i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Canberra.

1994 Possible non-Austronesian lexical elements in Philippine Negrito
languages. Oceanic Linguistics 33.1:37-72.

東南亞地區藏緬語族獨龍 / 日旺語 研究計劃

羅仁地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副研究員

本子計劃主要是針對獨龍 / 日旺語進行調查研究。獨龍語與日旺語是漢藏語系藏緬語族中的同一個語言，其名稱之所以不同是因為說獨龍 / 日旺語的族群沒有統一的族稱，他們主要是以個別氏族的名稱自稱。此外，由於這一族群散居於中緬邊界，所以中緬人「賜」給他們不同的族稱。在中國境內的，主要聚居在雲南省貢山縣，人口有 5816 人，大部分集中在獨龍江兩岸，漢人就稱他們為「獨龍族」，稱其語言為「獨龍語。此外，住在怒江上游的怒族說的也是獨龍話，而住在怒江下游的怒族所說的 Anung「阿怒」話，也是獨龍 / 日旺語的一種方言。在緬甸境內的，主要聚居在緬甸北部卡欠邦的恩梅開江流域和邁立開江流域，人口約有十萬人，族名不一。緬人稱他們為 Hkanung「卡弄」，而族民自己卻根據氏族名稱自稱。最近住在緬甸的這一族群正在推廣以他們最大氏族 Rawang「日旺」作為全民族的統一名稱，而居住在中國境內的仍以「獨龍族」自稱，因此，本計劃以「獨龍 / 日旺語」作為該語言的名稱。

獨龍 / 日旺語是藏緬語族中語音上最保守的現代語言，其語音形式最接近原始藏緬語的形式，因此對於從事語言比較以及原始藏緬語的構擬工作都相當重要。由於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從事原始藏緬語的擬測工作，所以有必要對獨龍 / 日旺語的語音與語法有較深入的了解。

本子計劃的重點在於作語言調查，蒐集語料，並把語料輸入電腦，然後加以整理、分析、以擴大詞庫檔及話語語料檔。計劃進行的這兩年來，前後數次到緬甸與中國大陸進行語言調查工作，調查了獨龍 / 日旺語四種方言：日旺語的 Matwang 和 Daru 方言，獨龍的一鄉、三鄉方言。每個方言各收集了四千多個辭彙，一百多個句型和一些長篇語料。這些資料經初步的分析整理，已大部分輸入電腦，建立了辭彙資料庫及話語語料庫。

獨龍 / 日旺語的動詞有人稱、數、態、體、方向和式等豐富的語法範疇。用

於表達這些語法範疇的標誌包括動詞前後的附加成分、動詞韻尾的形態變化以及聲調的變化等。在這些語法範疇標誌中有一個動詞後加成分 - 引起我特別的注意。在分析整理語料的過程中，我發現這個後加成分所呈現的語法範疇具有多種含意，其核心作用是標記反身態，但其所涵蓋的語意空間卻包括了中間狀況，也就是說它有標誌「中間態」的功能。此外，這個後加成分也含有行為動作的結果狀態化的作用。

中間態標誌一向被藏緬語學者所忽略。我在獨龍 / 日旺語資料中發現中間態的標誌以後，就再回頭去重新分析其他藏緬語的語法範疇，結果發現有些也呈現中間態標誌。此外，我也進一步地以獨龍 / 日旺語的中間態標誌為例證，結合「標記論」(markedness theory)和「典型範疇論」(prototype category theory)的理論架構，提出了用於了解形態系統歷史的新方法。本人引用本分支計劃所收集的資料，針對以上所提出的觀點，撰寫了以下三篇文章：

1. "Reflexive and Middle Marking in Dulong/Rawang." Paper presented to the 2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October 6-10, 1995.

2. "Middl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Pan-Asiatic Linguistics (Bangkok, January 8-10, 1996), Volume 5.

3. "On the Utility of the Concepts of Markedness and Prototypes in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rphological Systems." 史語所集刊 66.4:1149-1185。

除此以外，經過這兩年來對獨龍 / 日旺語的調查研究，還有以下的初步觀察：(一) 獨龍 / 日旺語的人稱標誌是以第一人稱為主，然而卻與第一人稱的語意或語法角色沒有關係。(二) 獨龍 / 日旺語的長短元音不用於區別詞彙意義，只用於區別語法意義(與前人認為有區別詞彙意義的作用有些出入)。(三) 獨龍 / 日旺語有一種方向後綴，-r*(<*r*「來」)，似乎正在發展成「示證」(evidential) 範疇的標誌。(四) 獨龍方言其實只有兩個聲調(平調和降調)，而前人所謂的第三調只出現在實詞的弱化音節和虛詞上，並不出現在重音音節上。(五) 動詞聲調有變調的現象，而聲調變不變以句法範疇為條件，譬如，如果動是降調的，在名物化或帶有反身 / 中間態標誌的情況下，會變為平調。(六) 獨龍 / 日旺語呈現四種不同層次的形態：構詞形態、表達動詞與論言之間的構形、表達不同子句之間的關係的形態以及篇章形態。

在進行調查的過程中也發現獨龍 / 日旺族擁有非常豐富的口述文學以及傳統歌謠，但近幾十年來由於受現代資訊、基督教(以緬甸為主)以及共產主義(以

中國為主)的影響,年輕一代的族民不再學習口述故事,也不甚諳傳統歌謠(這些歌謠保留很多古老的辭彙和語法現象,年輕人往往不能完全聽得懂)。在中國的獨龍族,因為人口較少,所以同化的壓力較大。大陸政府對此語言的推廣與保留也不甚重視,因此有關獨龍語的語料屈指可數。在緬甸的日旺語,同樣地也面臨著被同化的危機。總而言之,這些寶貴的文化、語言、歷史資料,已逐漸在消失。本計劃也希望能對此族群的文化、歷史資料進行保存的工作,編寫日旺-漢詞典(包括辭彙的語素分析、詞源分析以及例句)、日旺-漢-英辭彙表、獨龍/日旺語方言比較辭彙表以及獨龍/日旺語的參考語法。此外,如果能搜集更多的傳統故事,希望能另編一本「獨龍/日旺族傳統故事集」。

重視南亞語系孟 - 高棉語族之研究

孫天心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副研究員

一、孟 - 高棉語在地緣上之重要性：

南亞語系(Austroasiatic language family)乃印北、華南及東南亞地區最古老的語系，下分門達(Munda)及孟 - 高棉(Mon-Khmer)二大語族，語種在一百五十以上，分布於上述遼闊地區，包含柬埔寨語、越南語等東南亞大陸主要官方語言，使用總人口超過一千萬。南亞語系非但為東南亞大陸主要語系，且為東南亞、華南地區最古老的語層，我國之藏緬、苗瑤、南島、卡岱等語族，甚或古漢語、漢語方言中都留有南亞語接觸影響之痕跡。根據若干還可能有親屬關係。若欲深入探究印北、華南、及東南亞地區之各種語言，不可忽視本語系的研究。

孟 - 高棉語族是構成南亞語系之要語族，包含東、南、北三語團，其中之北團(Northern Division)有卡西、克木、崩龍、莽等語支，除卡西語支在印度阿薩姆省外，其餘三支在中國境內都有分布，與中國南方諸語言關係密切。尤其是崩龍語支(Palaungic)，下有德昂(含布雷語、汝賣語、及梁語等)、達腦、攘、昂古(含求爾語、曼米語、戶語、烏語、墨克語、及瓦庫特語等)、拉梅特、及佉(含布朗語、拉佉語、巴饒克語、刺語、及阿佉語等)六語群近二十種語言，分布於雲南省西南部以及相鄰緬甸、泰國、寮國、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搭界地帶。本語支在南亞語系中與漢藏語系最有地緣關係，其先民在古籍中稱為「百蒲」，對於中國南方漢族及漢語之形成都有深遠之底層影響，尤其值得重視。

二、孟 - 高棉語在結構上之重要性：

孟 - 高棉語族語言的結構特點有十分突出。就語音層面來看，典型孟 - 高棉語的單詞展現所謂「一個半音節」(sesquisyllabic)之形成，亦即在重讀的主要音節前帶一個輕讀而語意虛化的次要音節。有趣的是，此種音節類型也見於與孟 - 高棉語接壤的苗瑤、卡岱、與藏緬語中，後者不無可能係長期受孟 - 高棉語結構影響後產生之結果。在超音段成分方面，典型之孟 - 高棉語沒有南方語言中常見之聲調，而代之以不同之成聲類型(phonation type)，亦即正常嗓音(modal voice)與氣

嗓音 (breathy voice)、緊喉嗓音(laryngealized voice; creaky voice)對立，可區別不同之詞彙。在語法方面，較留古語特徵較完整的孟 - 高棉語都有豐富的形態變化，特別是加中綴(infix)，少數語言還保留動詞在前的語序，這些語法特點在亞洲語言中較罕見，但卻與南島語相似，是探討此二大語族間親緣關係之重要依據。

三、研究之現況及展望

孟 - 高棉語族語種多而分散，分布地區主要東南亞跨國邊境地帶，山川險阻，重巒疊障，部分地區過去尚有獵頭習俗，實地研究條件艱難，累積之學術成果屈指可數。即以本語族北語團而論，有貢獻之學者包括美國 Robert Shafer (綜合比較)，Jerold Edmondson (本甘語)，Peter Ladefoged，Ian Maddison (佉語語音學)，法國 Michel Ferlus (拉梅特語) 及 Gerard Diffloth (本語支各語言)，英國 Gordon H. Luce (達腦語、佉語、攘語) Leslie Milne (崩龍語)、Harry L. Shorto (崩龍語、佉語、綜合比較)，日本三谷恭之 (佉語、拉梅特語、崩龍語) 及瑞典 Jan-Olof Svantesson (佉語、昂古語群)。中國境內之孟 - 高棉語除越南語 (即京語) 外亦全屬北語團，六十年代起始為大陸系統考察，目前已調查佉、德昂、布朗、烏、曼米、戶、克木、克比、莽、巴琉，本甘等多種語言，主力學者為王敬騷 (雲南)、顏其香、周植志、與李道勇 (北京)。

過去由於缺乏研究環境，台灣學者專門鑽研孟 - 高棉語者絕無僅有。雖有中文系學生以漢越語 (即越南語中漢語借詞) 音系為題撰寫論文，但考其主旨，仍係漢語聲韻學。民國六十九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提國科會專題計劃，調查在台西南少數民族之語言，由丁邦新教授負責佉語，筆者個人為此曾兩度赴埔里清境農場，高雄吉洋分場等地調查，並完成音系及詞彙報告二篇：(一) Phonology of the P'uman language (Mai-ping dialect)、(二) English-P'uman vocabulary。可惜語料提供人離開家鄉已久，語言能力已不能盡信，調查報告迄今尚未能正式發表。隨後，筆者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也在論文研究對象藏緬語族達尼語支(Tani)中發現南亞語底層問題，曾在論文 *A 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ani (Mirish) branch in Tibeto-Burman* 第四、五兩章中對此問題發表初步研究心得。自八十四年度起，筆者有幸主持本院「東南亞區域南亞語系語言研究計劃」，得以重新展開孟 - 高棉語研究。本計劃及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主題計劃下語言組之長期性子計劃，目標為針對東南亞地區孟 - 高棉語族重點語言進行深入實地調查，以彌補我國在此研究領域上之空白。目前，計劃順利進行兩年，筆者已完成兩種佉語群語言(班哲阿佉語及英臘佉語)之初步調查工作，蒐集了若干詞彙、語音、及句法材料，為日後深入描寫、比較研究打下良好基礎。經研究發現，此二種語言保留不少古語特徵，對重建古佉語能起重大作用。已引起國際著名南亞語專家 Gerard Diffloth 教授重視，在國科會資助下來台參與筆者計劃，共同進行佉語群比較研究。

今後，史語所擬長期依重 Diffloth 教授，進行學術交流。筆者正研擬計劃於明年春天與其共同前往泰國及雲南西雙版那調查崩龍語支昂古(Anguic)語組語言。另一方面，本所已申請到八十六年度蔣經國基金會資助，邀請其來華提供南亞語言學系列講座「Historical Linguistics of the Mon-Khmer Family」（已列為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班選修課程），將其多年來豐富之研究心得有系統地介紹到國內。同時，Diffloth 教授也將協助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建立孟 - 高棉語族基本研究資料及參考書籍，藉此建立國內本語族研究環境，增進國內語言學界了解此種亞洲主要語族之結構、歷史、及其與周圍語言(包括漢語)間之相互關係。

東南亞區域安全體系的研究： 理論與實際

林正義

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

冷戰結束之後，東南亞地區隨著美國自菲律賓基地撤出、蘇聯帝國瓦解而淡出越南、中共綜合國力日漸上揚，而面臨權力平衡結構調整的壓力。東南亞國協自一九六七年成立以來，一向避免直接討論國防安全問題，只集中在「低層政治」(low politics)的經濟、社會、文化事務合作。但是，東協在高棉問題上，結合區域外國家及聯合國的介入，成功地迫使越南撤軍，促使高棉人民自決及高棉中立化。這一經驗的啟示使東協於一九九一年決議將「東協擴大外長會議」(Post-Ministerial Conference)作為與(區域外國家)對話夥伴討論區域和平、安全的場合。一九九三年東協部長會議更決定一九九四年東協部長年會在曼谷舉行期間，召開「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東協國家由避談安全議題到主導「東協區域論壇」每年召開，是東南亞區域安全體系一項重大的發展，而這也是本研究計劃探討的其中一個主題。

「東協區域論壇」是官方性質，而此種政府官員參加的安全對話通稱為「第一軌道」(Track One)安全論壇。東南亞地區除了「第一軌道」安全論壇的出現之外，也興起非官方性質，由學者、專家為主所組成的「第二軌道」(Track Two)安全論壇。「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於一九九三年在吉隆坡宣佈成立，由東協國家及美國、日本、加拿大、澳洲南韓等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機構發起，即是「第二軌道」安全論壇的典型例子。東協國家在冷戰之後，先後在東南亞出現的兩個最重要安全對話論壇，扮演重要的角色，顯示出東協以中、小國家的實力，尋求在亞太地區安全事務上能提高發言權，以集體的力量來制衡美國、中共、日本在東南亞的涉入。

本計劃先探討安全的概念，發現東南亞國家對安全的概念顯然不同於西方國家，強調內部安全及多層面的安全觀點是最主要的特色。這種綜合性(comprehensive security)範圍較大，經濟與社會發展、環境保護與民族建設都是安全的面向，不像西方安全的概念僅強調軍事的安全。

本計劃在探討安全概念之後，討論東南亞安全體系形成的途徑，發現東南亞國家，除了以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為主的共同性安全(common security)及強調不重形式安全討論的合作性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之外，仍沿用冷戰時期所遺留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等傳統性國家追求安全的途徑。在實例檢證方面，本計劃除以「東協區域論壇」、「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為個案外，亦探討部分東協國家的國防政策、東協處理高棉問題的策略，及東協在經濟、社會、文化、科學、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功能性合作。由上述這些理論與實證，來分析東南亞國家是否已成為一個國與國之間根本放棄武力使用，而且有高度政經整合的安全社群，抑或只是因政、經實力不足以對外使用武力，而需藉各項行為準則限制來獲致和平的安全體制。

由於南海島礁主權爭端，涉及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汶萊、印尼等東南亞國家，而台灣及中共亦牽涉在內，成為後冷戰時代東南亞區域和平穩定的最大變數。在探討東南亞區域安全體系時，難以避免觸及南海爭端，因此，本計劃亦討論東協國家對南海問題的整體立場、印尼「南海會議」的角色及各項解決南海問題的建議方案。

為執行本計劃，主持人除借助於本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資料室的各東南亞國家報紙之外，亦多次赴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蒐集資料。高英茂教授、劉復國教授、葉國興先生及郭崇倫先生提供本計劃所需的「東協區域論壇」及「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多項資料。若無他們的協助，主持人在從事此一主題計劃研究時，必定困難重重。

面對新挑戰：東南亞農業多樣化的策略

徐正光、何泰寬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助理

一、東南亞農業多樣化發展的現況

農業多樣化是近二、三十年來，東南亞各國農業發展的一致趨勢，並且逐漸成為各國農業政策的重要議題。同時，農業多樣化的進程以及時間，在各個國家也都有所不同。

（一）印尼

從1969年的第一期五年發展計畫開始，印尼的農業發展就朝著四個方向前進：密集化、廣泛化、多樣化、復原化。一直要到第五期的經濟發展計畫（1989-1994），多樣化才被賦予政策的優先性。

印尼政府的農業多樣化政策，指稱的是由農戶合營農作物與家畜畜養，以期降低風險，更有效率地運用農戶資源來獲取所得。農村地區的農業多樣化，除了增加農戶的所得來源之外，也包括新技術的引進，與創造非農業性的就業機會。非農業就業機會的創造，也被視為是國家經濟結構轉型的一部份。

（二）馬來西亞

在獨立的早期，馬來西亞的經濟發展與典型的開發中國家並沒有兩樣，都是以商品的生產與單一的出口農作物為主導，橡膠與錫是僅有的兩項出口品。這使得馬來西亞的經濟容易遭受到出口不穩定與貿易條件惡化的影響。馬來西亞的出口農業多樣化策略，就是從原本單一的橡膠出口，增加到橡膠、棕櫚油、可可亞等三種出口農作物。這些農作物都是由私人開始栽種，然後被大量種植於政府的土地開墾計畫區域。棕櫚油的生產相當符合官方消滅貧窮的計畫，棕櫚樹也取代橡膠、被大量種植於官方的Felda（Federal L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計畫當中。另外一項導致棕櫚油生產取代橡膠生產的原因，是因為橡膠出口的稅制結構帶給

橡膠出口商很大的負擔。再加上橡膠價格在1970年代的下跌，終於使得棕櫚油的出口在1981年超過橡膠出口。

國內糧食生產部門，包括稻米與家畜畜養。其中養豬與家禽類在生產上都具有高度的效率。稻米生產在1970年代有巨幅的成長，馬來西亞官方雖然繼續採取各項提高誘因的措施，稻米生產在1980年代卻呈現停滯的現象。國家農業當局在1984年開始改革農業政策，將稻米集中在主要的灌溉區域，也不再追求糧食供應自足的目標。此外，由於以往的匯率政策一直是歧視出口貿易，馬來西亞官方也已經採取匯率自由浮動的政策，希望透過匯率的貶值來促成生產的多樣化。馬來西亞的新匯率政策，在1985年至1989年之間，促進了其他農業的出口，特別是花卉、漁業養殖、與家禽，平均每年以61 %、46 %、31 % 的速率成長。

（三）菲律賓

在西班牙殖民時期，馬尼拉麻與糖類是菲律賓對外貿易的兩項產品，殖民地的經濟型態也一直持續下去。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菲律賓百分之九十的出口都是商品農作物，包括糖類、椰子、馬尼拉麻、煙草等。

菲律賓在1962年解除外匯管制，比索對美元貶值，給菲律賓的出口農業部門帶來興盛。在美國對古巴實施禁運後，美國增加了對菲律賓糖類的進口配額。同時，海洋運輸設備的改善，也使得菲律賓從以往的乾椰肉出口，轉變成為椰子油的出口。這些發展，再加上綠色革命不僅解決了糧食的供應問題，也將多餘的土地釋放出來種植飼料穀類、棉花、橡膠等其他農作物。在1970年代中期，椰子和蔗糖的種植面積增加了兩倍，香蕉和鳳梨也成了新種類的出口農作物。

197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工業國家對於糖類生產的大量補助引發世界價格的下跌、加上美國優惠關稅結束等因素，菲律賓的糖類開始衰退。椰子的生產，也因為替代品的激烈競爭、價格的不穩定、以及美國優惠關稅在1974年終止，使得椰子生產逐漸衰退。馬尼拉麻在戰前曾經是菲律賓主要的出口農作物，在戰後即因為面臨合成纖維與其他國家天然橡膠的競爭，出口量也不如從前。

香蕉的生產以往僅足以滿足國內消費，直到1960年代因為日本關稅的降低，再加上跨國公司的投資，香蕉才成為出口農作物。鳳梨也是非傳統的出口農作物。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由於夏威夷土地和勞動成本的上升，同時菲律賓的運費也較為便宜，使得跨國公司將鳳梨從夏威夷轉至菲律賓栽種。到了1982年，菲律賓成為世界第二大的鳳梨罐頭出口國。

此外，其他的出口農作物還包括飼料穀類、咖啡、棉花、蔬菜、水果等。以往它們的生產僅足以供應國內的消費，現在則要同時供應國外的市場。棉花種植的最終目標是要取代棉花的進口，替整個菲律賓節省每年大約五千萬比索的外匯。水果主要包括芒果、西瓜、木瓜，其實果大部份是銷往日本與香港。一些私人的公司也正在研究出口花卉的可能性。

（四）泰國

農業在泰國經濟中歷來佔有重要的地位。在1950年代以前，泰國耕地面積的95%都是稻田，出口總值的50%左右是來自稻米。泰國農業由單一種植朝向多樣化的種植，肇始於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中期。這一時期，稻米的種植面積與總產量持續增加，但是其他農作物的成長則更為迅速。其中增長最為迅速的，就是檳麻黃麻、玉米、以及木薯。這三種農作物以往在泰國的種植業中，並不佔有什麼重要地位。玉米生產的迅速發展，與日本大量購買玉米做為飼料有關。日本戰後畜牧業的發展，造成對進口飼料的需求。由於泰國的玉米生產成本低廉，運費也較為便宜，因而逐漸取代美國的進口飼料。泰國檳麻黃麻的發展，則是由於世界主要黃麻出口國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60年發生水災，引起國際市場黃麻供給短缺，紛紛轉向泰國購買，因而刺激泰國檳麻黃麻的生產。泰國木薯生產的發展，則是因為歐洲家畜養業對木薯粉的需求擴增。在1957年時，這三項產品佔出口總值的比重，合計不足3%。但是到了1963年，這三項產品的合計值已佔泰國出口總值的16.7%。同時，稻米出口所佔的比重，也從48%下降為35.4%。

1960年代以後，泰國農業繼續朝著原有的多樣化趨勢發展，逐步改變了泰國農業種植的結構。到了1980年代，玉米在全國各類非稻米作物中位居首位，種植區域則擴散到中部、北部、東北部。木薯由於適應性強，種植技術簡單，再加上歐洲畜養業對木薯的需求激增，木薯種植在泰國迅速發展，泰國也成為世界最大的木薯粉出口國。到了1970年以後，玉米與木薯粉合計出口總值，已經超過稻米的出口總值。

二、農業多樣化的討論

（一）學理上的討論

Taylor (1994) 認為東南亞各國農業的多樣化，是基於以下的理由：

1、促進經濟結構的轉型

對東南亞各國而言，農業多樣化是伴隨其國家經濟轉型而來的一項產物。在1965年至1988年之間，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都經歷了顯著的經濟結構轉型。在這23年之間，農業部門佔全國生產總額的比重，在印尼從56%下降到24%，馬來西亞則是從28%下降到21%，菲律賓是從26%下降到23%。泰國則是從32%下降到17%。

2、克服因為國際糧食價格下跌，所帶來農民的收入低落

在1970年代至1985年之間，多數出口農作物的價格巨幅跌落，例如糖類、棕櫚油、椰子油、橡膠、乾椰肉等。東南亞各國佔全世界橡膠、棕櫚油、椰子油出口總值的75%，國際出口農作物價格的低落，對這些國家的經濟衝擊相當的大。大部份國家所採取的策略，是鼓勵其他非糧食事業的經營，以期增加農民原本就困窘的收入。此外，生產、價格波動、所得等的風險，也可以透過多樣化予以降低。

3、有效率地使用資源

這些包括對於空間的多向度使用，發展多層的栽種系統；對於時間的多向度使用；生產事業的整合，讓某項事業生產過程的廢料，可以成為另一個事業的生產投入。透過整合性的生產計畫，讓廢料予以再生。

4、密集農村人力的使用

農業生產的多樣化，會增加農村地區的勞動力需求、減少農村閒置的人力。特別是勞力密集的農業，例如蔬菜、水果、花卉、漁業、家畜等。

5、東南亞各國對於糧食的需求正持續增加，糧食的需求也從傳統的稻米，轉向水果、蔬菜、魚類、肉類，與高附加價值的糧食。農業多樣化正足以回應各種不同農產品的需求改變。

除了Taylor所提出的理由之外，Kamaludin則認為，多樣化生產是因應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之一。保護主義通常是針對特定的產品。產品的多樣化、避免過分依賴單一的產品，因而可以降低貿易保護障礙的影響。

雖然大部份的學者，都傾向於從創造就業機會與穩定農民所得的角度來看待農業多樣化，但是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見解。例如Ofreneo (1987) 在探討菲律賓農業發展歷史時就指出，帝國主義的機構熱中於促進第三世界國家農業部門的現代化，其目的是要將第三世界更緊密地結合到資本主義體系當中，確保初級原料

的供應穩定，並且為工業產品提供市場與投資的地區。Ofreneo檢視菲律賓的出口農作物，從早期西班牙殖民時期的馬尼拉麻與糖類，到美國殖民時期的糖類、椰子、馬尼拉麻、煙草，到第二次大戰後至今的橡膠、香蕉、鳳梨、與其他新的出口農作物，都是在殖民政府或是跨國資本的主導下所完成。換句話說，整個出口農業多樣化的過程，就是資本主義逐漸深化與擴充到農業的過程。其結果是將菲律賓變成是工業國家廉價的糧食生產基地，菲律賓農民的生活水準不但沒有獲得改善，反而在農村造就了一群數量龐大的無土地貧民階級。袁寧（1985）在論及泰國農業結構變化時也指出，由於泰國的農業多樣化都集中在出口農作物，使得泰國農業經濟更加依賴世界市場，國際市場的商品價格波動，都會對泰國經濟造成重大的衝擊。

（二）從不同的角度看農業多樣化

1、官方的觀點

不同的部門，對於農業多樣化的認知也不盡相同。以馬來西亞為例，馬來西亞官方之所以提倡農業多樣化策略，主要是因為1985年至1986年之間，國際棕櫚油價格下降導致農業所得減少，以及馬來西亞糧食進口數目持續地增加。另外一個原因是，傳統的糧食作物不再對農業部門有所貢獻，使得農業多樣化策略被認為是有助於恢復農業，並對整體的經濟成長有所貢獻。換句話說，官方的多樣化策略，是基於減少所得的極端變動、糧食進口替代、以及擴充成長的根源等因素。

馬來西亞官方認為，馬來西亞從以往完全依賴橡膠的生產，轉變成更具多樣化的農作物出口（包括棕櫚油、可可亞、木材等），除了市場需求與適當的技術投入之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基於農作物出口所得不穩定的考量。馬來西亞的替代性糧食生產，主要是集中在稻米生產部門。由於官方的政策並未達到提高稻米生產力的目標，為了減輕政府在稻米政策上的龐大財政負擔，馬來西亞政府已經決定將稻米生產集中在產量豐富的少數地區，官方也不再將稻米供應自足視為優先目標，國內生產不足的稻米則從國外進口。馬來西亞官方認為，在進口替代糧食的種類中，小麥、溫帶水果、大豆等因為氣候因素的限制，並不合適在馬來西亞生產。稻米、玉蜀黍、乳品也因為不具有生產上的比較利益，不適合作為進口替代的目標。

在擴充成長的根源方面，馬來西亞政府希望透過垂直的多樣化策略，將農業成長與工業部門連結起來。將工業化的策略，指向資源密集與勞力密集的工業生產活動。馬來西亞官方認為，工業加工對於農業初級原料的需求，將可以確保農村有穩定的所得來源。穩定的農村收入，則進一步導致對工業產品的需求，同時給農業與工業帶來穩定與成長。

2、當地公司的觀點

馬來西亞的種植公司，一直過於依賴橡膠、棕櫚油、可可亞等三種出口農作物。由於在1985年至1986年之間這些產品的世界價格低落，種植公司開始注意過於依賴這些出口農作物的弊端，並且積極地尋求其他農作物的生產，包括水果與家畜的大規模種植與畜養。

目前馬來西亞水果的出口市場並不大，有將近90%是銷售至新加坡，其次是香港。出口水果的排名分別是榴連果、香蕉、西瓜、木瓜等。種植公司認為，水果的栽種不但可以替代溫帶水果的進口，也可以作為出口的商品。木瓜、香蕉、楊桃、番石榴等，是種植公司認為最具有出口潛力的四項水果。水果生產必須面臨來自其他鄰近國家的激烈競爭，除此之外，水果產品的供應數量與品質都不夠穩定。

馬來西亞主要飼養的動物包括家禽、牛隻、水牛、山羊、綿羊、豬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家禽與豬。種植公司的家禽畜養，則已經有良好的基礎，而且成為在技術上相當進步的工業。

3、外國投資公司的觀點

外國投資者則認為，馬來西亞溫暖的氣候與高濕度形成天然的溫室，特別適合熱帶性作物的栽種。外國投資者認為，政府與私人部門應該在兩個問題上充分合作：首先是馬來西亞商品對國外市場的取得，其次，是投資具有潛力的熱帶水果、蔬菜、花卉栽培等項目。

銷往外國市場的產品，主要是經由海運或是空運。空運的貨櫃空間有限，費用也遠較海運昂貴。為了克服這些困難，外國投資公司認為必須從事以下的發展：克服日本、美國與澳洲的貿易障礙；改善農作物品種，可以承受長時期的運送過程；空調的冷藏櫃，以便利海運；在國外市場做媒體的促銷活動等。此外，由於面臨其他國家的激烈競爭，必須改善生產的品質、研發與生產技術的改進。

外國投資企業認為，馬來西亞將在21世紀成為熱帶水果、蔬菜、花卉栽種等產品的主要出口國。此外，加工產品也是馬來西亞農業未來的趨勢

三、結語

總而言之，東南亞各國近二、三十年來的農業多樣化，除了農作物生產的多樣化之外，也朝向高附加價值的農漁作物加工，並促進農工部門之間的生產連

結。在關貿總協定（GATT）以及世界組織（WTO）所引領的貿易全球化與國際化的趨勢影響下，東南亞國家的農業生產與貿易將遭受到進一步的衝擊。面對此一挑戰，東南亞各國農業多元化趨勢也將會持續下去。

四、參考文獻

袁寧

1985 戰後泰國種植業產品結構的變化，〈《東南亞》〉，1985（4）：30-36。

Ani bin Arope

1989 ‘Diversification of Agriculture：Local Investor's Perspective’，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ment in Diversification of Agriculture organized by the Agricultural Institute of Malaysia，Kuala Lumpur，20-22 July 1989。

Boyce, James K.

1993 “The Philippine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impoverishment in the Marcos Er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Kamaludin, Asmat

1990 ‘Malaysian Strategies to Counter Protectionism’， “The Malaysian Economy in Transition”。Editor, Ambrin Buang，Kuala Lumpur：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Malaysia 1990。

Madson, John

1989 ‘Advancement in Diversification of Agriculture：Foreign Investor's Perspective’，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ment in Diversification of Agriculture organized by the Agricultural Institute of Malaysia，Kuala Lumpur，20-22 July 1989。

Mohd Sheriff Mohd Kassim

1989 ‘Diversification of Agriculture：Government Perspective’，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ment in Diversification of Agriculture organized by the Agricultural Institute of Malaysia，Kuala Lumpur，20-22 July 1989。

Ofreneo, Rene E.

1987 “Capitalism in Philippine Agriculture”，Quezon City，Foundation for Nationalist Studies。

Taylor, Donald C.

1994 ‘Agricultural Diversification：An Overview and Challenges in ASEAN in the 1990s’， “ASEAN Economic Bulletin”，Vol 10, No 3：264-279。

東南亞發展過程中階級結構轉型 與中產階級之興起：菲律賓、印尼、 馬來西亞和泰國之比較研究

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籌備處研究員

一、

本計劃於第一年計劃（主要是文獻收集、整理和熟悉東南亞社會變遷與結構轉型之已有研究成果）結束時，邀集東南亞五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的社會學者來台商討第二年計劃的進行，並在以「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Southeast Asia」為題的研討會中，來訪學者共發表了六篇論文，旨在回顧當前各國有關東南亞中產階級研究之成果，並以為第二年進行實際之經驗研究之基礎。

會後各篇論文均加以修改，並加了一篇，預計這些文章可由本計劃出版成書，或以 occasional paper 方式發表。更重要的是，藉由本次研討會也組成了執行第二年研究計劃的各國協同研究小組。

二、

第二年計劃重點在於實際進行東南亞中產階級（SEAMC）實證調查研究。經主客觀各因素考慮之後，選定的研究國家研究小組包括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至於越南則因種種條件尚未能配合，暫時延後。這四個協同研究小組的負責機構分別是：

1. 菲律賓：菲律賓國立大學的 Center for Integrative and Development Studies，參與人員包括 Cythia Banzon Bautista 教授（社會學）、Temario Rivera 教授（政治學）。

- 2 . 印尼：Kompas Daily 的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參與研究人員包括 Univ. Kristen Satya Wacana 的 Arief Budiman 教授（社會學）、Ariel Heryanto 教授（人類學）和 Kompas 的 Daniel Dhakidae 博士（政治學）。
- 3 . 馬來西亞：Institut Analisa Sosial (INSAN)，參與人員包括馬來亞大學的 Jomo K. S. 教授（社會學）和馬來西亞國立大學的 H. E. A. Rahman 講師（社會學）。
- 4 . 泰國：Chulalongkorn 大學的 Center for Social Development Studies，參與人員包括 Surichai Wungaeo 教授（社會學）、Anusorn Limmanee 教授（政治學）、Prudhisana Jumbala 教授（政治學）和 Chantana Banpasirichote 博士（社會學）等四位。

從今年四月開始，這四個研究小組均已陸續完成有關馬尼拉、雅加達、吉隆坡和曼谷四城市中產階級調查之問卷設計，刻在進行田野調查，預計各城市調查 5 0 0 到 1 0 0 0 個樣本不等。在問卷設計過程當中，我負責修正和整合的工作，以求各國問卷均有相當的一致性，以便未來的比較分析。六月下旬，我亦前往菲律賓再與馬尼拉研究小組做進一步之協調。在下半年，我除了將密切瞭解研究進度之外，並將為各國之研究報告內容求取共識，以及籌商第三年在台北召開研究成果發表會事宜。

三、

第二年的重點工作就是放在協調以上四國研究小組之組成、擬訂比較研究的大綱和四國問卷的設計，同時也繼續收集有關東南亞國家中產階級之研究書籍和論文，至今已分別整理之，將做為撰寫有關這四個東南亞國家中產階級研究回顧之論文參考材料。

值得一提的是有關東南亞中產階級經驗調查的問卷設計過程。由於我在過去幾年已從事了台北、香港、漢城和新加坡這東亞四個地區中產階級經驗調查（EAMC 計劃）。因此在構想馬尼拉、雅加達、吉隆坡和曼谷的問卷之初，上述 EAMC 計劃的四份問卷就成為可供參考和依據的設計基礎。當然，必要的修正和刪減都經由四國的研究小組成員仔細討論後，才做了四個首都問卷的定案。這四份問卷的內容，都有以下這幾部份：

- 1 . 基本背景資料與出身。

- 2 . 受訪者家庭組成、受訪者父母背景以及受訪者配偶的父母背景。
- 3 . 經濟狀況與消費理財方式、現代設備和家內分工。
- 4 . 家庭觀念與子女課外活動。
- 5 . 對階級差異的認知、對中產階級角色的態度和地位焦慮的感受。
- 6 . 對社會不公、貧窮、大企業與勞資關係的態度。
- 7 . 對社會問題和社會運動的認知與支持。
- 8 . 對政府角色、民主前途的態度和政治行為。
- 9 . 移民意向。
- 10 . 對整體社會發展方向的價值選擇。

四、

至於本計劃所預期的最後成果之達成，則有賴於超越上述問卷調查的經驗資料，而必須將東南亞近二十年來的發展與大轉型視為用來理解中產階級興起的大環境和歷史脈絡。基於此，我是有企圖在未來能將東亞與東南亞的研究成果做一較宏觀的比較，分別探討這兩個區域結構轉型與中產階級興起的脈絡，兩個區域中產階級社會文化性格的異同，以及兩區域中產階級與政治民主化前途的關係等。

東南亞國家社會福利政策之比較研究：

社會安全部分之探討

覃怡輝

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副研究員

社會福利政策或社會政策的內涵，依社會在不同時空所面臨的不同社會問題，而各有其不同的定義。例如，從時間的角度來看，我國在民國三十四年時的社會政策，其內涵只有民族保育、勞工、農民和社會安全四大政策，而到民國五十三年時，其內涵就進而區分為社會保險、國民就業、社會救助、國民住宅、福利服務、社會教育和社區發展等七大項，而再從空間的角度看，英國的社會政策內涵，無論在學界或行政界，都大致區分為社會安全、教育、健康、個人社會服務、就業等五大項，或是再加上住宅，一共區分為六大項。因此，各國家在不同的時空裡，其社會政策的項目大都會各有不同。一般而言，總不外乎社會安全、健康、就業、住宅和個人社會服務等五大項。在本專題研究中，在第一個階段，將把研究的焦點先集中在「社會安全」之上，以後，再逐步把重點移轉到其他項目之上。

近年來，東南亞國家的經濟都在快速地成長，其內在的意義，就是這些國家的「工業化」程度不斷的提高。而「工業化」程度不斷提高的結果，就是有越來越多的國民，變成了薪水階級的受僱者，例如我們台灣目前受僱者的人口比例，就已高達就業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八。由於受僱者必須靠出賣其勞力，換取薪水來維持其個人或家庭的生活，一旦面臨傷病、失業、殘廢、老年等危險事故而不能繼續受僱時，他們的收入便為之中斷，生活便隨之發生問題，這時，政府便要以「社會安全政策」的方式來介入，以幫助這些發生問題的個人或家庭，克服其危機。因此，「社會安全」是社會工業化之後的一種必需制度。經濟正在快速成長的東南亞國家，他們也一定需要建立自己的社會安全制度，以解決其受僱者所可能面臨的所得不安全的危機。

在理論上，社會安全政策可以區分為三大類型，第一種類型是「社會救助」，

它強調個人和家庭的責任，只有在個人或家庭已無法解決其問題時，社會和政府才出面給予援助；第二種類型是「社會津貼」，它是站在另一個極端，不管個人或家庭是否發生問題，社會和政府都定期地給予給付，使問題消弭於無形，完全不會發生；而處於中間的第三種類則是「社會保險」，它是預作防患的準備，當個人或家庭發生問題時，不管他們是否有能力解決，社會和政府都馬上就給予援助，不需等到個人或家庭已耗盡財源，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才提出援手。本研究即本著這社會安全政策的三大類型，而去觀察東南亞國家的發展軌跡。

由於東南亞地區的國家數頗為眾多，計有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和汶萊等十國，因此對這廣大地區的專題研究，除非合作研究，如靠一個人來從事，勢必要分年、分段來進行。原則上，筆者是將這項研究工作分為兩年、兩階段來進行。在第一年的研究計劃中，由於準備時間較為倉促，因此只選擇地理鄰近的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三國作為第一階段的研究對象。而在第二年的研究工作中，計劃去訪問其餘的七個國家，但這第二年便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難和挑戰，其中的一個挑戰是「政治」性的限制問題，例如，汶萊政府規定：台灣的旅客必須乘坐汶萊航空，而且必須第一站到汶萊，然後才能取得其入境簽證；這種規定使得行程安排十分不方便，實在沒有妥善的解決辦法，以致最後忍痛決定放棄汶萊，因此第二年只訪問了六個國家。總計兩年之內，一共走訪了東南亞九個國家。

綜觀東南亞九個國家的社會安全制度，除了新加坡之外，都是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兩個部門的受僱者，各自隸屬於不同的法律和制度，接受不同方案的保障。新加坡由於是一個城市國家，領土和人口的規模都比較小，而且其每人國民所得的水準也最高，因此其兩個部門共同採用一個公積金制度。而相對地，其他東南亞的國家，無論是領土和人口，其規模都比較大，因此都採行了公私兩部門分立的辦法，兩個部門各有其不同的社會安全制度。就公共部門而言，由於這部門的受僱者人數，在各國人口中大約只有 5% 以下的極小比例，因此所有的東南亞國家，都對其公共部門的受僱人員，最先提供了社會安全的保障，其中，泰國、馬來西亞、越南、柬埔寨和緬甸等五國，是以社會津貼的方式提供保障，而印尼、菲律賓、寮國三國，則是以社會保險的方式提供保障。

而在私人部門方面，目前，寮國、柬埔寨和緬甸三國，尚未提供社會安全方面的保障，而其餘的五國則已提供了不同形式的社會安全保障，其中，馬來西亞和印尼是和新加坡一樣，採用了公積金的制度，而泰國、菲律賓和越南，則是採用了社會保險的制度。由於私人部門的人數比例眾多，因此本研究的重點將集中在私人部門方面，也因為如此，本研究所可能進行比較研究的國家，也將只限於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和越南等六國。

從時間的角度去看，東南亞六國的社會安全制度，建立最早的是英屬殖民地時代的馬來亞，它在 1951 年尚未獨立的時候即已建立其公積金；其次是同屬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它也於四年後建立其公積金。兩年後，曾被美國統治的菲律賓，也仿照美國的榜樣，而建立其社會保險式的社會安全制度。以後，再事隔二十年，印尼才以馬來西亞為規範，也建立其公積金式的社會安全制度。最後，到了 1990 年，泰國才歷經波折，正式通過社會安全法案，建立其社會保險式的社會安全制度。兩年後，越南也於 1992 年通過其社會保險的法律，此法律的基本保障，也明文記載於 1994 年所通過的勞動法中。

在六個有社會安全制度的東南亞國家中，恰巧有半數的國家採行公積金制度，另半數的國家則採行了社會保險的制度；採行公積金制的國家，其社會安全所保障的危險事故都是退休、死亡、殘廢和移民等四項，而採行社會保險的三個國家中，菲律賓和越南所要保障的危險事故都是明定為疾病、生育、殘廢、退休和死亡等五項，而泰國則是分階段來擴大其保障的範圍，目前，泰國社會保險所提供的保障項目是疾病、生育、殘廢和死亡，未來幾年內所要逐步擴大的保障項目依次是老年、兒童和失業。

東南亞這幾個對私人部門有社會安全措施的国家，其國家幅員的大小，差異甚大，不過其努力的目標都是一樣的，都是想對其全體國民，提供基本的保障。目前，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已對其公私部門 69.05% 的就業人口，直接提供了保障。其他的國家，在其私人部門之內，除越南尚無統計資料出來之外，菲律賓的保障範圍已高達 65.52%，泰國 55.7%，馬來西亞 53.18%，最低的是印尼，只有 25.25%。

由於保障方式和保障項目的不同，因此每個國家被保險人的繳費負擔也彼此相差甚大，其中繳費占月薪比例最高的是新加坡，高達月薪的 40%，最低的是泰國，只有 1.5%；其他的國家依序是：馬來西亞 22%，越南 20%，菲律賓 8.4%，印尼 3%。基本上，繳率比較低的國家，其給付水準也會相對的比較低，這是邏輯上的必然結果，尤其是如果保費還有最高限額的規定，則其給付水準將會更低。由於東南亞國家的社會安全制度，大體上是採行一元化的制度，不像歐美國家或台灣（至少在名目上），除了社會安全的保障之外，還有職業給付的制度，因此，觀察其繳費率的高低和保障項目的多寡，大致就可以判斷其保障程度的適當性。

附表一、東南亞六個國家的重要指標數字

	泰 國	馬來西亞	新加坡	印 尼	菲律賓	越 南
面積 (萬平方公里)	51.4	33.0	0.0641	196.6	31.5	34.7
年中人口 (百萬)	59.4	19.5	2.9	190.7	68.6	72.5
人口密度 (人 / km)	113	56	4548	97	218	209
性別比例 : (M:F)%	100.04	103.04	101.54	99.4	101.09	95.32
0-14	29.0	38.0	23.0	33.0	39.0	38.0
人口組合 15-64	66.0	58.0	70.0	63.0	58.0	57.0
(%) 65 +	5.0	4.0	7.0	4.0	3.0	5.0
預期壽命 男	67	69	72	59	63	65
(出生) 女	72	73	77	62	66	69
每人 G N P (US\$)	2040	3160	19310	730	830	170
G 生 農業	-	-	0.2	17.4	22.0	27.7
D 產(%) 工業	-	-	36.1	40.7	32.7	29.6
P 值 服務業	-	-	63.7	41.9	45.3	42.7
每人能源消費	634	1388	5952	319	267	107
電 每人生產	989	1572	6222	225	405	139
每人消費	854	1383	5656	188	337	100
力 普及率	74	85	100	39	56	35
安全飲用水 都市	89	96	100	68	85	47
普 及 率 鄉村	72	50	100	43	79	21
消費者 1992	4.0	4.7	2.3	7.5	8.9	37.8
物 價 1993	3.4	3.5	2.4	9.7	7.6	8.3
指 數 1994	5.1	3.7	3.6	8.5	9.0	9.4
94 年外匯存底 US\$M	30280	30235	58177	13321	7125	-
每病床人數	606	481	290	1645	756	351
每醫生人數	4425	2411	742	10991	6648	2533
每人日蛋白供給量	54	60	87	61	52	52
每人日卡洛里供給	2434	2889	3114	2753	2257	2250
1994 年對美元匯率	25.15	2.62	1.53	2164.2	26.42	10850

附表二、東南亞國家私人部門受僱者社會安全制度的比較

	泰 國	馬 來 西 亞	新 加 坡	印 尼	菲 律 賓	越 南	
通過法案的時間	1990	1951	1955	1977	1957	1992	
保障方式	社會保險	公積金	公積金	公積金	社會保險	社會保險	
方案之名稱	S S A	E P F	C P F	ASTEK	S S S	BHXH	
現 保 危	疾病	退休	退休	退休	疾病	疾病	
金 障 險 給 的 事 付 故 所	生育 殘廢 死亡	死亡 殘廢 移民	死亡 殘廢	殘廢 死亡 移民	生育 殘廢 移民 退休 死亡	生育 殘廢 退休 死亡	
未來要保障的 危險事故	老 兒 失 年 童 業						
被保險人數(萬人)	493	359	130*	760	1550		
占受僱者之%	55.7	53.18	69.05*	25.25	65.52		
繳費率 (占月薪%)	1.5	22	40	3.0	8.4	20	
費率分攤：							
僱主	0.5	10	20	1.5	3.36	15	
受僱者	0.5	12	20	1.5	5.04	5	
政府	0.5	0	0	0	0	0	
繳費最高限額	15,000	無	2,400	200萬	9,000	無	
實 方 物 給 案 付 的	醫療給付 由特約醫 提供。	在 EPF 下 設立房屋 方案	在 CPF 下 設立房屋 、投資、 保險..等 15 方案。		疾病保險 2.5%，由 主僱平分		
僱 方 主 案 責 任 的 給付。	工人賠償 基金：醫 、殘、喪 、遺、重 建。現金	SOCISO / WCA、疾 病和生育 津貼方案	W C A	職業傷害 ，在 ASTEK 中包含死 亡保險。	受僱者賠 償		

我正在研究的菲華商聯總會

張存武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

東南亞研究當然不等於該地區的華僑華人研究，後者只是前者中的一部分，二三十年以來，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

華僑華人問題是複雜的移民問題，其內容包括：移民原因（移出、移入地區政治經濟等情況），遷移過程，移民在移居地的營生及調適，如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等方面，以及其與祖居地的關係，對其影響。移民除以個人或家庭為單位奮鬥外，通常都組織各種血緣、地緣、語緣、業緣性團體，以互相合作，防衛發展。移居東南亞及世界其他各地區的華僑華人都是如此。

西班牙統治菲律賓後，華人，主要為閩南人，始大量移菲。然因西國對華人之統治異常苛虐，華僑幾無自願社團組織。一八九八年美國取代西班牙的地位後，行民主統治，發展經濟、教育，各地華僑社會始有各種社團之組織，中以岷里拉（馬尼拉）中華商會（名稱屢更）最為重要。該會一九〇四年成立，乃為一首都商會，然實為全菲華僑服務，如發展僑教，向美菲當局爭取利益，抗拒不公，與中國政府溝通，號召僑民支持祖國抗日等。不過該會畢竟非全菲各地僑社選派代表組成者，代表性不足，而二次大戰後菲國獨立，民族主義高張，各種菲化案接二連三，華僑以為該會應付無力，乃於一九五四年春另組一個如今稱為菲華商聯總會 (Federation of Filipino -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 的團體，也就是我本年研究的對象。該會由全菲各種商會派代表組成，有充分的代表性，且經費充裕，乃中華民國政府及菲律賓政府承認代表全菲華僑華人的團體。於是岷里拉中華商會退居於純首都 - 大馬尼拉商會。

商聯總會成立至今已逾四十年。隨著中菲兩國內政及國際、政情的發展，該會成員的身分 - 國籍，會的宗旨、組織、會務等均有相當大的轉變，其中關鍵性轉變為成員本來泰半為中國籍人，如今則幾全部為菲律賓籍。此種轉變，使得該會的宗旨，會務處理方式，及其與菲國、中華民國的關係等均有所變化。例如其原始宗旨在團結旅菲華僑，在中華民國政府支持下，對付菲國政府的各種菲化

案，保護並發展華僑利益；但華僑入菲籍之後原則上他們的經濟事業已成了菲國事業之一部分，該會也成了華裔菲民的商會，他們奮鬥的目的轉變為建設菲律賓經濟。由於成了菲國華商會，會務處理，尤其與菲政府交涉，比以前較順暢了。這些變化與亞太經濟之發展也息息相關，故研究華商總會實為研究二次大戰後菲國華僑華人歷史的簡便途徑，收提綱攜領之效。然欲細究該會，除其會務文獻外，諸領導人之歷史須詳加探求；只有如此著手，方能得到各關鍵性問題的答案。故本年以撰寫該會領袖群傳紀為工作重心。有關資料散處該會，菲華報刊，台北僑務、經濟、外貿部門，菲政府總統府、移民、警察、經貿等機關，及東南亞各國華商會。

華僑華人遍世界，人口多的地方均有商會或會館，全國有總商會或總會館。這些組織隨各國政治形態、經濟發展及與中國外交情況不同而有差異。故各地華商會或華僑會館之比較研究，也是很好的集體研究計劃課題。

國家的理論與實際重觀：新加坡經驗

朱浚源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

一、目的：

本計劃的目的，就在從政治理論等觀點，檢視新加坡共和國的國家活動史。

二、問題：

在新加坡建國過程中，從自治邦、單一國、聯邦之一邦、到共和國，此外，她既加入大英國協，又加入東南亞國協，顯見其處理國家觀點的處理方式，充滿活力與彈性。這種現象在當年的實際細節是什麼？從國家理論或主權觀念上看，又意謂著些什麼？此外，新加坡先建國再成為一新民族，也就是以「國」建「族」的作法，在政治思想上，又代表什麼意義？還有，由於人類交流頻仍，完全由一民族建立一國家，或一國之內祇有一個血統、宗教、語言純粹的民族，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所謂「民族建國」運動是不是象徵意義重於實質意義？表面價值重於實際價值？亦可藉此個案深入探討。

三、重點：

以新加坡共和國成立的過程中，有關「領土」、「人民」、「政府」、「主權」四個變項的內容，在理論層次與實際運作上觀其演變，切入國家觀念的核心區域。其重點大致如下：

（一）新加坡建國過程（政治史的分析）（包含與東協密切互動的部分）：

1、領土的變化 2、人民內容的變化 3、政府組織的變化 4、主權內容的變化。

（二）新加坡建國理論（政治理論分析）（包含與東協密切互動部分）：

1、領土觀念上的變化 2、「人民」觀念上的變化 3、「政府」觀念上

的變化 4、主權觀念上的變化。

(三) 國家觀念的新詮釋：絕對、最高、不可分、不可讓渡的傳統主權觀念的重新檢視。

四、研究方法：

用科際整合方式，切入歷史，以兼顧理論與實際的方法展開研究。以下分研究途徑(approaches)與研究法(method)來說明。

(一) 研究途徑：

- 1、政治學：內政上探討「領土」的內涵，國內人民共同意識的形成，多元社群一元國家的內容；外交上探討新加坡在馬來半島、東南亞洲、國際組織，全球性政治團體中靈活運作的內涵；理論上，找尋其於立邦、立國、加入多種國協之中，有無特殊的理論基礎。
- 2、民族學：在各民族的立場，先探究其與其他族群共存共榮的實際情形，再觀察各個社群如何肯定與維護本族的文化與傳統。
- 3、社會學：透過職業分工、社團組織與族群的關係，以了解社會階層、職業與血緣結構。
- 4、法學：國內在立法、司法上的運作；先為邦，繼為國，後入國協在國際法上適用的情形。

(二) 研究法：

- 1、文件分析法：從公報、宣言、條約、法令規章，以及李光耀等人的言論，循時間順序加以剖析。
- 2、訪談法：親赴新加坡，面訪重要學者、耆宿，以深入訪談之法，動態體會其運作。
- 3、參閱檔案：從新加坡 National Archives (包括 Oral History Dept.) 具體找尋史料。
- 4、訪問東協秘書處(在曼谷)或圖書館(在東協各國)參閱其圖書，特別是菲律賓國家圖書館。
- 5、借重本區域研究計劃其他分支計畫，如蕭新煌先生問卷結果，以相輔相成。

五、可能的貢獻：

如果研究順利進行兩年，可望達成以下四大功能：

（一）強化東南亞區域研究資料。本所曾因作者數年來推動的「東南亞華人社團及其文化活動之研究」計畫，以及與張存武先生合作推動的「菲律賓華人史料之調查與蒐集」計畫，成立了一個資料室。如今參加此計畫，自能更使資料豐厚。這些資料至少分三類：

- 1、圖書資料，包括東南亞國協、大英國協、新加坡共和國等的公報、法令規章等。
- 2、歷史資料。從新加坡的 National Archives 的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等機構蒐集史料。
- 3、理論資料。經過整理、分類、比較與分析，作者可望理出清晰類目，分從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國族主義、族國主義、以及國民主義等變項，來重新整理手邊已有的 nationalism 資料。

（二）為進一步研究東南亞各國的 nationalism 以及國家觀念的演變鋪路。

（三）理論上的可能突破。傳統主權絕對的民族國家觀念，無疑已經千瘡百孔，作者希望能用新理論來取代。

（四）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新加坡在國際政治上走出一個亮麗的空間已為不爭之事實。然則它對中華民國未來走向、兩岸關係之發展，或許會有所啟發，足供為政者參考也說不定。

亞洲之勞工移動

蔡青龍

中央研究院經濟所研究員

在執行「東南亞之人力資源與國際勞工移動」計劃的過程中，由於相關統計數據與官方文獻取得不易，深深感到國際學術合作對此一研究工作之重要性，因此積極爭取機會參與區域性之研究活動。

一九九四年中應美國加州大學Davis校區農業經濟學系教授Philip L. Martin邀請，與夏威夷大學經濟系教授兼東西文化中心人口研究所主任 Andrew Mason共同為ASEAN Economic Bulletin客座編輯專刊，主題為「亞洲之勞工移動」(Labour Migration in Asia)，列為該學術期刊之第十二卷第二期，於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份由在新加坡之東南亞研究所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簡稱ISEAS) 出版。

該「亞洲勞工移動」專刊共分四部份，包括十二篇論文。其中第一部分為二篇概論性著作。第二部份包括五篇有關勞工輸入國之文章，分別討論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及香港之外籍勞工輸入現況與政策。第三部份討論有關勞工輸入兼輸出國，包括馬來西亞及泰國。最後一部份為主要勞工輸出國之論文，包括菲律賓、印尼及中國等三個國家。該專刊共約二百頁，論文題目及作者名單，詳見本簡介之英文附件。

亞洲（包括東南亞與東北亞）的許多國家，都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間成就了快速經濟發展，但在同一期間也面臨國際勞工之處理問題。在本專刊所討論的七個勞工輸入國當中，大約有三百萬名外籍勞工，其中大部份來自同一區域內的五個主要勞工輸出國。這些亞洲國家，能否在成就「經濟發展奇蹟」之餘，也在處理「國際勞工移動」的問題上再創另一「奇蹟」，已經引起學術界、國際組織，及各國政府之廣泛關注。

基本上，外籍勞工之進口與使用是一個極富爭議性的議題，因此各國所採取的相關政策也相去甚遠。以本專刊所述各國為例，有些國家採取保守的迴絕

(Denial) 方案，有些採取開放的經營 (Management) 策略，而有些則採取折衷的辦法。在日本與南韓，移民法規禁止輸入非技術性勞工，而實際上非技術勞工多化身為學生、訓練生或非法勞工而存在。

新加坡則採取積極主動的開放外勞政策，完全以勞動市場之情況及經濟政策為引進外勞之考量依據，市場需要時就開放引進，但課徵高額許可費用以降低外勞與本地勞工之薪資差距，並增加政府收入，不需要時則停止引進，甚至可以遣返。台灣與香港則採取比較被動性的折中策略，亦即所謂的「進退」(Zig Zag) 策略，當勞工短缺時，受資方壓力而開放外勞進口，或延長外勞的停留期間，隨後又受勞方、工會及反對團體所迫，而減低輸入數額或增加進口限制。

馬來西亞與泰國具有同時進口與出口勞工之特性，兩國均由國外聘入專門性與技術性人員，以從事高薪工作，同時其國內的快速經濟發展，也吸引許多鄰近低所得國家的勞工前來就業。兩國均有漫長的邊界而與窮國為鄰，勢難有效防止非技術勞工大量流入。

菲律賓、印尼、和中國都有大量勞工在國外就業，這些國家也都宣稱，勞工輸出是其未來十年中經濟發展計劃的重要部門。它們均希望提升出口勞工之層次，儘量以出口技術性勞工取代非技術性勞工，並加強保護其海外非技術性勞工。但在國際勞工市場供給充裕的現況下，此一目標顯然不易達成。

亞洲國家在達成經濟發展之後，顯然在國際勞工處理上面臨重大考驗。在輸入國方面，對非技術性勞工之輸入，雖然在政策上差異很大，但在事實上，此類勞工數量已經非常可觀，業已超過輸入國勞動力之百分之一。在輸出國方面，政府在防止勞工剝削方面顯然力不從心，許多國際勞工受到國內及海外之招募、仲介與相關機構嚴重剝削，使得國際勞工移動之特性與作用完全質變，並衍生諸多問題。

問題雖然存在，但是展望未來，亞洲之勞工移動現象仍將持續發展，其原因包括下列三項：第一，區域內仍將繼續需求更多的技術性及非技術性勞動力。第二，日、韓等勞力短缺國家，勢將大量以訓練生 (trainee) 名義引進外籍勞工，以因應國內需要，同時避免承認其對外籍勞工之依賴，並能給付較低工資。最後，外籍勞工的停留工作期間，可能會因應需求而不斷逐步延長。

Special Focus on Labour Migration in Asia

Guest editors : Philip L. Martin, Andrew Mason and Ching-lung Tsay

Publisher: Th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PART ONE : OVERVIEW

1. **Overview** Philip L. Martin, Andrew Mason and Ching-lung Tsay
2. **Asain Labour Migration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anolo I. Abella

PART TWO : LABOUR IMPORTERS

3. **Japan** Yoshio Okunishi
4. **Korea** Young-Bum Park
5. **Taiwan** Ching-lung Tsay
6. **Immigration and Foreign Labour in Singapore**
Chew Soon-Beng and Rosalind Chew
7. **Labour Migration to Hong Kong** Ronald Skeldon

PART THREE : LABOUR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8. **Malaysia** Patrick Pillai
9. **Labour Market Adjustments and Migration in Thailand**
Chalongphob Sussangkarn

PART FOUR : LABOUR EXPORTERS

10. **Philippine Overseas Labour : From Export to Management**
Graziano Battistella
11. **Labour Export from Indonesia : An Overview** Graeme Hugo
12. **Labour Migration of China** Yunhua Liu

東南亞城鎮歷史介紹*

丹尼 龍巴爾 /著

王秀惠 /譯

東南亞提供給史學者極豐富而完整的研究領域，人們皆知此四通八達的樞紐之基質曾大大地受到印度、中國、伊斯蘭及歐洲的影響；以致吾人一開始接觸即毫不遲疑的思索到其城鎮景觀是否也以原貌性的方式刻印了各文化在此交錯的痕跡？我們將非借重地域史方志等資料才得以更精確的回應這問題；然而除了少數例外，考古學研究通常重視的是該地的宗教組織（印度教及佛教），而對歐洲人抵達之前的經濟與社會歷史，則可說尚待史家書之。所以當我們在此看到歐洲學專家，僅管擁有更豐盛、尤其更完善的文獻作參考，而都尚難對這關鍵主題的意義有一致的看法，吾人能不更謹慎從事嗎？

即使慎重行事，許多相關資料今日還是失散了。其實，從統計數據上就可看出近數十年來在亞洲地區，特別是東南亞地區的城市景觀，急需一個有系統的研究。在二次大戰前，此地區極特異發展之城市的凝結就已經引起某些殖民國家的注意，而從1945年起，這個發展引動一批傑出的經濟學家及地理學者，因關切這些《人類蟻穴》急劇的蓬勃擴大，而著手以一般而言較寬廣的角度處理問題的方式來描述、列舉，並呈現這整個第三世界城市數量突增的現象¹。其實，東南亞

* 本文為法國遠東學院院長龍巴爾教授來本院訪問時（1994年10月）發表演講全文，對東南亞城鎮發展先後歷史有精闢深入的解析，全文由該院台北中心副代表王秀惠博士譯為中文。

¹就1950到1960年言，世界之城市人口增加了三億四千兩百萬，而第三世界所增之城市人口計就已佔了其中兩億；參T. G. McGee：《東南亞城市》，倫敦，1967，15-28頁，該章標題：東南亞城市及第三世界。在許許多多探討這些問題的著作或論文（參McGee著作目錄），吾人可閱覽例如：J. CHESNEAUX，亞洲都市居住條件最近之演進註 收於《地理資訊》，Vo1.13，1949，169-175

儘管在一些球形地區還存有相當的較未開發的城鎮²，從整體而言，它在近幾年以極迅速步伐成長也是不可或爭的事實，就以馬尼拉為例，從1948年到1960年間，它的人口數也如此從一千三百萬增加到二千一百萬。

假若這些研究的高度價值在於強調當前現象的重要性，在我們看來，它有兩個大的缺失。首先，它傾向以對立的方式將最近的芽苞萌發之情景與早先的情況一分為二，粗糙地概括這早先的情況稱之為「傳統的」，而不去探究分析這個“傳統”是經由多少更早的芽苞所造成的；此外，因困惑於亞洲、甚至是世界現象之「一般性」外貌，它們似乎忘了特殊性可能存在，通常只在幾個“歐洲人的影響力”³事件中去探索、尋求解答，而沒去探究是否某些根源已深植於該區“歐洲人之前”之過去。在這裡，我們提供一種貫穿年代先後的完整分析，也就是特別重視這個地區從過去到現在，長久以來的發展情形。

我們完全意識到考古學的結果可能是過渡性的 事實上，只有幾個罕有的遺址曾被合宜的挖掘 然而，我們仍以假設的方式提議，將東南亞城市的歷史區分為四個階段，同時試著呈現出對它前三個時期更深入的認識，以令吾人更能掌握第四個時期的意義，或可說是當代學者研究的唯一目標。

1. 三 ~ 九世紀 據吾人知悉，歷史由此而始。從那些石上的符號，是用印度模式書寫的梵文，乃是印度化最原始的證據；對我們來說，它也開始於一些早期地名的出現。藉由一些銘文或中國的年鑒傳到今日，也由此一一證明了從西元三世起，東南亞地區和中國就已經開始往來，這些地名畫出了相當形態的“居民聚集區”，關於這點，不幸的我們尚無任何資料。不僅被發現的古據點極少，且對某些古地名的所在地有時也還令人遲疑。

頁及 Vol. 14, 1950, pp. 65-85 (J. E. SPENCER 對該論收於 *地理雜誌*, Vol. 41, 1951, p. 336) ; M. SANTOS 《開發國家都市之地理及經濟景觀》, Paris C. D. U. , 1969。

21960年時，東南亞地區的人口數在世界超過十萬人口的聚集地區裡只佔了9.1%。

3這個觀念特別在 D. W. FRYER 的 東南亞的百萬城市 收於“*Geographie Review*”(1953年10月號的第四期, 474-494頁)文中提到。同時也在最近之羅斯 摩菲 (Rhoads MURPHEY) 的 傳統主義與殖民主義：在亞洲所造成的改變 收於“*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XIX , 1月號, 67-84頁, 文中提到。

在印度洋群島(l' Archipel insulindien) 上，我們找到了一些第五世紀的碑文，以及一系列令人驚訝的自第七世紀始的宗教遺跡（有些像婆羅浮屠或帕邦那等，不可能不由已極複雜化的社群所創造出來），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完全確定這些城市聚落的平面圖及組織架構，因為目前我們只能猜測這些聚落是分布在臨近海濱的地區，而且它們的遺址也正是因為海岸的改變而減少。斯里維札亞（音譯 Sri Wijaya，是七～十一世紀濱海區的一個重要制海權首府大城）可能就位於巨港附近，而棉蘭（即居民建造婆羅浮屠的城市）當應位於爪哇的北岸，靠近現今的三寶瓏城⁴。

對大陸地區，我們的資料稍為多些。當地的幾個地名可被很清楚的標示⁵，尤其是越南及閃族的城市，以及一些已經由空中勘察和已發掘過的遺址。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則是位在湄公河下游地區的撻撻（d'Oc-co），湄公河這個地區在1944年我們著手研究時⁶，曾對中國資料上所稱的富南文化加入新象。我們曾在當地發現一個長1500公尺、寬3000公尺的長方形城牆的遺跡。它座落方位是北北東、南南西，所包圍的面積有450公頃，在其底層結構，有各式各樣的建築物及一些破碎的平瓦片，以及許許多多的金飾。這座城到濱海地區，需要靠運河才能到達，在當地可見到來自中國、印度、伊朗，甚至羅馬（時代分別自西元二至七世紀）的東西，讓人不禁想到它也許是當時連結印度洋到中國之路，且因其發展而欣欣向榮的重要港口。其他城鎮的遺跡，同樣在湄南下游河谷及伊洛瓦底江（塔通、沛克摩尼）⁷的低地河谷上發掘到令吾人得以掌握到這些地區最早的孟族及

⁴請細讀印尼考古院主任 SOEKMONO 博士的兩本傑作，關於維札亞地點：地貌學與維札亞的所在地，in *Madjallah Ilmu-ilmu Sastra Indonesia*, Vol. I, n° 1, 雅加達, 1963年4月, 78-90頁（用英文，有一幅地圖）；關於棉蘭的地點：爪哇中央東北的地理重建與棉蘭的所在地，in *Indonesia*, n° 4, 康乃爾大學, 紐約, 1967年10月, 1-7頁（也有地圖）。

⁵請看貝薩西耶 北越的舊都城的地圖觀念 in *亞洲學報*, CCXL, 1952, 第2冊, 有一幅海防城堡的地圖極有意思，它包括三面蛋形及不規則的土牆（外牆從北到南長2公里，從東到西是2.8公里）；這個城市可能建在三世紀初，而今日的城牆大約不會早於第十世紀。

⁶參考 L. MALLERET 的 撻撻的古墟，初步報告，in *法國遠東學院年刊*, XLV, 1951, 第一冊, 75-88頁，以及《湄公河的考古彙集》，巴黎, E.F.E.O., 4冊, 1959-1963；G. COEDÉS 安南的古墟：撻撻古址，in *Artibus Asiae*, X, 3, 1947, 193頁。

⁷近二十年來我們對這些遺址的認識有很大的進步；由於散失各處已不可能在此提供書單，吾人可參考校訂至1963年G. COEDÉS所著的《印度化王國》最新版（巴黎, 1964, 尤其是PP.121-123, 145-147, 164-165.）。關於1964-1965年間在湄南下游地區所做的挖掘，請參考J. BOISSELIER的初步報告，in *亞洲藝術*, 第12冊及20冊。至於第一篇綜合性論文則請參閱G. H. LUCE之

Dvaravati and old Burma in *Journ. Siam. Soc.*, vol. LIII, 1, 1965年1月, 9-25頁）。

畢族 (Pyus) 居民之文化達到那個程度型態，遠較其後來之暹羅人及緬甸人之時代更早多了。如此，也讓我們更容易掌握到這個地區最初的文化型態。

這些尚支離破碎的資料不足供吾人對這些“第一代”的城市做一個歸納或綜合，其類型之間一定有極大的差異性；對這段古老的時期，文字資料都太簡略，而考古研究也僅剛剛起頭。目前或只需強調一點，那就是：直到「吳哥窟遺址」在西元九世紀出現於此地時，聚落〈城鎮現象〉存在的時間至少已有六世紀了。

2. 九 ~ 十五世紀

從第九世紀起，我們對於聚落的認識就更為清楚了；在這第二個時期裡，城市的廢墟經常是宏偉的，而文字資料也從此更足令吾人窺見這些建城的社會族群。其中最具知名度，也是最被深入研究者當然就是吳哥窟的遺址了，它位在東雷湖⁸的北方，闍耶跋摩二世在802年選擇在此建造了第一個首都，叫做盧路斯(音譯 Roluos)。其後，高棉各國王將王國的重心維繫於此，直到十五世紀(1431年棄守)。代代在此地不僅建造出石頭堆砌的巨大神廟，尚有城牆、水庫及供灌溉、運輸所需的運河網。這個城市呈四方形，神廟立於它的中央；無疑地，其最大城就是猶答亞迪國王(音譯 Udayadityavarman)於西元十一世紀建造，以巴浮翁(音譯 Baphuon)為中心的吳哥窟(Angkor Thom, 直譯即為「大城」)。它的第二座城於西元十一世紀由闍耶跋摩七世所建，至今尚存，當時是以巴榮(音譯 Bayon)為中心；即使它今日的佔地面積已經縮減了，但是也有四平方公里的大小。

除了吳哥窟的城市聚落外，其他城鎮如筍茁生，蒲甘位於伊洛瓦底江上游，大約建於849年⁹，但是卻因為是第一個實行緬甸的君主專制(於1055-1287，這也就是蒙古人入侵導致廢城的時間)。在湄南河支流南耀(Nam Yom)河上的

⁸詳細的說明可見於M. GLAIZE的《吳哥窟古建築》，巴黎，1963；概述及書目的詳細資料可以在B.-Ph. GROSLIER的《印度支那 藝術交集地》，巴黎，1961。

⁹依史記，蒲甘原是十九個擁有“能神”(Nat)或地方神的村莊所組成；很有意思的部落生態？關於蒲甘十一到十三世紀的“古蹟”，請參考U LU PE WIN《蒲甘導覽》，Calcutta 第一版，1955。關於此期緬甸的經濟及文化：MAUNG HTIN AUNG《緬甸的歷史》，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7，第三卷。

素可泰合撒夏那賴（音譯 Sri Sacchanalai）¹⁰，為十三世紀末由第一位泰國國王所建，而1350年落入下游地區的猶地亞人手中；後來在南平河上游（湄南河另一支流）的清邁（Chiang Mai），是另一位泰國首領在1296年所建，至今仍是泰國第二大城；西元1011年在紅河邊一處前人遺址上建造的唐龍（Thang long），至今仍是這地區的政治中心（到1831年才改名為「河內」）¹¹。

在爪哇，十世紀是一個重要分裂期，它的重心由中心往東移，然而我們只能知道它幾個東方重要大城之名稱：凱迪瑞（Kediri）、新哈沙瑞（Singhasari）；這兩座大城至今都同時存在爪哇，但是它們的古城地點尚未發現。而吾人發現的最早的爪哇遺址則是摩迪帕（音譯 Modjopahit），它是十三世紀末被建在布蘭塔河域（音譯 Brantas）附近，在十四世紀特別繁榮，而到十六世紀初棄守。¹²

我們可以注意到，有許多這一代的城市都是座落於可航行水流的鄰近地區，但一般都在內陸，且有時與海岸有一段相當遠的距離。

3. 十五 ~ 十八世紀

十五世紀起，我們一方面看到在前一個時期主要大城市最終的沒落（吳哥窟、摩迪帕），另一方面，一些一般較近海岸之新中心的欣欣向榮：猶地亞（建於1350年）及金邊（建於1434年），特別是建於十四世紀最後幾年的麻六甲，其統治者於1491年信奉伊斯蘭教。在緬甸，我們可注意一項可比較的現象，那就是勃固這個有地泉湧現的沿海城市，它在十五世紀趁北方阿瓦城的困境而嶄露頭角¹³。

10A. B. GRISWOLD著《Sukhodaya藝術史鑑》中可看到一張地圖標示此二遺址，1967年曼谷國立博物館出版。

11G. AZAMBRE 河內 城市地理記載 in Bul. Soc. Et. Indoch., XXX, 1995年4月, 355-363頁, 及 河內的始源, in B.S.E.I., XXXIII, 1958年3月, 261-300頁（有新舊地圖）。

12這個遺址在兩次世界大戰間被 l'Ir H. Maclainc-Pont 挖掘到，但是很不完整。或者可以參見幾份荷文論文或報告：H. MACLAINE-PONT 摩迪帕的歷史（in Djawa, VI, 1926, 294-317頁）。又W. F. STUTTERHEIM《De kraton van Majapahit》，萊耶，1948（他嘗試將摩迪帕皇城根據古墟、考古論述及爪哇中部現在的皇城重新建構起來）

13參MAUNG HTIN AUNG, 前註, 98頁。

在群島上這現象尤其顯著，由在十五世紀接著在十六世紀出現的在爪哇北方的一連串的商棧，如：泗水（Gresek）、特邦（Tuban）、迪馬（Demark）、加卡達（Jakatra）¹⁴、萬隆（Banten），然後就是在十六、十七世紀之間欣欣向榮的千那底、伊特（Hitu）、汶萊（這些商棧西元1522年麥哲倫艦隊經過時蓬勃繁榮），阿捷（Atjeh）、馬尼拉（在西班牙到此定居前，這是一個蘇丹的據點）以及錫江等大港。到了十七、十八世紀時，又可看到一些繁榮的純商業據點，如峴港（Fai-fo，靠近突昂克（Touranc））¹⁵、及哈定（Ha-tien，在柬埔寨的臨海）¹⁶，還有一些發展或被創建成的大經濟及政治中心：先有猶地亞，後有曼谷（在歷經猶地亞的洗劫後在1767年為緬甸人所建立的）、富安（Phu-xuan，建於1687年，後來改名為順化）、西貢（建於1698年，座落於一舊高棉首府之舊址上）¹⁷、仰光（由阿勒帕亞國王於1755年建立的，城址座落於到當時前只是一個季節性的朝聖之地點）¹⁸。

要注意的是，以上這些商棧或城市不是位於海岸邊，便是位在容易聯繫沿海地區（例如小港灣或三角洲極便利通運的地點）。此外，有少許幾個被歐洲人在1780年前佔領的地方，如三寶瓏、迪帕爾（Djapara）、麻六甲（Malaka），當然特別是巴特維亞（Batavia）及馬尼拉也同屬此類特性。

在這第三個時期，為人所知有城市復興的跡象的內陸城市似乎只有兩個，一個是伊洛瓦底江上游的阿瓦；另一個是爪哇中部那些城的卡踏素合（Kartasura），和後來的素合卡踏（Surakarta）及迪格加卡達（Diogd-jakarta）。

14在荷蘭人尚未入佔亦未將之改名前一個多世紀時，Tomé PIRÉS極熱烈地描述了這個港，我們特轉譯出其中數行（《東方蘇馬》，Cortesaio版，文章第415頁，譯文第172頁）：「這個港了不起極了，是（爪哇西岸）最大、也是最好的港；這裡的貿易極為旺盛，人們來自蘇門答臘、巨港、……、麻六甲、錫江、爪哇及馬杜拉……這個大港管理得很好；它有自己的法官、書記……許許多多的帆船停泊在這個港口。」

15詳看陳清和 有人觀察了閩化的村莊及越南的中心峴港的古蹟，在Viet-nam Khao-co Tap-san的一及三卷，西貢1960及1962（越文及英文大綱），記述一篇刻在石碑上的文章，乃由中國商會的人在1741年樹立，希望制定其內規。

16由一群當時仍效忠明朝的華僑所建立的，由一個名叫孟康（1655-1735）的人領導；參E.

GASPARDONE在1952年《亞洲學報》第3冊所寫的 一個南海的中國人：哈定的創建者。

17J. BOUCHOT《在柬埔寨及安南控制之下的西貢》，西貢，1926；同作者《西貢史資料》，西貢，1927。

18到著名的Shwe Dagon朝聖，它一直是仰光最有名的古蹟。

4. 十九 ~ 二十世紀

在十九世紀裡，新的「影響力」歐洲人緊接於維也納和約的簽定，尤其是蘇伊士運河的開鑿後及真正殖民「帝國」的成形下，東南亞可真一下子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儘管如此，與前一個亞洲的時期比起來，能記錄的新改變就聊聊無幾了；西元1786年，佛郎西司萊特出讓了檳榔嶼的「沙漠之島」；西元1819年，史丹佛 瑞費茲（Stamford Raffles）爵士“建立”了在當時無疑地是一個毫不重要的小漁村的新加坡¹⁹；棉蘭是在十九世紀的最後數十年裡興起的，其存在乃是起自於蘇門答臘「東岸」（奧斯喀 Oostkust）的開埠及種植業的發展。馬來西亞現在的首都吉隆坡一點也不更古老，但它尤其是一個華人的基地，因其遺址吉隆坡：意即「泥沙淤積的河口」，乃為早期來到此地挖採錫礦的中國礦工所據。至於曼德勒，則是在1857年由緬甸立憲君主於其墟城建立的。

歐洲人的來到，還是使得該地區的某些城市生活上的景觀有明顯的改變，他們在這以創新或移植的方式，將一些居住區轉變成有風格、有舒適性的嶄新面貌²⁰。尤其是他們徹底改變了某些城市的經濟意義，開創了新工作機會（如行政人員及小型工業等），改善出入門戶，使交通更為便利（如整頓港口、建造飛機場）。此外，也顧及了領地擴張的展望及城市與其腹地之關係（建立鐵路及公路網）²¹。

對於東南亞城市的發展，我們沒有必要多駐足，因這些離最終研究最為出名的都太遠，若要更仔細地研究、瞭解，這些資料並不足夠。

從這個相當迅速而不完整的編年史來看，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初步不算太無聊的結論：我們所接觸到的是一些位在這極不安定地區的城市遺址，不像某些大城，如羅馬、巴黎、廣東西安或鄭州一樣，可以上溯到早時，甚至是極為古代的

¹⁹這個地名（意即「虎城」）已很古老了，在《馬來地誌》即已出現（1612年版）。

²⁰巴特維亞的歷史是很清楚的，持續了兩世紀的活動都是在城裡（Kota）的範圍內，而其往核心之南發展乃成為後來十九世紀初在Daendels將軍（1808-1811）統治下之現代而“殖民地的”城市之來源。圍繞著Koningsplein大廣場及總督府所組成的新城，應是後來慢慢發展成今天之雅加達。

²¹舉巴特維亞為例，也是同一個Daendels建造了第一條橫貫爪哇大道（從安寨到帕那坎），方得以進入復地並發展沿岸成帶狀可用船隻連絡各不同點。

時期²²。今日，五個最大城市分別是雅加達（它在1960年的總人口數是兩千九百萬人）、馬尼拉 奎松市（兩千一百萬人）、新加坡（一千七百萬）、曼谷 吞武里（一千七百萬）、西貢 Cholon（一千三百萬人），沒有任何一個早於十六世紀。然而，這地區提供給考古研究學家相當多數量的荒涼舊城市、空貝殼及類似化石：首先當然就是吳哥窟及其許許多多的古老城牆，此外還有蒲甘、素可泰、斯里撒沙那賴及摩迪帕，以及在十七世紀尚受到路易十四的大使們羨賞的猶地亞。只有極少數的幾個十五世紀以前的遺址至今仍為人群聚居之重要城鎮，如河內、清邁、梵中（音譯 Vien chan），也許還有巨港，及遺址尚未確定的維札亞（音譯 Sri Wijaya）。

假如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們就前面所提供的年代表來看，保留九世紀以前城市那些仍過複雜的問題，那麼我們發覺，在此所知城市的發展，在純粹「殖民」城市的出現之前，至少可以分為兩個主要時期。這個時期從九世紀到十五世紀，較為顯著的是城市的出現、城市的突飛猛進及一連串重要城市的消失。這些城市大都是位在肥沃的水稻種植區中，後來是因突然被人們所放棄，或因外族的入侵接踵而來。當然，無疑地也因經濟及社會條件的變遷使這類城市無法適應。從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這個時期令人注意的是一連串新興城市的積極發展，其中很多城市它們的共通點是位於濱海的地區，其功能已有以貿易為主的傾向。此時，海運有時也扮演比腹地還重要的角色。除了某些例外²³，大部份這一“代”的城市都一直延續至今，當然其命運則全然不同。

現在，我們約略的回到這兩個時期，以便更清楚其據我們所了解之特色。

以我們前面已提過的吳哥窟遺址群來說，這個地方佔地約有35公里×22公里的面積，研究結果已令吾人了然包圍在城牆內的城市與在那之外極廣大的土地之間密切聯繫之重要性。平面圖令吾人發現其幾何排列到令人訝異的程度 宇宙

²²研究東南亞城市的原貌當然仍應極為謹慎，我們所知道最早的資料太不完整，很難去求證關於這些城市的主要型態：有商業型（老撾及蒲人已有軋製的錢幣，然而錢幣在此區消失，直到十三世紀才又出現）及農業型。因核查一些吳哥窟之前的古蹟可資判定。記得B.-Ph. GROSLIER建議，在基於“引水”系統加工城市與被堡壘環圍的巨石建築文明的城市間尋求其相關性（*印度支那*，69頁）。

²³馬來西亞的Dewan bahasa dan Budaya一本有趣的小讀物，名叫《強盛的馬來西亞》（吉隆坡，1963），列舉了馬來半島西岸的七個古蹟，那兒廢棄的城牆仍然屹立。其中至少有一例，Johor Lama不僅是一座單純城堡，也是一個重要的城市，它在1587年遭到葡萄牙人的攻擊而毀滅。

空間，因吳哥窟的城牆及神廟永遠有座落方位，但是它卻與它廣大的也是呈幾何形的運河水路網密切相接的，這些運河都源流於水壩或可以用來灌溉稻作栽植的人造蓄水池²⁴。

我們在此引用格羅斯禮博士對高棉城市研究書中的一段話是再合適不過了²⁵：「吳哥窟乃為其君王、其軍隊及行政中心之府邸。它是國家的精神首都，也是商業中心，但如它護庇著是政治及宗教的核心地，它也不只是一個我們觀念中的那種聚落城市。它成套完整的水利設施發展出成百的集約農耕的田野。事實上，一個高棉城內被運河將土地分割成塊狀排成列列的農地。而吳哥窟除了由空中探測研究對此點是極肯定的，同樣的市鎮主要的角色也在灌溉所有鄰近地區。我們認為這是吳哥窟在這時期的發展特色之一。」

< 農業的 > 城鎮乃是借其周圍土地而活，每一塊土地其建築師及工程師們負責各地，而其書記及官吏則行使政權。文字佔有重要地位，因登錄及土地規劃都需要它，然而錢幣似乎還未被認識。在這種農業經濟這樣的幾何城圖上符合一個外表僵化的階級社會，教士、佛教徒或印度教徒佔住極特具特權的位子，而最高特權則集中在一個神化的統治者一人，他最大的功能就是綜理及控制澤惠大眾的水網²⁶。極崇偉的城邦但也極脆弱，因只要一時的疏忽，就會造成整個灌溉網無可挽回的潰決。事實上，那些十五世紀留到今日的那些永久廢棄的遺址，不僅是因為暹羅兵的攻擊次數頻繁，也是因為灌溉系統蝕變太深所致。

彼時吳哥窟的其他一些城邦都必得以同一精神來研究它，但我們可想到其中有許多是可以下完全相同的結論。蒲甘、素可泰及摩迪帕的遺跡是在傳統的稻田耕作區。在摩迪帕有些十四世紀的文學作品足以令吾人大致勾勒出當時的社會情況，我們在克拉登（Kraton）周圍找到相同的幾何平面圖或“神王”的府邸，相

²⁴羅來的安答卡有3800公尺 x 800公尺（乃是安答哇曼Indravarman國王為其首府侯羅所挖）；耶索罕卡7000 x 1800平方公尺（由耶索跋摩國王在九世紀末為首都耶索哈布達而挖）；西邊的水壩8000公尺x 2200公尺（由猶答亞迪二世在十一世紀為首府吳哥窟的第一大城所挖）。至於它重要的灌溉網路請看V. GOLOUBEV 從空中再認識高棉 in B.E.F.E.O.，1936，465-477頁，尤其是B.-Ph. GROSLIER的《十六世紀葡萄牙與西班牙資料所顯示的吳哥窟及高棉》，巴黎，1958。

²⁵參《十六世紀的吳哥窟與高棉》107-121頁。

²⁶參G. COEDĒS《進一步認識吳哥窟》，巴黎，1947。整個描述吳哥窟面貌的部份即以天澤之水為主題，它是上天所賜予人們的，以讓人們得以生存並得以奉祭上天。（例如那邦的雕像群，是在已乾涸的古老盆地之中心。）

同的以稻耕文化為先的跡象²⁷，相同的印度化階級及同樣的居主導地位的教士（prieminence）。以上大致構勒出的這種型式的「農耕城市」，在十五世紀後仍保持得很好。事實上我們在極近代發現了克由斯（在伊洛瓦底江上游）的稻田就是這種農耕型態的改良形式，它曾經歷過蒲甘時代的繁盛，而後是阿瓦，以及在那稻耕同樣昌隆的平原之克律（爪哇中部），那兒在八到十世紀間顯示了最早的印度化提安迪（tjandi）式的農耕方式。一方面阿馬洛帕、瓦城，另一方面卡塔瑞、蘇拉卡爾塔、迪格札克塔，不用說有極大的不同，它們的發展型態不用說則完全不同於此農耕法卻很令人感到有意思的幾乎全是以吳哥窟的型態存留下來的。我們再次研討塞索馬迪那極好的研究²⁸告訴吾人，儘管因無數的轉變、因殖民及後殖民的統治，都足以影響爪哇人的社會及經濟，但像迪格札克塔這樣的城市如何能保存它那農耕及天文的景觀直到二十世紀全盛時期。大家都知道，迪格札的蘇丹也是印度共和國的經濟部長，在爪哇中部廣大農民的眼中，他一點也沒喪失那樂善好施的面貌，亦是歷來迪格札克塔統治者的特徵。

截然不同的是那些我們眼見從十五世紀掘起於這個另外的地中海兩岸的商業城市，事實上這個新現象的某些跡象早在十三世紀後葉即已出現，馬可波羅指出，在蘇門答臘北岸的幾個小貨棧，聚集著許許多多的生意人及伊斯蘭教徒²⁹；儘管如此，還是要等到大量地中國商人及回教徒的出現及麻六甲的掘起，我們才能抓住這種都市型態的特色。

關於麻六甲城，我們從十五世紀初的中國文獻就已相當瞭解了，尤其是經由葡萄牙人透邁皮爾的「東方蘇門」，他在阿布哥克（Albuquerque）統治麻六甲以後不久即在此居住，我們此處再也不是幾何式平面圖、天文象徵、或以一個廟宇或神王的宮殿為中心點的城鎮了³⁰。此城鎮最重要的是一個商業中心，貿易活動集中在河口地區，那兒有一條橋面開滿商舖子的大橋令人得以從此岸通往另一

²⁷摩迪帕與吳哥窟一樣，古墟都沒有任何保護，土地都被稻田佔滿，這使得我們更難去描述它古時的景象；這長方形盆地（一種水壩？）已被標示出來。關於上緬甸水稻栽種的重要性，可以參閱J. A. STEWART 庫克斯的灌溉；緬甸的歷史，Burma-Res. Soc. 學報，XII，1921，第1頁）。

²⁸參SELOSOEMARDJAN《喬亞卡塔的社會改變》，Cornell大學出版社，1962。

²⁹有些中國商人本身就是回教徒，並且依照一位印度史學家的最新理論，爪哇第一次伊斯蘭化很可能就是那些中國人後代的哇里（wali）；參Slamet MULJANA，《印度--爪哇王國末期及群島中回教國之出現》（印尼文版），雅加達，1968。

³⁰我們在Funakoshi Akio的作品《在葡萄牙統治期，馬拉卡出現在舊地圖上》（日文版）發現了幾份馬拉克的舊地圖翻版（1960年，800-824頁）。

岸，且那兒外地來的商貨在此卸載並堆棧到倉庫中，常可見到舶來品堆在商棧（馬來語 Gudang，即是後來成為英國人口中的 Godown 的來源）。

每個國家佔據一個特區，區域範圍內有規定的義務、司法權，並由一個各國自己人選出的甲板大（sjabbandar）或〈港口老大〉³¹負責並管轄同時代表他們的利益。在主要的區域裡，人們尚保留“宇培”及“依里”的名稱（倉廩），爪哇的商人經常將進口的稻子堆放在此。大生意要遵循規範的「海洋法規」至今仍存在，其中列出相當的商會宗旨，一方面這些條文也指引吾人認識了當時一些印度、爪哇及中國的巨賈³²。

在一個這種類型的城市裡，政治權力只在參與交易遊戲時才產生作用，誠然，蘇丹在馬來人眼中尚保留有傳統的恩賜主的尊嚴，但在外國人眼中，他的尊貴只在其存在為商業上的絕對需要之條件才算數；其主要收入之一，現在為來自貨物稅及海關稅，以物品本身或金錢繳付，因從此錢幣已擔任重要角色。有時他不滿於只執行其王權，也像商人般著手買賣。

在十七世紀前半時，這類的情況曾出現在例如阿特葉城³³。該城在馬拉卡被葡萄牙人佔領後，因回教徒的生意在當地發展而致富，當時，城裏的人口已超過了十萬人；商業活動集中在班達馬卡謬爾（Bandar Makmur）的港口，以及四個的主要市集；各種族群各自聚集在自己的社區或孔邦（Kampung）：爪哇人的孔邦；沛谷安（Pegouans）的孔邦.....等；蘇丹的宮邸座落在城南，過著遠離塵囂的生活。到了十六世紀，政權落入一小撮「有錢人（Oligarchis）」所組成的寡頭手中。然而，從1607年起，蘇丹尋求打破這種寡頭，並沒收他們在外貿所獲得的利益，尤其是壟斷他們在西印度群島全部的胡椒貿易。

³¹原詞乃源自波斯文。

³²人們是這樣告訴我們的，在十六世紀初，一個名叫Utimuti Radja的爪哇商人，由於他擁有許多財富，而且可以說他控制了幾乎整個城所需用的米。關於馬拉卡在十五世紀及十六世紀的商業活動，我們可以參考M. A. P. MEILINK-ROELOFSZ女士的論文《十五世紀--十六世紀間，印度洋群島上的亞洲人的貿易及歐洲人的影響力》（La Haye，1962）。

³³參我們的研究：《在伊斯肯達時代的阿特葉的蘇勒坦納，1607-1636》（巴黎，1967），特別是第一章「港口及它的問題」。

此時，蘇坦那受到飢荒的威脅，於是開放外國船隻進進出，也開放了區域貿易。這也可說城市放棄了腹地，其稻田已極稀有，必需從馬來亞半島或甚至印度進口稻米，或者奴隸們到當地種植，因為那些有錢人主要是經商的，一點也沒有農耕的觀念³⁴。然而這類型城市的成功，一方面是依賴商業為生，這也帶來了各種生存問題，比方對鑄幣所需之稀貴金屬流通的控制。例如以伊斯干達慕答為例，該地區便是在西元1620年之前些時候，曾將其金幣貶值。

馬拉卡和阿捷的這兩個例子，毫無疑問是在“歐洲時代”之前創立的（即使人們有時還是利用歐洲人的資料來作研究）；在同樣系列的都市裡，我們可加入這個盛產胡椒的邦當、勃固、馬卡薩、錫江、千那底巴塔尼（Ternate Patani），即使這種類型的精確專題研討還很缺乏。我們甚至還加上雅加達及巴特維亞等一般人們將之歸諸由西方創立的都市類型。其實它到了十八世紀就出現和阿捷同樣的型態：擔憂壟斷的制度³⁵、漠不關心內陸的情形³⁶、因「強迫性」造成的移民問題使得大半數的奴隸從外地湧入³⁷、同樣的依孔邦聚成的種族區，他們聽命於一個由孔邦選擇的領袖，並被允許以司法的形態來行使其習慣法。

當然不應將所有從九世紀到十八世紀的城市都歸劃到這二分法的範疇裡，今後的研究應可改進。有一些例子已經做過較好的研究，令我們也必須考慮這種脈絡並非這麼單純，尤其是發現有些聚落在幾何形城市的側面且永遠在城外，幾個不規則的突出物顯出較新時代的跡象，我們似可試著稱之為“市郊”。城屬於布巴衛星區，位在首城與布蘭塔同一河岸，在摩迪帕，聚居著海外來的外地人³⁸，

34「這裡的人們如此自傲到竟不願去碰犁頭……；他們養尊處優全以奴隸代勞；其主要城市之土地未善加利用，而致糧食不足以供居民所需，是以甚而大部份的米是外來的。」法國人Augustin de Beaulieu 十六世紀在阿捷（Atjeh）收擷胡椒時如此告訴我們。

35與巴特維亞唯一不同的是，蘇丹的位置由公司所取代，但兩例中我們都發現同樣的手段來維持價格（自1620年，阿捷人即已將馬來亞半島的胡椒種植摧毀了。稍後荷蘭人摧毀了莫律革的丁香子種植業），而這兩例都同樣對打擊走私失敗。

36巴特維亞在很久以前就不靠腹地發展，且在十八世紀後半期前極少將注意力放到宋丹之國（咖啡的輸入）極力向內陸擴展，但是卻沒達到任何開發的目的。

37十九世紀前半期的巴特維亞，很少見得到爪哇人（宋丹人及爪哇人），大多數的居民是中國人（自願移民或被荷蘭人的逼迫），或是來自印度、錫江、慕律克，特別是巴里島的奴隸。關於巴特維亞的第一批原住民，請看Lance CASTLES 迪札克塔民族風貌 in *印度尼西亞*，n° 3，康乃爾大學出版社，1967，153-204頁）也參F. de HAAN之專著《Oud Batavia》，巴特維亞，1922，3冊。

38參Th. PIGEAUD《十四世紀的爪哇》，5冊，La Haye出版，1960-1963；特別是第四冊494頁sqq：摩迪帕十四世紀的經濟與商業）。

並且在某種機會組合成真正的市集。而在唐龍這情形更是明顯（河內），那裏在松可及皇城間所展現出就像是「一個有稻田、花園、水塘、五個人工修飾過的小山丘，俾以改良該地的風水條件。」³⁹，它的範圍伸展到柯秀（Ke Cho）手工業區，那兒有各式各樣的同業公會以街道為聚落形成該區，並在每月的初一及十五結成一個大市集⁴⁰。至於十七世紀的猶地亞，它的耕地、宗教及天體空間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且莫忘了它也是一個大商業中心；在1691年發行的一張地圖上⁴¹，我們發現王城周圍隔著一條運河標示著不同的外國人區，這些區域分別聚居著中國人、日本人、台灣人、葡萄牙人、荷蘭人、馬來人、馬卡薩人及北官人等。由此城市圖看出在十七世紀閃族各王朝實行“開放”的政策，尤其是納亥國王，無疑的模仿了群島中某些蘇丹的政策。

最後，有個問題值得一提：在代代相傳的想法中，城市到底是代表什麼？在今日的看法中它又代表什麼？城市空間之建置情形是混雜不均的？是獨厚某些團體？還是如人所欲？起初這些成群的無產階級群眾的到達，他們膨脹了今日東南亞地區這些都會的貧民窟，難道僅是為了逃離經濟的困境？還是也因為此疑問絕非無的放矢 其將城市建成神居之先人形象延續下來的影響？

一個原始的資料，很少被運用，但卻是很纖細的處理，即是由地名組成，假如東南亞的城市景觀都像我們所見這麼不穩定，那麼這兒的地名更是不穩定，而且往往會有君王尋求新的命名以「改造」他的敵人廢棄的城市。很多城市名字都是最近的，而且其詞源不管是正確的或“民間傳說”都流傳至今。有時，我們所熟悉的大城市的完整地名相當長，而且有其意義，甚至人們平日只是使用「縮寫」；歐洲人稱之為“曼谷”，而暹羅人通常都叫為「克罕泰伯」，城市的全名可佔滿甚至超過打字紙整整一大行的位置。其實可以看得出來的是，這個差別性並不是一定存在於城市自己的名字與它取決為生的關係之間，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假如我們想起了「農耕」的城市，它兩者間的連續性是無法存在的，反而是

39參AZAMBRE《河內的始源》；我們在吳哥窟是發現對宇宙天象的考量，但是這一次在這裡看到的是絕然不同的類型，因為那是吸取自中國的風水。

40此市郊在行政上區分為防（phuong）或自治區，從某些意義上來看可視之如馬來亞城市之康邦（kampong）。

41《暹羅王國》（第一冊，巴黎，1691）描繪了La Loubère的記載。關於猶地亞，吾人可參考Larry STERNSTEIN那本極佳的研究 昆高；猶地亞的舊都 in 暹社會學報，LIII，曼谷，1965年1月，84-121頁（其中有很多古地圖）。另一個主要以農耕之城市商業的郊區之例子：阿哈甘之孟優城及其郊區丹基貝，葡萄牙Sebastiao Manrique留給我們一幅關於十七世紀上半期的極佳描述，參M. COLLIS小說式遊記《偉景之陸》，倫敦，1946（175頁有幅孟優地圖）。

空間逐漸釋散的，其中心(國王佔居)被認為較集中，而城周圍又被認為較開散，一些共通的名稱，如馬來話 negeri、泰國話 moeng 也因同樣原因可以根據其上下文同樣表示意義及地理環境，「城市」或「國家」。

更為豐富的確實是有許許多多的傳說與城市的建立有關；每一個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傳說，有時傳說相當複雜，或神的開建佔了很大的比例；假如用比較的方法來做研究，將可深入無窮。在這裡只要注意到，有些傳說很奇怪的曾經由荷蘭人轉承而一直流傳到二十世紀，荷蘭人企圖把他們的紋章藍戳賦予每一個城市，完全就像他們的祖先曾為其聚落所為般。也因此我們以蘇哈巴亞 (Surabaya) 為例，其意為「在蔚藍深處的一條鯊魚和一隻銀色的鱷魚」，因一條鯊魚 (sura) 和一隻鱷魚 (guaja) 曾在此地爭戰，也分別象徵海與陸地。⁴²

由此觀點延申，在文學作品裡，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些城市名字的意境及表達的意思。在這裡，我們只提提有名的「那卡爾」(Nagarakertagama) 這個長篇的讚頌詞，於1365年由詩人在普洛帕提 (Prapanja) 王廷撰寫的，用以頌揚摩迪帕以及其國王。於是從它的篇名⁴³即極精確表示：「論摩迪帕城的榮耀」。有一些對於城市的描繪，也同樣是有跡可尋，雖然這可能更加稀少。我們在此想到阿茲安伯 (G. Azambre) 對於唐龍 (即河內，關於一張古地圖，其中柯邱 Ke Cho 的手工業及商業區並未被標示出來更未被提及) 的傑出評述：「當時的時代精神是只有城市受到重視，對於十五世紀末的這手稿也是一樣。皇城的地圖只縮限於唐龍、湖泊、神廟、宮殿的四周，但這個商業城的任何一個地區皆沒在這裡介紹，也沒有標示出……」⁴⁴；很精確的說，這“時代的精神”也是當時的社會的某個階級，也就是宦吏階級；另一種「精神層面」即是馬瑞尼 (P. de Marini)，在1650年所著迷的柯秀的七十二個地區：「在這個大市集的每一個地區，有著與義大利中型城市一樣的寬敞空間」⁴⁵，而他所說的「賽瑟」，即是他對這整個地區的描述……。

⁴²蘇哈巴亞事實上是位在布蘭塔斯的一條支流上，由沖積泥沙、新生地上：關於蘇哈巴亞的故事請參考G. H. VON FABER那本老專論《Oud Soerabaia》，蘇哈巴亞，1931。在此神話之始源有關之調查的同時，也要有神明祭祀或地方神聖之城市；我們知道只有在曼谷或檳城等地，保佑農事的神明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⁴³也許後來在編輯這部作品的同時也由十八世紀的一個手寫本流傳至今日。

⁴⁴AZAMBRE《河內的起源》，266頁。

⁴⁵《東港及寮王國之新奇故事》(法譯本)，巴黎，1666年。

我們的報告就在這裡打住了，尤其，這只是一份計劃案。在我的認知尚嫌太偏頗的這準備性的長句後，我們看到從九世紀開始，然後從十五世紀開始所呈現的兩個相當不同的城市類型，且有些地方是相對的，甚至有些地方在該區人們認為是相併出現，但我們也著實不該掩蓋住它們各自所展現出來的兩種經濟體系、兩種社會以及兩種無可調和的相異哲學觀。換言之，對時間的觀念、對權力的看法、對價值判斷兩者全然不同。吳哥窟這個大城有很強的農耕組織，以及社會階級不變的秩序，大商業區由廣大的海洋網線控制，也遵循一個商業社會富於反傳統的秩序下：西方學者可見到一種“先於資產階級”類型的城市及另一種“資產階級”型的城市，但也別忘了二者在歐洲人到達之前就都早已存在。

日本「東南亞歷史中的日本佔領 評價與定位」研討會見聞記

周婉窈

去年十一月，曹永和教授和我受邀參加日本東南亞學界的研討會：「東南亞歷史中的日本佔領 評價與定位」。這個研討會是由豐田基金會（The Toyota Foundation）贊助，會議場所選在距東京車程一個半鐘頭的逗子市湘南國際村，十一月二日下午六點開始報到，研討會本身共三天，十一月五日下午五點結束。一九九五年是日本戰敗投降五十週年，這個研討會可以說是日本東南亞學界逢此紀念年份所舉辦的盛會，但此會在性質上是個"closed-door conference"，除了論文報告人、豐田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和少數研究生外，並沒對外公開。曹教授和我是在偶然的機會得知此一會議，表示有意參加，承蒙豐田基金會的本多史朗先生和早稻田大學教授後藤乾一熱心幫忙，我們方有機會參加，親睹盛況。

說這個研討會是日本東南亞學界的盛會，並非誇張。這個會議幾乎囊括了所有日本當前著名的東南亞研究者。該會的實行委員會代表（相當於我們的研討會籌備委員會主席）是名古屋大學的倉澤愛子教授，委員有明石陽至、池端雪浦、川島綠、後藤乾一和中原道子等教授。這些學者都是日本東南亞學界中的翹楚。

該會在三天的會期內共舉行五場研討會，提出二十四篇論文。以下是各場論文的主題、報告題目和報告人：

第一場 主題：「統治機構、領導階層(leadership)的持續與變化」

1、「日本佔領下爪哇之村落行政」

報告人：小座野八光（東京外國語大學研究生）

2、「緬甸：都市菁英之日本佔領期 以 GCBA、Thahkin 黨、

ICS 黨員為中心」

報告人：根本敬（東京外國語大學 AA 言語文化研究所）

3、「菲律賓 持續的領導階層」

中野聰（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部）

4、「戰後政治之原點 李光耀與日本佔領期的新加坡」

田中恭子（靜岡縣立大學大學院國際關係學研究科）

5、「日本軍政下的馬來人菁英」

Abu Talib Ahmad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第二場 主題：「人與物之資源動員與現地社會之對應」

1、「日本佔領期菲律賓糖業調整政策之性格與實態」

永野善子（神奈川大學外國語學部）

2、「佔領期東南亞日本企業之經營實態 以勞務動員為中心」

小林英夫（駒澤大學經濟學部）

3、「從米穀問題看佔領期之東南亞」

倉澤愛子（名古屋大學大學院國際開發研究科）

4、「日本佔領期英領馬來亞之勞務者動員 泰緬鐵道之例」

中原道子（早稻田大學國際部）

5、「論印度國民軍裁判」

長崎暢子（東京大學教養學部）

第三場 主題：「日本佔領下之文化與社會」

1、「日本軍政與印尼的伊斯蘭教」

原誠（同志社大學神學部）

2、「印尼穆斯林（伊斯蘭教徒）對日本軍政之肆應」

小林寧子（愛知學泉大學）

3、「菲律賓之文化戰線」

寺見元惠（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 4、日本軍政下之馬來亞、新加坡之文教、文化政策及其影響」
明石陽至（南山大學外國語學部）

第四場 主題：「多民族社會下之日本佔領」

- 1、「日本之馬來亞佔領與華人社會」
原不二夫（亞細亞經濟研究所地域研究部）
- 2、「日泰同盟與泰國華僑」
村島英治（成蹊大學文學部）
- 3、「菲律賓穆斯林對日本佔領之肆應」
川島綠（靜岡縣立大學大學院國際關係學研究科）
- 4、「多民族社會之殖民地統治之構造 與印度之大英帝國統治
之比較試論」
重松伸司（名古屋大學大學院國際開發學研究科）

第五場 主題：「近現代史中的日本佔領 比較與定位」

- 1、「日本佔領在菲律賓歷史上的意義與位置」
Ricardo T. Jos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 2、「印尼歷史教育中的日本軍政期」
首藤もと子（駒澤大學法學部）
- 3、「從新加坡的視點看日本軍政之衝擊與教訓」
蔡史君（津田塾大學學藝學部）
- 4、「越南現代史中的日本佔領」
吉田元夫（東京大學教養學部）
- 5、「日本東南亞佔領與『解放史觀』」
後藤乾一（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
- 6、「日泰同盟下之泰國駐屯軍 日泰交涉史中所完成的角色」
吉川利治（大阪外國語大學外國語學部）

和台灣一般研討會不同的是，此一研討會除了每場有位主持人外，並未安排評論人，只是在每場結束前有四十分鐘的討論時間。全部五場報告結束後，另有為時一小時半的「綜合討論」，分兩部份，前半由日本東南亞學界著名學者池端雪浦教授作綜合評論，後半開放給與會者討論。研討會最後以研討會實行委員會的「閉會謝辭」作結。

從研討會的報告人名單中，讀者或會發現參加的女性學者相當多，佔了將近半數。（二十四位報告人中有十位是女性，如果加上最後作總結的池端雪浦，共十一位。）這反映了日本東南亞學界有高比例的女性學者。日本東南亞學界不惟女性學者眾多，居於領導地位的女教授也不少。這在還是男性佔多數的日本學界，不能不說相當特別。這個現象很值得我們注意。我猜想大約和下面的因素有關。首先，相對於其他歷史悠久之領域（如東洋史），東南亞研究是個新領域，新領域一般而言有利於新進者，加上戰後女性研究生人口逐漸增加，女性學者在東南亞學界也就顯得比較多。

這個會議所發表的論文涵蓋面十分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民族等面相都照顧到。有些題目相當細，而且每位學者在語言上都有必要的訓練，能應用研究對象所要求使用的語言，可見日本的東南亞研究根基頗為深厚。就這點而言，如果台灣要發展東南亞研究，語言上的準備是必要的，也就是說將來我們研究東南亞的學者，至少要懂得印尼文、越南文、馬來語、泰語，或其它東南亞語言中的一種。

研討會邀請函開頭寫道：「1995年時當『敗戰』50周年。」（引號原有）實行委員會用了加引號的「敗戰」，而非日本一般慣用的「終戰」，顯得有些不尋常。根據後藤乾一教授的研究，近年來直接了當的「大東亞戰爭=解放戰爭」史觀，有退潮的傾向，取而代之的是「兩義性論」，也就是認為日本的太平洋戰爭具侵略和解放兩面，雖然是侵略戰爭，結果對亞洲諸國的獨立有所貢獻。此一看法又可稱之為「結果貢獻論」。這是一個頗值得我們注意的趨勢。日本的東南亞「解放史觀」基本上是政客和知識人透過媒體所傳播的看法，雖不為一般日本歷史研究者所苟同，其影響力卻是很大。這個會議也就是在這樣一個重新評價日本的東南亞佔領史的氛圍下舉行。

一、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東南亞研究所

今年八月一日起正式成立的全國第一個東南亞研究所 -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已經完成首屆新生的招生工作，第一年總計錄取十名新生。（本年來報考者有一百零三名，錄取率不到 10%，本所為國際研究學院本年度錄取率最低者）

這十名新生的背景分佈相當多元化，有外文、企管、公共行政、公共安全、歷史、新聞、中文等不同科系出身，對於本所未來的基礎研究，將有很大助益，他們已於本年 6 月 27 日報到，並將於 8 月初選課，9 月中旬前後開課，開始台灣本土社會探索東南亞區域研究的求學生涯。

目前本所通過聘審的師資，已有專任教師兩名，兼任教師八名，專任教師為林若雲副教授兼所長（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主授國際政治經濟學、東南亞區域政經研究、南海問題專題研究）、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系的麥留芳教授（加拿大華鐵盧大學社會學博士，主授東南亞各國社會組織變遷、區域研究方法論、東南亞華人族群研究）。兼任的八名師資為：洪謙德教授（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政治學博士，主授東南亞與台灣問題研究）、江炳倫教授（美國印安那大學政治學博士，主授東南亞的政治發展）、陳鴻瑜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主授東南亞政治史、東南亞國際組織專題研究）、官國威副教授（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政治社會學博士，主授歐盟與東南亞關係研究）、郭建中副教授（英國薩克斯大學政治學博士，主授東南亞社會主義國家吸引外資政策）、黃建淳副教授（中國文化大學歷史學博士，主授東南亞華人史研究）、張煦華副教授（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博士，主授亞太傳播媒介研究）、楊章基教授（美國伊利諾大學語言學博士，主授馬來文）。

本所第二年預計將開設的課程名稱，包括東南亞華人的政商策略、東南亞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東南亞的國際組織、東南亞區域戰略與安全研究、馬來文、泰文或越南文等科目。務期於進入廿一世紀前，充分掌握全球政經、社會與人文趨勢，以區域主義的研究入手，深入探索亞洲鄰近國家。淡江大學東南亞所將扣緊全球與區域潮流脈動，尋出台灣未來於此區域應扮演的角色定位、影響力與戰略地位。

在經費、資源許可下，本所將逐年加強師資陣容，購置大批第一手資料（包括書籍、期刊、報紙）供研究生閱讀，同時期待於碩士班成立五年後，開始籌辦

東南亞研究所博士班。本所同時對研究生成績優良者，酌情給予獎學金鼓勵(成績於前 10% 者)。

為配合政府推動南向政策暨亞太營運中心的構想與跨世紀的政策需求，本所亦將加強與其他地區的區域研究整合，務期使台灣的東南亞研究漸臻國際一流水準。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每年將召開一次大型的國際會議與一次小型的研討會，研討有關東南亞地區安全與戰略、經濟合作，以及東南亞國際組織、南海議題、東南亞軍備競賽、東南亞華人華商問題等。本所並將鼓勵專任教授至少每年參加一次國際性研討會，並發表相關研究論文。

為使本所研究生理論與實際密切配合，鼓勵本所學生赴其研究當地國半年至一年，蒐集碩士論文資料；為加強對東南亞語言訓練，本所鼓勵學生儘量於寒暑假期間赴東南亞地區著名大學進修，從事實地田野調查。本所已與泰國法政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積極磋商，即將簽訂學術交流合作事宜，未來本所將與東南亞各國著名大學，如泰國朱拉隆功大學、菲律賓大學、印度尼西亞與馬來西亞、越南、緬甸等地區的大學的東南亞研究中心，以及各國有名的智庫暨研究機構，持續進行學術交流合作與交換教師、學生的計劃。

由於東南亞區域遼闊，歷史文化背景多元，初期本所研究方向將著重區域性的政治經濟整合，研究範圍置於東南亞十國 - 東南亞國協(ASEAN 七國：菲律賓、印尼、泰國、馬來西亞、汶萊、越南、新加坡)與中南半島的柬埔寨、寮國、緬甸。第二年師資延聘以東南亞區域經濟研究專長者為主；未來延聘師資，將再輔以歷史、社會、宗教、文化人類學等領域。

在「未來化、國際化、資訊化」的淡江大學三化政策原則下，本所將配合全球與區域政經脈動，兼顧理論與實際，嚴格掌握本所碩士論文品質，俟成立滿五年後，再籌劃成立博士班。

本所極歡迎有國際觀，對亞太地區的區域安全合作、台灣對東南亞策略、區域間政經整合等相關學術領域有興趣者來報考。各界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助教陳建全先生：(02)621-5656 ext.796;或傳真(02)622-4058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所長林若雪提供)

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概況

1、成立宗旨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為加強對東南亞各國政治情勢、經濟發展、人交社會與族群關係之瞭解，培養相關研究人才，提供政府與產業界諮詢服務，進而提升我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關係，爰於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一日成立東南亞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2、人員組織

本中心敦聘原任職於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陳鴻瑜教授擔任中心主任，籌劃中心的發展。由於法令及員額的限制，為使本中心的發展不受影響，乃調整計劃，提前申請設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俾以研究所師資充任本中心之研究工作，兼收教學、研究相輔相成之效。本校已於民國八十四年十月向教育部申請設立東南亞研究所碩士班，並獲得同意於民國八十六年度正式成立。

此外，為使有關東南亞研究之成果得以供學界與各界參考，在袁校長積極支持下，本中心已於民國八十五年元月出版「東南亞季刊」《創刊號》，是本校發行的第一分刊物，亦為國內首見之東南亞區域研究專刊，八十五年度《春季號》已於本年四月廣續出刊。

3、工作概述

(1) 本中心陳鴻瑜主任於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中旬出席由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在高雄舉行之第七屆「亞太展望」研討會，並發表「中華民國與亞太安全」為題之論文。

(2) 本中心陳鴻瑜主任於民國八十四年十月中旬參加由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主辦之「海南暨南海」學術研討會，並發表「南沙問題之解決、協商、共管與共同開發」為題之論文。

(3) 本中心為推廣僑教，於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六日至十三日組織東南亞教育訪問團，由袁校長擔任團長，本中心陳鴻瑜主任負責籌辦，成員尚包含教育部與僑委會的代表。訪問團行程包括馬來西亞、泰國、香港與澳門等地，主要訪問當地僑校及僑團，除宣傳本校建校經過外，亦藉以探訪海外僑界對國內高等教育之要求，以資參考。

(4) 八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本中心陳主任陪同袁頌西校長與泰國華僑崇聖大學(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林紹榮校長在曼谷世貿中心大樓簽定文化合

作協議書，兩校將在各學術領域進行交流合作。

(5) 本中心於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六日發行「東南亞季刊」號創刊號，計劃每年出版四期，內容以東南亞政治、經濟、社會、族群關係的學術論文為主。

4、未來發展

本中心設立初期規劃，以奠定研究基礎為主，重點在圖書期刊購置、研究資料蒐集、開展研究工作以及籌辦定期性刊物等。待本校東南亞研究所正式成立招生後，將藉研究與教學人才之相互支援，逐步展開東南亞區域之研究工作。本中心期望透過「東南亞季刊」做為台灣地區從事東南亞問題研究者發表論著之園地。

(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陳佩修提供)

三、國策中心「亞太小組」簡介

一九八九年八月，國策中心成立「亞太小組」，並請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許介麟、蕭全政兩位教授主持亞太小組的研究方向與運作重點。經由成員李文志、李明峻、顏建發等人無數次的討論與修正，亞太小組確定以國際政經體制的變遷、亞太權力結構與台灣整體的互動關係，思考台灣世界觀與亞太戰略的架構與內容。並且，亞太小組在一九九零年先後出版「台灣的亞太戰略」與「亞太資料集」二書；其中，在「台灣的亞太戰略」一書中，亞太小組提出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亞太觀與世界觀——「南聯」、「西和」、「北進」。

一九九一年，國策中心「亞太小組」進一步研究美國、日本、中共等國的亞太政策，並且鑒於在亞太區域經濟合作過程中，有關（一）東南亞國協組織區域發展；（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成立與發展的過程；（三）亞太各國的投資貿易關係與先進國家的援外法案；（四）GATT 烏拉圭回合談判對亞太區域經濟未來走向等議題的重要性。因此，亞太小組在許介麟教授的顧問指導、蕭全政教授的主持及李文志、吳若予、楊德睿等人的研討與設計，先後完成「亞太經濟合作與美國的亞太戰略（1994年出版）」、「亞太資料集第二集（未出版）」、「亞太區域整合重要文獻彙集（未出版）」、以及「巨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預定1996年出版）」等書。另外，亞太小組也參與本中心舉辦「亞太經濟合作與台灣角色研討會（1991年10月）」、「躍昇中的亞洲經濟國際研討會（1992年5月）」、「中共十四大後之政經趨勢與我因應之道研討會（1992年11月）」、「參與GATT對農業之衝擊及政策因應研討會（1994年2月）」、「東亞現代化的困境與出路國際會議（1994年6月）」等會議的構思與實際過程。

一九九五年起，國策中心亞太小組除持續上述研究計畫後續工作外，也針對亞太地區安全問題，例如南海主權爭議，台海軍事安全衝突、朝鮮半島非核化與東北亞區域和平秩序，以及亞太集體安全保障體制、東南亞區域安全論壇等議題，亞太小組皆有全盤性討論與研究。同時，為因應一九九六年三月我國順利完成總統直選，故亞太小組一方面延續上述區域安全研究計畫的進行。另一方面對於兩項具有前瞻性的政策趨勢：我國外交與大陸政策之未來走向、以及兩岸有關農業事務合作交流計畫，亞太小組也在蕭全政教授的指導下著手設計研究方向。展望未來，國策中心亞太小組期盼能與國內外有關亞太事務研究之智庫進行學術交流，以充實目前本小組在研究工作上的不足。

(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李文志提供)

四、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是 1956 年 10 月建立的東南亞研究機構，也是中國大陸最早設立的國際問題研究機構之一。

在建所的最初十年中，研究工作側重於東南亞政治、經濟、歷史和華僑等領域，尤其是華僑問題研究成績更著。十年中進行了大量的僑情、僑鄉調查。每年兩次派出調查組採訪歸僑，比如對華僑投資和契約華工進行專題採訪調查，整理出《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匯編》一百多萬字和《契約華工訪問錄》二十多萬字。除了上述方向外，研究所還進行文化、教育、考古等方面的研究以及開展海外華僑函授教育。文化大革命期間，研究所一度停辦。至 1972 年才復辦。

目前全所共有 43 人，其中研究人員 31 人，翻譯人員 5 人，專職行政人員 2 人。在研究人員中，教授（研究員）3 人，副教授（副研究員）11 人。

研究所設有政治經濟研究室、華僑研究室、歷史研究室。此外還有編譯室、資料室和行政辦公室。政治經濟研究室主要研究東南亞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國際關係問題，以及亞太經濟和發展中國家經濟。華僑研究室主要研究東南亞華僑史和華僑經濟史。歷史研究室主要研究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和東南亞歷史。

*本研究所已自 1996 年 4 月起改為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分東南亞政治經濟研究所（從事當代研究）、華僑華人研究所（從事歷史與當代研究）、中外關係史研究中心兼及東南亞以外國家之研究。

在教學方面，研究所自八十年代初開始進行研究生的培養工作。目前設有博

士點一個：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碩士點五個：東盟國家經濟、發展中國家經濟、東南亞歷史、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和華僑史。至今已培養出博士 7 名，碩士 26 名。除了研究和教學工作以外，研究所還為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提供諮詢服務，為全國許多省市的僑務工作者舉辦培訓班。

研究所的圖書館現有藏書三萬五千冊，專題資料一萬冊，雜誌合訂本一萬冊，報紙合訂本二萬冊。目前每年訂購海外報刊一百多種。這是大陸同類研究所中資料最為豐富的機構之一。資料室業已出版福建省華僑華人問題圖書聯合目錄。目前正在編纂出版國內外有關東南亞研究的論文索引。

此研究所出版兩種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季刊：《南洋問題研究》和《南洋資料譯叢》。前者主要刊載所中研究人員的科研成果，部分刊登所外學者的學術論文。後者譯載國外刊物中有關東南亞、亞太經濟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問題的較有參考價值的學術論文和系統資料。

自八十年代以來，此研究所與國外的學術交流有了顯著增加。先後接待了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學者，舉辦了多次國際學術會議。同時還不斷派遣人員到國外學習、講學和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自建所三十五年來，此研究所出版專著、譯著、論文和譯文，共計四千多萬字。僅 1976 年以來，獨立出版和與其他單位合作出版的專著計 21 部，譯著 15 部。研究所還承擔了一批國家和省級社會科學重點研究項目。

* 八十年代以來南洋研究所曾出版以下著作

一、華僑、華人問題論著，專書，譯著，回憶錄

- 1.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研究 林金枝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 2.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概論 林金枝著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88
- 3.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選輯(福建卷) 林金枝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 4.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選輯(廣東卷) 林金枝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8
- 5.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選輯(上海卷) 林金枝編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4
- 6.印度尼西亞華僑史 溫廣益、蔡仁龍等著 海洋出版社
1985

- 7.華僑華人與中國革命和建設 林金枝主編 林金枝、
李國梁、蔡仁龍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 8.東南亞華僑通史 吳鳳斌主編 吳鳳斌、莊國土、
林金枝等合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4
- 9.契約華工史 吳鳳斌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8
- 10.中國封建政府的華僑政策 莊國土著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89
- 11.戰後海外華人變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李國梁主編
中國華僑出版公司 1990
- 12.華僑抗日救國史料選輯 蔡仁龍、郭梁主編 中國華僑歷史學會
1987年7月
- 13.東南亞華人經濟 汪慕恆主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 14.東南亞著名華僑華人傳(一) 蔡仁龍主編 海外出版社
1989
- 15.荷屬東印度華人的經濟地位 (英)W, J.凱特著 王雲翔
蔡壽康等譯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88
- 16.華人在東南亞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美)吳元樂著 汪慕恆、
薛學了譯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89
- 17.東南亞華僑經濟簡論 (日)游仲勛著 郭梁、劉曉民譯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87
- 18.華僑資本的形成和發展 (日)李國卿著 李國梁、金永勛譯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 19.荷蘭華人的社會地位 (荷)彭軻著 莊國土譯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2
- 20.福建省收藏華僑華人問題中外圖書聯合目錄 陳聲貴編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88
- 21.華僑華人研究文獻索引(1980-1990年) 曾伊平、陳麗妮編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4

二、南海諸島問題論著

- 1.祖國的南疆-南海諸島 林金枝、吳鳳斌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 2.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 韓振華、
林金枝著 人民出版社 1981
- 3.南海諸島史地考証論集 韓振華編 中華書局 1988
- 4.我國南海諸島史料匯編 林金枝、韓振華、吳鳳斌編
東風出版社 1988

- 5.外國確認中國擁有西沙和南沙群島主權的論據(中英文對照)
林金枝著 香港嶺南學院亞太研究中心 1993

三、中外關係史論著

- 1.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研究 韓振華著 廣西人民出版社 1992
- 2.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 陳希育著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1
- 3.明代海外貿易史 李金銘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2
- 4.《荷使節訪中國記》研究 (荷)包樂史 (中)莊國土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69
- 5.茶葉貿易與 18 世紀中西商務關係 莊國土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3
- 6.澳洲利亞研究論文集 胡文仲、陳希育編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2
- 7.澳中關係文 (澳)E. M.安德魯斯著 高亮、陳希育譯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2

四、東南亞政治經濟論著

- 1.東南亞五國經濟概況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編寫組
人民出版社 1976
- 2.東盟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研究 吳志生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7
- 3.亞太地區產業結構變化與外資的作用 趙文騷、吳崇伯著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2
- 4.菲律賓 沈紅芳著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5
- 5.南海研究論文集 南洋研究所編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2
- 6.亞太經濟新格局 趙文騷、王勤 廣西人民出版社 1992
- 7.東盟國家經濟發展與社會經濟形態 房少廉、王勤著
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
- 8.南洋研究問題論文文叢(一)、(二) 南洋研究所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81

五、語言工具書

- 1.日本語中國語慣用語辭典 劉曉民 日本實業出版社 1995
- 2.東南亞研究論文索引 南洋研究所資料室編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3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林滿紅與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研究員林金枝提供)

五、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ISEAS)

東南亞研究所成立於 1968 年，它成立的目的是提供一個具有豐富資源的環境給對於這個區域有興趣，並想從事有關東南亞安定、經濟發展以及政治、社會、文化變遷之研究的學者。

除了希望能在學術界引起討論之外，也希望引起大眾對東南亞的關心，並且藉著研究為區域中的一些問題提供各種的解決之道。

1、研究計劃

ISEAS 的研究計劃可以分為下面四大部分：

(1) 區域經濟研究(The Regional Economic Studies)

本計劃由三個單位進行：ASEAN 經濟研究單位，APEC 研究中心以及日本研究小組。研究的內容包括：APEC 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ASEAN 中策略性工業的競爭力；外資及跨國公司在東南亞地區之整合與合作；以及東南亞成長三角。

(2) 區域戰略及政治研究(The Regional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這個部分的研究內容有：東南亞及亞太的安全、防禦問題；武力現代化；策略文化；東南亞政府研究；以及經濟快速成長與急速民主化的研究。

(3) 區域社會與文化研究(The Regi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這個部分的研究包括：戰爭與社會轉型；日本殖民時期的英屬馬來亞(1941-45)；ASEAN 區域內勞工移動的社會衝擊；回教的復甦及政府的反應；中國企業的世界等。

(4) 中南半島研究計劃(The Indochina Programme)

這部分是針對當代中南半島國家與緬甸的政經議題。包括轉型中的亞洲經濟；寮國和 ASEAN 的經濟關係；越南改革後的制度環境與企業行為；以及越南國營事業的改革。

2、研究人員

在 ISEAS 中的研究人員可分為三類：資深研究員、研究員以及 ISEAS 研究員 (ISEAS 的核心成員)。

不論是短期或長期的研究員都可以獲得 ISEAS 所提供的各種研究獎助。目前所提供的研究獎助有：ISEAS 研究獎助、ASEAN Affair 研究獎助和 Duncan Macneil 研究獎助。另外，客座研究員可以使用 ISEAS 的各項設備，但沒有經費上的支援。

3、學術會議與研討會

ISEAS 積極地舉辦或與其他機構合辦各種演講、學術會議與研討會。會議的形式從各國學者齊聚一堂的國際會議到可供研究人員發表論文的小型研討會都有。

4、ISEAS 出版的刊物

本機構同時也是東南亞學術書籍的重要出版社，它一年平均出版將近四十篇的新文章。截至一九九五年三月止，它已出版了將近七百篇文章，這些文章反映出了 ISEAS 向來研究的重點：安全與國際事務、經濟發展及社會變遷；而這些研究都扣緊著 ASEAN 與亞太地區。

ISEAS 發行了三份學術雜誌：ASEAN Economic Bullet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Sojourn: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另外出版兩份一般性年刊：Southeast Asian Affairs 和 Regional Outlook。此外，ISEAS 每個月會有一分挾報，名為 Trend，隨著新加坡的 business Times 發行，同時也被東南亞其他地區的報紙所採用，例如：Jakarta Post、Bangkok Post；緬甸的主要政經季刊 MyanView 也於一九九五年開始刊登。

5、圖書館

目前圖書館已有超過有四十萬份的研究資料，其形式包括印刷品、微捲、視聽資料等等。主要的內容以社會學科為主，包括東南亞單一國家之政治、國際關係、軍事研究、社會、經濟、文化研究以及東南亞、ASEAN 的整體研究。

(中研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助理葉馥菱譯)

六、美國加州大學 Davis 分校的亞太研究計劃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Affairs(IGA)

美國加州大學 Davis 分校的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Affairs(IGA) 之下有六個研究計劃；其中與本院的東南亞研究區域計劃有關的計劃有二：Program on Immigration, Population and the Economy 與 Pacific Rim Business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PACBAD)。前者主要由 Philip Martin 領導(Martin 教授曾經應本計劃經濟組蔡青

龍先生的邀請赴本院訪問)，在該計劃下蒐集有美國與他國的移民資料；可供研究移民對一國經濟表現、人口與環境的影響。至於 PACBAD，則由該校經濟系的教授 Robert Feenstra (現任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主編) 主導。

依據 IGA 的書面簡介，此一計劃重要工作之一為聯合國際間的學者從事亞太國家 (Pacific Rim Countries) 的相關研究。在 IGA 的圖書館藏有不少亞太國家的經濟、貿易與廠商的相關資料，可供研究亞洲國家的投資策略、企業組織網路、貿易形態、與促進貿易、工業與經濟改革的國家政策之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我曾經於去年七月與今年六月兩度赴該研究所與 Robert Feenstra 合作進行台灣與韓國的企業集團經營策略的之比較研究，(其他合作學者尚有 Gary Hamilton 與 Tzu-Han Yang) 目前我們的重點放在理論模型的建構與集團企業經營形態對其外貿形態的影響。囿於現有資料的限制，現階段的重點放在台韓集團企業不同經營策略對其與美國貿易形態的影響；主要的初步發現為台灣集團企業的擴張策略相對於韓國之集團企業(Chaebol)而言，比較是傾向於水平整合(Horizontal Integration)的；反之，韓國的集團則屬於上下游整合型的集團組合。一方面，我們應用理論的模型分析證明：即便是在同樣的經濟環境下，此兩種不同形態的的集團企業都可能會出現；換句話說，社會政治等非經濟因數在解釋台韓不同的企業結構上，應該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我們導出台灣式的集團企業形態，會導致其出口品的多樣化(即同時含有中間產品與最終產品)，而韓國式的出口品則較為集中於最終產品。這個結論從比較台韓對美國的出口品內容上獲得了實證的支持。隨著貿易資料的愈來愈完備，未來將重點放在東南亞市場的經貿關係應該是可行而且值得的。

(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黃登興提供)

七、美國.康乃爾大學東南亞研究計劃

(The Southeast Asia Program, SEAP)

1、目標

康乃爾大學東南亞研究計劃 (The Southeast Asia Program, SEAP) 於 1950 年創立，由已故的人類學教授 Lauriston Sharp 發起，洛克菲勒 (Rockefeller) 基金會贊助而成。其旨在提供修習汶萊、緬甸、高棉、印尼、寮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等國語言及文化的學生研究之機會。而它的主要目的之一在於培養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研究員及學生之間的合作關係，並為其它相關單位提供資源，如 (1) 康乃爾大學其它之學術或校友會等相關單位；(2) 康乃爾大學體系之外對東南亞有興趣的單位，包括企業社區、政府機構、基金會、以及大眾；

(3) 東南亞國家。

2、歷史沿革

1950 年成立之初，SEAP 下有四位區域研究的研究員、七位研究生、以及一位兼任的行政人員。現在 SEAP 已經有 15 位專任的研究員，2 位助理研究員，3 位訪問學員，5 位榮譽教授，15 位不定期之講座教授，9 位語言學講座教授，6 位行政人員，以及 86 位研究生，曾有五位 SEAP 之研究員被選為亞洲研究協會之主席。截至自 1994 年 1 月止，已有 538 個碩士頭銜以及 408 個博士頭銜頒給康乃爾大學裡專攻東南亞研究的研究生。SEAP 畢業的校友，有的成為其他重要東南亞研究中心之創始者，有的任教於國內或國外大學，有的在跨國公司中工作，有的則被指派為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大使。

3、組織

SEAP 由一位資深的研究員領導，他是由核心研究員選出，三到五年為一個任期。並由核心研究員組成一個行政委員會，主任的工作為兼職，其他的研究員則為自願性的無給職。因為 SEAP 屬於亞洲研究學系的一個行政單位，所以其所有的研究員是同時代表他們本身所屬之系以及亞洲研究院。碩士學位及幾乎所有的 SEAP 基金都透過亞洲研究學系來頒發資助。

4、The John M. Echols Collection

The John M. Echols Collection 是康乃爾大學裡關於東南亞研究的首要資源，在該校的圖書館體系裡，它更是一個綜合且廣泛的區域研究資源。包括許多來自東南亞及關於東南亞的圖書、期刊、報紙、微捲、照片、錄音帶及錄影帶、政府官方文件、個人報告、繪圖、手稿等。

究竟它是如何發展起來的？二次世界大戰後，當大部分的亞洲學者著力於中國、日本、或印度的研究時，康乃爾大學一些有心的研究人員便開始收集東南亞研究的資料。他們相信只要持續努力進行，就可將 The John M. Echols Collection 建立成東南亞研究方面無可取代的資源。自 1952 年以來，第一個博士學位頒給東南亞研究計劃的學生以後，如今已有將近 400 篇康乃爾的博士論文以及 500 篇碩士論文主題處理東南亞並收藏於此圖書館；同時圖書館還收藏 32500 本以上，從各處收集來之處理東南亞的博士論文。自 1977 年始，Collection 為紀念奉獻給該組織三十年的人類學家暨文學家 John M. Echols，便正式命名為 The John M. Echols Collection。

The John M. Echols Collection 已成為大學部、圖書館、東南亞研究計劃的一部份。在 1960 年代，國會圖書館和康乃爾開始合作計劃，持續至今，康乃爾大學也因此可以獲得每份關於東南亞研究的重要出版品；每年約增加 7000 份出版品，現已將近有 225000 份。在 200000 本書當中，有 60000 本是印尼文、40000 本泰文、25000 本越南文、10000 本緬甸文、6000 本馬來文、4000 本菲律賓文、以及各超過 2500 本的寮國及柬埔寨文。另外，有 3000 本關於東南亞國家或團體的中日文書籍也收藏於 The Collection 中，其餘的就是以西文寫成。在 Collection 中，同時收藏了 20,000 類之檔案資料，其中有一千份以上的報紙，150,000 份的微捲檔案卡以及 13,000 捲之微捲。

SEAP 在建立 The John M. Echols Collection 的東南亞研究圖書上扮演了重要角色。The John M. Echols Collection 每年吸引了許多來訪者，包括與 SEAP 研究員及學生互動的訪問學員。許多專論、論著 經常出版，包括語言教學媒體、半年的期刊、研究等。另外，Collection 也提供地方社區一些免費活動，包括每星期一次的東南亞影片系列、東南亞影片出借，圖書館、非正式的研討會系列、工作坊、音樂會等。

(中研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助理薛曉華譯)

八、荷蘭.萊登.國際亞洲研究所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IIAS)

1、歷史沿革

國際亞洲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 IIAS) 創立於 1993 年，是由阿姆斯特丹大學 (UVA) ，阿姆斯特丹 Vrije 大學，萊登大學 (RUL) 及荷蘭皇家藝術及科學學院 (KNAW) 所共同成立的。其旨在藉由不斷組織國際討論會、研討會、及小型工作會議等，來促進人文及社會學科方面的亞洲研究，並樹立亞洲研究領域的科際整合研究傳統。IIAS 認為經由它的《亞洲研究之歐洲資料庫》(European Database for Asian Studies) 以及《IIAS 通訊》(IIAS Newsletter) 來交換亞洲研究資訊，並促成研究人員間的交流，是有助於亞洲研究領域的國際合作。

2、研究活動

目前 IAS 下已有兩個主題研究：“亞洲變遷中的生活型態”以及“南亞及東南亞瀕臨絕種之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而第三個主題研究“東亞及東南亞的國際社會組織”正在籌備當中。這些研究由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人員進行與發展。類似此種小組整合性研究的研究期限約為一至三年。除此之外，少數研究員也有機會進行個別研究。

3、研究人員（研究員與訪問學人）

IAS 的研究方案主要由剛獲得博士學位且其研究領域與亞洲研究領域相關的年輕學者來進行。在他們最多三年的研究期間內，他們被要求積極參與 IAS 的學術活動。另外，進行個別研究方案的 IAS 研究員也同樣的被期待參與 IAS 各項活動。

4、國際會議與研討會

IAS 透過與其他相關亞洲研究機構的合作，或獨立舉辦各種國際會議或研討會，諸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政改革”，“亞洲的環境運動”，以及“東南亞的空間與身份認同”等。

5、IAS 通訊（IASN）

IAS 通訊以英文發行，一年發行三期，每期發行 12,000 份；其內容為西方及亞洲國家的亞洲研究資訊。透過 Gopher 可查詢 IAS 的通訊，網路號碼為：
RULCIS.Leidenuniv.nl;OASIS.

6、IAS 與國際網路

IAS 的網路地址是

HTTP：[//www.leidenuniv.nl： iias/intro.htm](http://www.leidenuniv.nl: iias/intro.htm)

(中研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助理薛曉華譯)

九、法國.遠東學院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EFEO)

1、創始過程

一八九八年在銘文及美文學院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策動下，肇始於西貢之「中南半島考古團」於一九零一年正式命名為「法國遠東學院」(以下簡稱本院)，院址也同時遷往河內。本院最初的任務是在法屬中南半島進行考古發掘、手寫文件的搜集、古蹟的保存以及當地語言的研究。此外，也從事亞洲主要文明(從印度到日本)的歷史研究。

本院從在河內的一間圖館及一家博物院，逐漸擴展並開創建，自一九零七年始，獲得柬埔寨吳哥古墟遺蹟的託管業務，就是在本院考古學家及建築師們的領導下，從事該遺址的測量與攝影登錄，乃至以實體再現(anastylose)方式從事大規模之重建工程，至一九七零年止，吳哥窟工程區可說是世界上最大的考古學工地之一。

本院因政治事件影響，不得不於一九五七年離開河內，一九七二年撤離柬埔寨。一九六八年將總院址遷至巴黎威爾遜總統大道上之亞洲館樓中。在亞洲的建置也有了新的形態。一九五五年在印度的本地治里設置常駐中心，以研究歷史及印度學。而一九五零年代末期，本院在雅加達的常駐中心薈聚了多位考古學及宗教金石學的專家。一九六八年，在京都著名的禪寺「相國寺」中，設置了法寶義林研究所，做為佛教史研究的中心。同樣的，泰北之清邁在一九七五年也成立一個研究中心，以便研究該地的早期佛教文獻。

最近數年，常駐性的研究機構陸續在吉隆坡(馬來西亞)、台北(台灣)及浦那(印度)等地成立。一九九一年起，本院重返金邊，並恢復在吳哥窟的重建工作。一九九三年與越南當局簽訂協約，可望於將來河內設立一個新的研究中心及圖書館。目前正在評估香港、東京、漢城及永珍設立研究中心的可行性。

2、本院活動

本院是專門研究南亞、東南亞以及東亞文明的學術機構。院內大約有三十位亞洲學方面的專家，分屬不同的學術領域，諸如人類學、考古學、建築學、史學、藝術史、語言學、文獻學以及金石學。本院至今仍沿襲昔日的傳統，把研究的重點擺在原始的資料上—考古材料、寫傳以及口傳資料—並要求研究人員具與其研究範疇相關的語文能力。

本院海外分支機構的研究人員在與當地機構簽訂學術合作協定的架構下從事其研究工作。這些學術機構大都為政府部門、大專院校以及研究中心。他們參與駐在國新進研究人員的培訓工作，並就各自不同學術領域與學者專家從事交流。本院則就各研究範疇舉辦國際性的學者會議、學術研討會以及研究工作會。當然本院除了出版研究人員的著作外，也協助其他學術性著的出版。

本院與法國高等研究實驗學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第四科（歷史語言學）及第五科（宗教學）高等社會科學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國立東方語言文明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INALCO）、巴黎大學以及國立科學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維持著長期的合作關係。本院指導博士班的學生並竭誠歡迎研究人員在海外中心接受長期訓練。本院的研究人員大多參與國立科學研究中心的研究計劃，且任教於法國及其他國家的大專院校。

本院與歐洲，尤其是與亞洲地區的大學及研究中心，東京的上智大學、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學、曼谷的錫巴宮（Silpakorn）、雅加達的國立考古研究中心（National Institutes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以及浦那大學的德干（Deccan）學院保有合作計劃以及由本院研究人員所開設的專門課程。

由於法國外交部科學、文化與科技司，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密切的協助，本院方能從事一些耗費頗多的工作（例如在吳哥窟地區重新開展考古工作）。

3、本院圖書館

本館於本世紀初與法國遠東學院同時成立。不久後將被移置於 22av. du Président-Wilson 重新裝修過的大廈內，館內擁有在亞洲研究方面的重要藏書。

本館典藏了近六萬冊的書籍及一千多種的定期刊物，其中心包含了三百五十份刊行中的期刊。除此之外，本館珍藏了十五份的攝影文獻，內容大都與前法屬印度支那，特別是吳哥窟古蹟有關；另藏有近二千份各種材質的抄本，其中心有三分之二的抄本是以各種不同的亞洲語言所撰寫的；本館更大量收藏了拓本、地圖、圖表、視聽方面的資料和工具以及實物材料（例如青銅器、錢幣等）。本館典藏由添購、互換及饋贈的方式持續不斷地擴展，目前已成為法國甚至是整個歐洲的一項重要學術資源。

本館已出版及發行了份館藏的目錄，諸如有關印尼群島（修訂版）、越南、泰國、柬埔寨及西藏等地區藏。館藏的一批巴利語手抄本的目錄現正整理中。待本館進行中的電腦化工作完成後，完整的館藏目錄便可由法國及國際網路查詢。

4、本院出版刊物

(1) 書籍

法國遠東學院專刊 Publication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PEFEO) , 包括論文及專集 (169 冊)

考古學誌 Mémoires Archéologiques (20 冊)

有關中南半島的文獻與文件 Textes et documents sur l'Indochine 彙集 (18 冊)

重印已絕版之學術著作 (6 冊)

集刊彙編 (準備中)

法寶義林 Hōbōgirin 以中日資料為本之佛教百科辭典

本院亦負責或協助在亞洲出版以下彙編：

柬埔寨佛學文件 Textes bouddhiques du Cambodge , 由柬埔寨、寮國及泰國抄本刊印社 (Fonds d'Édition des Manuscrits Cambodge , Laos et Thaïlande) 編輯, 在清邁出版 (2 冊)

雅加達：努沙登加拉之文件與文獻 Textes et documents nousantariens (9 冊)

台北：越南漢文小說叢刊 Romans et contes du Vietnam écrits en han (12 冊)

本院亦將參與在本地治里之法國學會及河內之社會科學院的一些出版計劃。

(2) 期刊

法國遠東學院期刊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亞洲藝術 Arts Asiatiques 是從一九六二年以來由本院、吉梅 (Guimet) 及契努斯基 (Cernuschi) 美術館在法國科學研究中心協助下合作出版。

極東研究紀要 Cahiers d'Extrême-Asie 創刊於一九八二年, 是由京都法寶義研究所出版。

(遠東學院提供)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辦公室報導

一、辦公室：

承蒙院方協助，今年三月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向資訊所借得三間辦公室，較大一間（45坪）做為一般辦公、閱覽、藏書及開會之用；其他兩間（9坪及6坪）做為主持人及博士後研究人員辦公室。

二、設備：

1、報紙：

自84年7月1日起本計劃訂閱了六分東南亞地區的報紙：The Malina Times(菲律賓)、The Nation(泰國)、Jakarta Post(印尼)、The Straits Times(新加坡)、The New Straits Times(馬來西亞) 及南洋商報(馬來西亞)。

2、電腦：

行政部門配置兩台個人電腦，除了供行政人員處理業務外，也可供讀者上網路查詢「東南亞區域研究」相關書目。

3、各國東南亞研究機構簡介：

辦公室收集並陳列介紹各國之東南亞研究機構之小冊子及研究通訊。行政及會議室同時也陳列有東南亞區域地圖、文物等，週一至週六上班時間均開放讀者使用。

4、電子郵件信箱地址：

prosea@gate.sinica.edu.tw

三、出版

1、為提供本計劃各分支計劃研究人員和院外相關學者，甚至學生在進行有關東南亞研究時之參考工具，本計劃已編就「中央研究院東南亞研究書目彙編」一本，編輯本院人文社會科學各研究所圖書館館藏東南亞藏書和期刊之目錄，共收有外文2024筆、中日文1024筆，合計3048筆，全書共528頁。本書目彙編於84年9月出版，並廣泛贈送國內外相關大學及研究機構圖書館。

2、本計劃兩位研究員陳仲玉與蔡青龍依其計劃分別編就《中國南海區域考古學研究書目》、《Annotated Bibliography on Human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in Southeast Asia》兩本書目，前書已於八月中旬出版。另外，周婉窈、陳慈玉及林滿紅正籌商合編一本有關日據時代台灣與東南亞關係之書目。

3、本計劃在每年三月及九月出版兩期「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提供國內外東南亞研究概況，介紹國內外研究機構、人物、出版品等。

4、本計劃將發行「東南亞區域研究論文」，以不定期的方式出版院內、外和國外相關研究的論文。

四、演講

本計劃不定期邀請國內外對東南亞區域研究之專家學者蒞院演講，至目前為止已有十三次午餐研討會。

五、會議紀錄

八十六年度第一次分支計劃主持人會議紀錄重要內容

1. 院長致詞：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於9月2日舉行本年度第一次分支計劃主持人會議，檢討兩年來研究成果及共同規劃第三年之集體學術活動。李院長親臨會場致詞並建議未來的組織和研究發展方向，以下是李院長致詞的摘要：

我在接任中央研究院長以來，即接受各方面的建議推動三項主題研究：生物技術、資訊科學及東南亞區域研究。前兩者著重於推動科技之整合研究，對於社會應有直接可見之影響。後者則是旨在發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新領域，對本院的人文社會科學整合研究方向和整體社會科學學術發展應該都有幫助。雖說跨國經濟發展為當代之潮流，也許可以說經濟無國界；然不同的文化造成的衝突乃至於戰爭，也是時有所聞。歷史文化是長期發展的結果，且影響當地的政經發展，在國際化的步伐加快，人際交往密切之際，對一個地區的歷史文化、社會政治做深入的研究是有必要的，更何況就東南亞區域研究來說，它就在我們的鄰近範圍之內。

台灣研究東南亞是有一些他國學者所沒有的優勢：一是近幾十年來台灣培育了一批優秀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研究學者；二是台灣本身就是東南亞區域的一部分，與當地人也已有相當的聯繫，因此做出有台灣自己觀點的東南亞研究是可以期待的。

歐美學界常問：台灣乃至於東南亞地區在世紀末的快速發展是否為曇花一現？以科學家的觀點來看，由農業社會到都市興起是經過科技的發展帶動生產力的提昇，工業化之動員，運用資源使得生產增加，造成經濟繁榮；同時教育普及也提昇人文素養，這些進步是可以互相激勵而使社會更久更遠地永續發展。台灣將是如此，東南亞地區也應是如此，而且不同背景的國家畢竟會有不同的發展。單純用歐美過去的發展途徑和經驗來預，或者只用經濟的角度來評估台灣或東南亞的發展前途，或許是值得檢討。

本院東南亞區域研究已進入第三年研究，目前進行的十六個分支計劃分別屬於歷史、考古、語言、政治、社會、經濟等領域，看來已有不錯的紮根基礎，今後不妨加強對當地文化的研究。而且也可研擬與大學合作之辦法，以長期培養後學俾使東南亞研究得以生根。

目前本院正在做組織法的修訂，一旦完成後將送至立法院審查，屆時「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可望脫離臨時編組的型態而成為「東南亞研究中心」甚或「亞太研究中心」之正式機構。

本院並預定於現在考古館及經濟所之間的空地建一座世紀大樓，其中有社會所、台史所及綜合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東南亞研究中心」也將納於其間，所需空間可事先加以規劃。我更衷心希望本院這棟世紀大樓可以成為新的台北人文地標。

2.重要提案討論及結論：

a.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之每個計劃結案報告將以「東南亞論文系列」(working paper)的方式由計劃出版，各篇論文亦可投稿在其他刊物上，冀能傳播東南亞研究之訊息。

b. 評估台灣的東南亞研究，以助本院成為東南亞研究之重鎮：

* 台灣有一批日據時代留下來的資料，如台灣分館收藏有日本舊籍及南方資料館的資料，台灣大學也有許多，其他在台南成功大學及市立圖書館等都是非珍貴的原始資料，只要好好整理，可吸引國際學者至此做研究。其他如故宮博物院，史語所則有關於明、清兩代東南亞資料，可以做引得，方便學者使用。

* 華人研究則是可以做為本院東南亞研究之突破點，早期在台灣受教育的僑生，目前不少也是當地華人領袖，無論在商界，政界都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同時他們也想突破國界，組織跨國際的組織。所以現在是一個最好的時機，再過幾年，這種優勢可能會有所改變。若本計劃能與當地華人學者合作，可以為台灣做東南亞研究提供海外落腳之據點。如馬來西亞的華青中心；菲律賓的華裔青年聯合會等。在研究課題上，不妨先聽當地學者的意見，請他們提出當前最想做的題目，與院內同仁共同擬訂合作研究計劃，經審查後即可進行。

* 研究南中國海與東南亞國家

的關係，不僅有學術價值，並可提供國家做決策時的參考，也是值得重視的課題。

c. 邀訪國內東南亞研究機構負責人，研商共同培育後進人才。

d. 邀請東南亞及華人研究學者來台，研擬共同研究計劃：

* 第一期擬邀訪的人選是菲律賓的洪玉華教授與香港的陳志明教授。洪教授為菲律賓十大傑出婦女，主持華裔青年聯合會，提倡菲華融合之工作，並正在收集菲華資料以做深入研究，同時也與菲政府有良好之關係。陳志明教授原為馬來亞大學教授，對馬華社會有很好的研究經驗。

e. 與國際學術機構之互訪：

* 目前澳洲國立大學相當積極想與本院多合作，七月中旬李院長曾到該校演講並針對兩院校的未來合作取得初步的默契，蕭新煌教授將於九月下應邀前往該校訪問講演，並就具體合作事項進行磋商。

* 本計劃正在編印英文簡介，並擬提供正式介紹函，希望能方便於各位同仁出國進行交流。同時也希望同仁能提供相關資料，與國外東南亞研究學者互通訊息。

* 鼓勵邀請與各子計劃相關之國外學者來院作演講，此將有利於推廣並提昇國內東南亞研究之水準。

* 總計劃將可提供研究空間，方便到此地做研究之學者使用。

f.加強東南亞回教社會和文化研究：
* 在博士後研究及博士候選人獎助者之題目似可以此為優先；並鼓勵本院同仁提此類型計劃。

g.舉辦馬來語、越南語教學：
* 請來台就學之僑生或特聘當地之教師來院裏授課。

h.午餐研討會活動內容之多樣化：
* 在本年度午餐研討會裏，除了邀請國內外專家演講外，分支計劃主持人亦可以分組每月進行一次專題報告，或談田野經驗，或談研究新發現等。十一月擬請院長談他的東南亞經驗；10月8日下午3點則請法國遠東學院院長龍巴特做專題演講。

i.本計劃經由李院長的爭取與聯繫，將接受進行一項有關「東南亞主要國之政治變遷與經濟發展對投資環境之影響與衝擊」委託研究計劃（為期兩年），已商得本院社科所鄭曉時和社會所吳乃德兩位教授來主持，此一子計劃亦可在未來納入總計劃的研究項目，正好可補強本計劃在東南亞政治方面的研究。

j.協助出版常識性讀物：
* 如翻譯名著及聯合寫作東南亞通論性書籍，以便國人更深入地認識東南亞。

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n Area Studies (PROSEA)

Academia Sinica

I. Objectives

The 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n Area Studies was organized in September, 1994, to facilitate the research on Southeast Asia among researchers in the Academy. At present, the Program has identified the following four areas for research :

1. Austronesian History and Prehistory
2. Languages, Religions and Indigeneous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3. Post-Colonial Developments in Southeast Asia
4. Interaction of the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Peoples

II. Current Research Activities

For the years of 1996-1997, there are 16 ongoing research projects being conducted by individual researchers of the Academy'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s. These projects are further organized into five research divisions.

1. Historical Division

Title	P. I.
1)The Role of the Taiwan Government-General in the " Southward Advanced" Polic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 A Case Study of the Taiwan Development Company	Dr. Wan-Yao Chou
2)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ormation of Ancient City of Vietnam	Dr. Lan Shiang Huang

2. Archaeological Division

1)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Cultu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aiwan and	Dr. Cheng-Hwa Tsang
---	---------------------

Southeast Asia

- 2) A Study of Archae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th China Sea Area and Taiwan Mr. Chung-Yu Chen

3. Linguistic Division

- 1) Investigation of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s in Southeast Asia Dr. Paul Jen-Kwei Li
- 2) Investigation of the Karen Language (Tibeto-Burman) of Southeast Asia Dr. Randy-John Lapolla
- 3) Study of the Austroasiatic Languages of Southeast Asia Dr. Tin-Shin Jackson Sun

4. Sociological and Political Division

- 1)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System : Theory and Practice Dr. Cheng-Yi Lin
- 2)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Agrarian Problems of Southeast Asia Dr. Cheng-Kuang Hsu
- 3) The Transformation of Class Structu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Southeast Asian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ailand, Malaysia, Philippines, Indonesia and Vietnam Dr.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 4) The Social Welfare Policy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Dr. Tom Y. H. Chin
- 5) Leaders of the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 Dr. Tsun Wu Chang
- 6) Reappraisal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ation : Singapore as a Case Study Dr. Hong Yuan Chu
- 7) Religious Changes of Singaporean and Malaysian Chinese Society Dr. Kwang Yu Sung

5. Economics Division

- 1)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Dr. Ching-Lung Tsay
- 2)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Dr. Deng-Shing Huang

III. Organization

1. Advisory Committee

- 1) Dr. K. C. Chang
(Archaeology) Member , Academia Sinica
- 2) Dr. H. H. Michael Hsiao
(Sociology)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 3) Dr. Y. Y. Li
(Anthropology)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thnology
Member, Academia Sinica
- 4) Dr. T. B. Lin
(Economics) Dean, College of Management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 5)Dr. G. W. Wang
(History) Chairman,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National Singapore
University
Member, Academia Sinica
- 6) Dr. Byron S. Weng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7)Dr. Kuo Shu Yang
(Psychology) Vice President, Academia Sinica

2. Administration

- 1)Director : Dr. H. H. Michael Hsiao
- 2)Post-Doctoral Fellow : Dr. I_Chun Kung
- 3)Administrative Assistants : Miss Shu-Huei Lin
Miss Fu-Ling Yeh
- 4)Librarian : Miss Pei-Hsia Lee